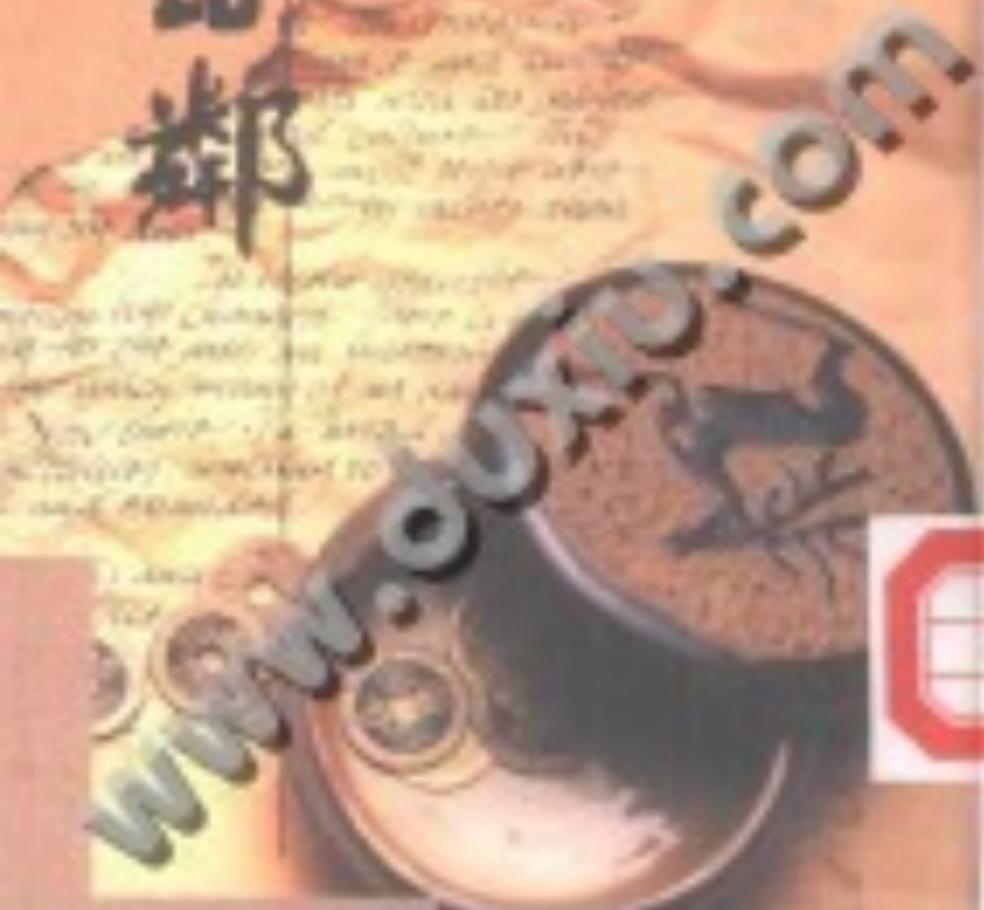


天涯若比鄰



王小平
三小書





張廣達，河
北青縣人。
1931年5月
出生，1953
年畢業於北

京大學歷史系並留校任教。
現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是國
內外知名的隋唐史及西域
史專家。



王小雨，四
川成都市人。
1952年7月
出生，1982
年畢業於北

京大學歷史系本科。現在
張廣達先生指導下攻讀博
士學位，論題為〈唐、吐蕃、
大食關係史〉。



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她自舊石器時代起，就有一套一脈相承的文化發展傳統。

然而，中華文化在廣續進行和延綿更替的過程中，在向人類貢獻自己優秀文化成果的同時，確實也不斷地汲取外來文化的養份而豐富了自己的內涵。本書作者從現存的史料、文物；宗教傳播史；交通史以及四大發明的傳播影響分析等等，旁徵博引地展述了數千年的歷程。顯然，這些資料和述評，足以澄清了近兩個世紀以來曾盛極一時的“中國文明西來說”的爭議。



定價：港幣 28 元
ISBN: 962-231-619-0

百家文庫·史論集

天涯若比鄰

張廣達
王小甫 著



中華書局出版

百家

文庫・史論集

責任編輯：鍾深雄



書名：天涯若比鄰
——中外文化交流史略

著者：張廣達 王小甫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450-452號

印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利眾街40號24樓B3

版次：1988年9月初版
©1988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619 0

序言

美國已故著名的東方學者勞費爾（Berthold Laufer, 1894—1934）曾在其名著《中國伊朗編》中說：「中國人是熟思，通達事理，心胸開豁的民族，向來樂於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縱觀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可以看到，中華民族在向人類貢獻自己優秀文化成果的同時，也通過各種途徑汲取着其他民族文化的有益內容，從而豐富和發展了自己的文化。因此，我們能夠有信心地說：中國文化是有強大生命力的。本書就是希望在有限的篇幅內，盡可能介紹一些基本史實，希望有助讀者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發展綫索，並認識其較完整的畫面。

一九七九年五月，在位於中國北方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因一九三五年在內蒙古赤

峯市郊區紅山後遺址的發掘而得名，年代約爲公元前三五〇〇年）分佈區中心地帶的遼寧西部喀左縣（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東山嘴，發現了一處原始社會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壇遺址，在這裏，出土了在中國首次見到的陶質裸體婦女小塑像。這類小塑像在國外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早期遺址中多有發現，被稱爲「早期的維納斯」，實際上多爲豐產崇拜的形象。東山嘴祭壇（距今約五千年左右）發現的兩件無頭婦女裸體小像，殘體分別高五厘米和五·八厘米，凸腹豐臀，是典型的孕婦。因此，完全有理由認爲，她們同國外那些「早期的維納斯」一樣，也是作爲豐產崇拜的形象而被塑造出來的。

當然，仔細研究起來，要把中外這些象徵豐產的小塑像聯繫起來認識還有許多困難。例如，在介於中國和歐洲之間的中亞地區，在銅石並用時代（約公元前五千年初至前三千年初）的這類塑像，其發展趨勢一般是由豐腴的立像到瘦削的坐像，而且多以手、乳（有的就是由雙肩演變而成）的有無分類，可是，中國遼西東山嘴的小塑像在絕對年代上大致與蘇聯中亞相同，考古分期上稍早於蘇聯中亞，却已取「倚坐式」姿態了。更重要的是，一九八三年以後，考古人員又在東山嘴以西五十公里，建平、凌源兩縣交界處

的牛河梁發現一座女神廟遺址和數處積石大冢羣，以及一座類似城堡或方型廣場的石砌圍牆遺址。經碳十四測定和樹輪校正，這些遺址距今均已五千多年歷史。遺址中出土了一批大小不等的泥塑女性裸體像殘塊，其中特別珍貴的是女神廟主室西側發現的一尊仿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像。該像頭部基本完好，塑像採用圓雕手法，程序與中國現代塑像大致一樣。女神的眼珠用晶瑩碧綠的圓玉球鑲嵌而成，顯得炯炯有神。這些，都說明紅山文化的彩塑藝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有些學者甚至認為，象徵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壇、廟、冢出現在山海關外的遼西，這為中華文明的起源問題找到了新的綫索。那麼，是不是也可以憑着這些材料對豐產女像的起源和傳播方向問題作出判斷呢？看來却不能這樣做。因為，不僅在遼西與中亞的這類塑像間沒有發現任何中間環節，而且，實際上歐洲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奧瑞納文化（Aurignacian，時代為晚更新世，即最遲在距今一萬年以前）中就已出現了造型非常一致的體態豐滿的孕婦小塑像，如奧地利的維倫多夫（Willendorf）出土的婦女小塑像，推測是豐產女神。不過，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提出一個問題：爲什麼在那樣遙遠的

古代，在歐亞大陸這樣遼闊的土地上，那些看起來毫無關係的人們中間，會產生同樣的崇拜和相似的藝術呢。實際上，人們很早就從不同的角度來試圖回答這一問題了。

對這一問題最早也是最膚淺的回答恐怕要數所謂「中國民族、文化西來說」了。這一說源起於明末清初。耶穌會士東來以後，西方對中國有了初步瞭解，有些人便力圖用已有的認識和觀念來解釋自己有關對中國民族和文化的膚淺知識。「西來說」一時盛行，這當然是那個時代中外文化交流尚未深入的反映。例如，歐洲人早已知道古埃及的聖書體文字（金字塔裏的那種象形文字），當他們了解到中國的漢文也有象形性質時，有些人便認定漢文起源於埃及文。有些人甚至因此認為中國人是「古代埃及人的移民」（見 Joseph de Guignes, *Memoire dans lequel on prouve, que les Chinois sont une colonie Egyptienne*, 1760）。到了近代，就很少有人再堅持這一說法了。「西來說」中又有一些人（如 Teren de Lacouperie），主張中國民族源出中亞細亞一帶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的巴比倫，以為中國古代的百姓即是巴比倫的Bak族，神農即Sargon，倉頡即Dungir，黃帝即Nakhunte，以及雙方都有關於遠古洪水的傳說等。清朝末年，一般士

大夫痛恨滿清，於是「西來說」經日本輾轉傳入中國，由章太炎、劉師培等推波助瀾，一時頗為流行。可是，後來的研究都表明，前述中外專名的對音都是史家引文節略造成的誤會；洪水傳說則幾乎世界各國都有，不足以為民族文化同源之證。

一九二二年，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J.G. Andersson, 1874—1960）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了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年代約為公元五千至三千年），認為其彩陶形制、花紋與中亞、西亞陶器有相似之處，一度主張中國文化西來說（見安氏著《中國遠古之文化》，一九二三年；《甘肅考古記》一九二五年）。後來，安特生糾正了自己的「西來說」觀點，強調中國人種和文化是連續發展的。事實上，中國西部，尤其是新疆地區，彩陶分佈雖然廣泛，但往往與銅、鐵器共存，其年代下限與中原地區的戰國漢初相當，並不能構成「西來說」的傳播鏈條。

除「西來說」之外，其他解釋如文化人類學中的功能說、結構說，以及六〇年代末以來西方「新考古學派」的文化過程研究和模式論等，社會影響都不太大，這裏就不評述了。看來，對不同文化中類似現象的認識，尚需另闢蹊徑。

事實上，儘管在遠古時期，由於人類活動的能力和範圍都有限，地域遼闊、人口稀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深層文化（如宗教、藝術等）的傳播交流是很難發生、絕少進行的，但並不完全排除各地區不同文化間傳播交流的可能。例如，前述遼西東山嘴遺址還出土了一件雕刻精美的鴉（貓頭鷹）形綠松石飾，可是，綠松石並不是遼西礦產，它出現在這裏，無論如何也是某種交流的結果。當然，問題的關鍵並不在這裏。應當看到，就遠古時代而言，各地區不同文化中的某些類似現象，恰恰證明了美國人類學學者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在《古代社會》一書序言中說：「人類出於同源，在同一發展階段中人類有類似的需要，在相似的社會狀態中人類有同樣的心理作用。」

正是這些現象，說明人類文化作為社會產物，它在本質上是互相聯繫的而不是自我封閉的。即使是在相互隔離狀態之下各地區獨自發展起來的不同文化，聯繫的因素仍以各種形式頑強地表現出來。例如，在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和北歐，陶器都應用螺旋形圖案。在青銅時代，中國和歐洲以及二者的中間地帶會廣泛流行下述器物：①具有獸角刀把頭

的雙刃劍；②具有環狀刀把頭的雙刃劍；③劍鞘帶上附着形狀對稱而複雜的銅製或玉製裝飾品；④劍鞘上的小片附屬物或嵌入物。環狀把頭劍在中國漢代還在使用，（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作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認為，這種類型的刀劍從大西洋沿岸的布列塔尼起直到太平洋的北部灣均有分佈。在中國青銅文化和歐洲早期鐵器時代的哈爾施塔特文化（Hallstatt Culture，因奧地利薩爾茨堡東南的哈爾施塔特遺址而得名，年代為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前五世紀。）之間，還有其他一些相似的器物和紋飾，如三稜的箭鏃（這種箭鏃只在哈爾施特地區、南俄和中國發現過）；祭祀用的斧鉞，這種類型的斧頭還有幾種花樣，從中國到歐洲都可以找到這類遺物。在民間傳說和文學藝術的相似性方面，有在中國和高盧（Gauls，今法國和意大利西北部）都可以找到的許多人身蛇足像（如中國的伏羲神像），有和希臘的牛首人身神相似的中國的牛首神農氏和蚩尤的形象，等等。印度學者索雅奇（Coyaji）曾將波斯人費爾道西（Firdausi，約934—1020）的史詩《王書》（Shah-namah）和中國明代許仲琳（約十五、十六世紀間人）的小說《封神演義》作過比較，發現《王書》中的喀烏斯王（King Kaus）和殷紂王、

殘忍的王后Sudabah和蘇坦巴、善良的王子色華奇(Syawash)和殷郊、Rustum和李靖、Suhrab和哪吒、Keresasp和后羿之間，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而這兩部作品的材料來源都要比其成書年代早得多。

所有這些現象表明，作為人類文化本身，它一開始便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是各地人們獨自發展起來的具體的文化，另一方面又是地球上人類活動的產物。這就是即使在遠古時期，仍然能夠找到不同文化中的若干類似現象的根本原因。不過，研究這些類似現象的由來和產生的原因並不比研究異質文化的傳播交流更有意義。因為，對不同地區的具體文化來說，更主要的還是各具特色。異質才產生交流的必要。正因為如此，在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傳播和交流才會起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着時間的推移，各地區不同文化之間的聯繫也越來越緊密。基於這樣的認識，下面就按照歷史時代的順序來分期敘述中外文化交流的發展。

目錄

| | |
|-------------------|----|
| 序言 | 一 |
| 第一章 先秦時期 | 一 |
| 第一節 稻穀的傳播 | 三 |
| 第二節 草原之路 | 八 |
| 第三節 綠洲之路與絲綢之路 | 一六 |
| 第四節 同朝鮮、日本的文化聯繫 | 二一 |
| 第五節 同東南亞的文化聯繫 | 二四 |
| 第六節 亞歷山大東征與東西文化交流 | 二六 |
| 第七節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 三〇 |

| | |
|------------------------|----|
| 第二章 秦漢時期····· | 三二 |
| 第一節 與朝鮮、日本、東南亞的交往····· | 三五 |
| 第二節 月氏西遷與貴霜文化····· | 四二 |
| 第三節 兩漢通西域····· | 四六 |
| 第四節 匈奴西遷····· | 五三 |
| 第五節 漢代東西海路交流····· | 五八 |
| 第六節 佛教傳入中國····· | 六三 |
| 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 | 六九 |
| 第一節 東西陸路交流的發展····· | 七一 |
| 第二節 「東亞漢文化圈」的開始····· | 八一 |
| 第三節 海路交流的擴大····· | 八六 |
| 第四節 西行求法與東土開窟····· | 八八 |
| 第五節 粟特商胡東來與西域樂舞傳入····· | 九三 |

| | | |
|-----|-------------------|-----|
| 第六節 | 祆教傳入中國 | 九七 |
| 第七節 | 邊疆諸族的遷徙代興 | 一〇〇 |
| 第四章 | 隋唐五代時期 | 一〇五 |
| 第一節 | 唐代中國文化西傳 | 一〇七 |
| 第二節 | 造紙術西傳 | 一一一 |
| 第三節 | 絢麗多彩的唐代文明 | 一一四 |
| 第四節 | 景教、摩尼教及印度教入中國 | 一二一 |
| 第五節 | 唐代文化東傳 | 一二七 |
| 第六節 | 唐與阿拉伯的交往及伊斯蘭教傳入中國 | 一三二 |
| 第七節 | 唐末五代西北民族遷徙及其歷史影響 | 一三六 |
| 第五章 | 宋元時期 | 一四〇 |
| 第一節 | 宋元中外海路交流 | 一四三 |

| | | |
|-----|---------------------|-----|
| 第二節 | 猶太教傳入中國····· | 一五二 |
| 第三節 | 蒙古西征····· | 一五四 |
| 第四節 | 指南針、火藥、印刷術西傳····· | 一五八 |
| 第五節 | 蒙元時歐人東來····· | 一六四 |
| 第六章 | 明清時期····· | 一六七 |
| 第一節 | 鄭和下西洋與明代對外海路交往····· | 一六八 |
| 第二節 | 耶穌會士東來與東學西被····· | 一七一 |
| 第三節 | 中外科學技術交流····· | 一七八 |

第一章 先秦時期

先秦是指秦代（公元前二二一年至前二〇六年）以前的時期，包括文獻記載中傳說的遠古三皇（伏羲、燧人、神農）、上古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約公元前二十六世紀初至約前二十一世紀初）和三代夏（約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約前十六世紀）、商（約公元前十六世紀至約前十一世紀）、周（約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前二五六年，包括西周、東周，東周又分春秋和戰國時期），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統一中國爲止的時期。這個時期，大致相當於考古分期上的中國新石器時代（約公元前六〇〇〇年至前二〇〇〇年左右）晚期、青銅時代（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前五世紀）和早期鐵器時代（公元前五世紀至公元一世紀）初期。

總的看來，先秦基本上還處在文化發展的黎明時期，統一的中國文化正在形成之中。然而，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都表明，有迹可尋的中外文化交流早就開始了。有些活動如稻穀的傳播等甚至應該追溯到史前（國家產生之前）時期。到了青銅時代，中外文化的傳播交流在地域上已經擴大，涉及物品種類也有所增加。不過，這時的中外文化交流與文化發展大體處於同步階段，人們對外部世界的瞭解十分有限，對外活動有很大的盲目性。通向遠方的道路正在形成，有些還沒有完全開通。儘管遠古時代並沒有什麼獨立的民族國家的邊界足以阻止橫越歐亞草原（Eurasia），從波羅的海和喀爾巴阡山一直伸展到內蒙鄂爾多斯高原）的傳播和交流，但仔細分析起來，文化的交流畢竟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僅就傳播而言，它也要經過長久的時間和空間。說簡單一點，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有一個地域上由近到遠，形式上由間接（中介轉達或「激起傳播」）到直接的發展過程。先秦時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主要都是以間接形式進行的，其過程就更加複雜、緩慢。

第一節 稻穀的傳播

稻（*Oryza Sativa*），俗稱大米。稻穀的起源、演化及傳播，一直是國際學術界爭論的問題。從上個世紀到本世紀五十年代，日本、蘇聯、印度的農學家都認為稻穀起源於印度和日本，中國早期的教科書也沿襲這些說法。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中國考古人員在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第四層（公元前五千至前四千年）較大面積範圍內，普遍發現稻穀遺存，有的地方稻穀、稻殼、莖葉等交互混雜，形成○·二至○·五米厚的堆積層，最厚處超過一米。這裏稻類遺存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中罕見的。經鑒定，這些稻穀主要屬於栽培稻的籼亞種晚稻型水稻。它與浙江桐鄉羅家角遺址（公元前五一〇〇至前五〇〇〇年）出土的稻穀，同為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也是亞洲最古老的稻作遺存，在世界上也屬於最早的稻作遺存。河姆渡的發現，對於探討中國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農業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

義。

中國秦嶺、淮河以南的廣大地區，氣候溫暖濕潤，沼澤衆多。這裏的考古發現表明，在新石器時代，從較早的河姆渡文化開始，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化都以稻作農業爲主，其分佈大體是在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一帶，已經發現達三十餘處。這些遺存包括秈稻和粳稻兩種，以秈稻爲主，不過時代稍晚則粳稻的比例加大。長江中、下游一帶野生稻的分佈很廣泛，因此，這裏很可能是栽培稻的起源中心。本世紀七十年代，先後在珠江流域的廣東曲江馬壩鄉西南石峽遺址（公元前二九〇〇至前二七〇〇年）、長江上游金沙江流域的雲南賓川白羊村遺址（公元前二二〇〇至前二一〇〇年）都發現了稻穀遺存，說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華南和西南的部份地區存在較高水平的稻作農業。七十年代在雲南元謀大墩子新石器時代遺址（年代爲公元前一四〇〇〇年左右）出土了大量碳化粳稻並發現了儲藏糧食的窖穴，其中有禾本科植物灰燼，說明當地種植粳稻的歷史很久。研究者認爲，粳稻是由秈稻變異分化而來的。

近年來，各國專家通過從雜交親和率、遺傳基因和生物化學等方面的研究，證明現

今世界各國的栽培稻與雲南原始稻種有親緣關係。日本和國際稻米研究所的學者公認雲南是稻穀的發源地和演化變異中心。也有人從語言學的角度，認為中國廣西西南部、雲南南部、越南北部、老撾北部、泰國北部和緬甸暹羅是亞洲栽培稻的起源地。此外，更從方言學研究的角度，大致推測栽培稻在中國的傳佈情形：一路從西南經華中和華東北上進入長江流域；一路從雲南、四川北上進入黃河流域。此言不可謂不辯！可惜，看來不得不尊重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比雲貴高原地區目前所知年代較早的以稻作農業爲主的文化遺存——雲南賓川白羊村遺址，早兩千年這一事實。再者也不得不尊重粳稻（雲南出土）是由秈稻（浙江出土）變異而來的事實。

在接受上述事實的前提下，應該同意常任俠先生在《海上絲路與文化交流》一書中的說法：稻穀向外傳播的路綫是沿瀾滄江、怒江、紅河向南向東傳到越南，向西傳到緬甸和印度；跟隨物質文化的交流再由陸路或海路傳至朝鮮、日本、馬來亞、菲律賓，再傳到美洲、歐洲。一般認為，日本彌生時代（公元前三世紀至公元三世紀）的稻種是從中國山東半島傳過去的。

可以爲上述說法提供佐證的是河姆渡文化盛行的干欄式建築的傳播。所謂「干欄式建築」就是在木（竹）柱底架上建築的高出地面的房屋。中國古代史書中又有干蘭、高欄、閣欄和葛欄等名，均係西南少數民族語言中這種建築名稱的音轉，漢語可譯爲「柵居」。推測這種建築可能是由早期借助自然樹木架屋的巢居發展而來的。《禮記·禮運》說：「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就是指的這種原始住房情況。干欄式建築通風和防潮都比較好，適於氣候炎熱和地勢低下潮濕的地帶居住，尤其宜於用作倉庫庫房。這種建築自新石器時代至現代均有流行。

目前發現的最早干欄實例就見於出土稻穀的河姆渡遺址第四層。從樁木佈置來看，一座干欄建築的殘長就有二十五米，進深約七米，前檐有一·三米寬的走廊。建築主要使用木材，出土的木構件上帶有榫卯，而且梁頭樁上還有銷釘孔，同時發現了企口板。在湖北蘄春毛家嘴的西周時代遺址中，在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的漢代青銅器上，以及在日本、越南、馬來半島、南洋羣島等地都見到了干欄式建築。日本彌生時代的干欄式建築主要是貯存穀物的糧倉，其遺迹在兵庫縣的田能、靜岡縣的山木和登呂等遺址被發現。

東南亞一帶則至今還較盛行棚居，以適應潮濕多雨的需要。將考古材料反映的時、空結合起來分析，可以看出干欄的傳播路綫與稻穀的傳播路綫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這一節最後，談談作為收割工具的刀和鐮。

新石器時代，刀的形制比較複雜，且用不同的質料。打製石刀是利用從礫石上打下的橢圓形石片，在兩端鑿成缺口，以便繫繩套在手上使用。磨製石刀則作長方形或半月形，前者多穿有單孔，後者多穿有雙孔，可繫繩套在手上。至今的鐵爪鐮與它們仍保持着同樣的形制。還有些刀則是用蚌片、陶片製成的。刀的用途主要就是摘取穀穗，它種類複雜，分佈廣泛，影響到朝鮮、日本一帶。

鐮是附着木柄的收割工具，最早的實物是裴李崗文化（華北早期新石器文化之一，一九七七年首次在河南新鄭裴李崗發現，年代約為公元前五五〇〇至前四九〇〇年。）的石鐮，刃部有細密鋸齒。龍山文化（泛指中國黃河中、下游地區約當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類文化遺存，因一九二八年首先在山東章丘龍山鎮城子崖發現而命名。）中除蚌鐮外，石鐮的刃部不再有鋸齒，其形制也同今天的鐵鐮一致。然而，事情並不止此。日本

學者八幡一郎曾經注意到東南亞有一種弦月形鋸齒刃的刈稻鎌，追溯其由來，當與中國古代的鎌刀有關（《環太平洋考古學》第一章）。在四川彭縣揚子山後漢墓出土的畫像磚中，有一幅收穫圖，圖中左側有三名用爪鎌摘穗的婦女，右側就是兩位持彎曲大鎌刀的男子。在日本岡山縣邑久郡、高知縣幡多郡也發現了類似的彎曲鎌。日本學者還發現，緬甸刈稻鎌同越南、泰國一樣，都是鋸鎌；有的人還調查了尼泊爾的藏民，發現他們使用的也是彎曲鎌，並推測尼泊爾各地大概都是如此。再向西，美索不達米亞（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兩河流域，今伊拉克）也發現了彎曲鎌，但其形狀大小却與歐洲大鎌相似。上述事例表明，彎曲鎌分佈的範圍是北起中國，西到印度。彎曲鎌在西方多用於割麥，從而保留了鎌刀原有的鋸齒。因為麥秆含硅酸成份多，有鋸齒割起來更方便。

第二節 草原之路

從蒙古高原逾阿爾泰山脈、準噶爾盆地進入中亞北部哈薩克草原，再經裏海北岸、

黑海北岸到達多瑙河流域，中經許多大河、戈壁、草原，這是古代遊牧民族藉以立國的地區，也是遊牧民族經常遷徙往來，並在世界歷史上幾度引起民族大遷徙浪潮的通道。人們通常稱之爲「草原之路」。

商朝建立之前，先民經常遷徙（王國維《說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活動範圍很廣。《世本》記載「相土作乘馬」，「亥（王亥）作服牛」。即馴服馬、牛用以前牽乘（車）。表明他們當時大概是活動於黃河中、下游的一個遊牧或半農半牧部落。據《竹書紀年》及《楚辭·天問》等古籍記載，王亥曾趕着牛羣到有易氏地區（今河北省北部），有易之君殺王亥，奪其牛羣。後來，王亥之子上甲微戰敗有易，殺有易之君綿臣。因此，有理由推測：早在公元前十八至前十七世紀，當商部落在黃河流域興起、發展的時候，北狄（狄歷、丁零）人便開始被排擠到北方。後來，商殷國家的鞏固和擴張不斷引起戰爭，商朝軍隊擊破北方部族，完全可能促使他們向更北遷徙。例如，《易·既濟》爻辭說：「高宗（武丁，約公元前十三至前十二世紀）伐鬼方，三年克之」。在這樣的背景下，可以認爲，蘇聯南西伯利亞的格拉茲科沃文化（Кызылтыпа「красная」，貝加爾湖沿岸

青銅時代早期文化，一八八七年在伊爾庫茨克郊區格拉茲科沃首次發現這種文化的墓葬而得名，年代爲公元前一八〇〇至前一三〇〇年（墓葬出土的白玉環同商代流行的白玉環、白玉璧是有聯繫的）。

中國的製玉工藝興起於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山東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因浙江杭州餘杭縣良渚遺址而得名，年代約爲公元前三三〇〇至前二二〇〇年）、石峽文化、紅山文化等爲代表，製玉工藝相當興盛，甚至可能已成爲獨立的手工業部門。玉器的許多形制這時已經形成，璜、玦、琮、璧等到商周時代得到進一步發展。格拉茲科沃文化的玉器，不僅形制與中國玉器類似，而且白玉環的紋飾也與商代玉器雷同，都有幾圈同心圓刻綫。據專家的說法，商代玉器上的「雙鈎綫」（並列的陰刻雙綫條），是玉琢工藝史上的一大成就。同時，商代玉器上出現的「馬蹄眼」（穿孔外大裏小），也在格拉茲科沃文化的玉器上出現。不僅如此，蘇聯考古學家戈羅德佐夫（B. A. Голдцов）還得出結論說：西方，如伏爾加河中游高爾基州的塞伊馬墓地（Seima Cemetery）年代爲公元前兩千年後期）出土的白玉環是西伯利亞出產的，但年代明顯晚於商代玉器。蘇

聯考古學家吉謝列夫（С. В. Кедров）說：「白玉的西傳完全證實，在塞伊馬時期，伏爾加河和卡馬河沿岸、西伯利亞貝加爾湖沿岸和中國北部之間曾有聯繫。塞伊馬、圖爾賓諾、貝加爾湖沿岸和綏遠（內蒙古）等地相似銅戈的形制很可能也是沿玉器之路傳播的。經由此路傳播者還有塞伊馬出土的其它器物：鏃和菱形鏃的矛。……最後，奧克拉德尼科夫（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在謝片察諸遺址發現的三足陶器也是一個證據，這些陶器同中國鼎和鬲完全相同。」（《南西伯利亞古代史》第四章）

中國北方居民的遷徙不僅引起了草原之路（玉器之路）的活躍，而且推動了南西伯利亞安德羅諾沃青銅文化（АНДРОН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因本世紀二十年代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安德羅諾沃村發掘的墓葬而得名，年代約為公元前十六至前十三世紀。）的傳播，導致了南西伯利亞卡拉蘇克文化（КАРАСУК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因本世紀二十年代在卡拉蘇克河畔巴捷尼村附近發掘的墓地而得名，年代為公元前十三至前八世紀。）的產生。卡拉蘇克文化的彎刀、短劍、鏃、弓形器、飾物等青銅器及其動物紋飾，與外貝加爾、蒙古和中國北方以及西方伏爾加河流域（如塞伊馬墓地）的某些器物十分相似，

表明該文化與這些地區的青銅文化有密切聯繫。例如，吉謝列夫就肯定卡拉蘇克型銅刀派生自公元前十五至前十四世紀的安陽銅刀。

近年來中國學者對北方青銅短劍進行了分類型研究，認為I型短劍（曲柄劍）的出現可以早到商代晚期，西周時期仍繼續沿用，而蒙古、蘇聯外貝加爾出土的這類短劍斷代為卡拉蘇克晚期，顯然要晚於中國北方。II型短劍（柳葉劍）三個亞型都與西周有關，II_A型在西周早期已經出現，與中原柳葉劍同時。卡拉蘇克文化「凹格短劍」的特徵是劍身呈柳葉形，劍身和劍柄間有兩個斜形小齒，齒下兩側有缺口。這種特徵與中國北方II_B型短劍非常相像。但是，卡拉蘇克文化的這種短劍大部份係偶然出土物，準確年代不好斷定。舊托木斯克墓地出土的兩件「凹格短劍」，年代斷為卡拉蘇克晚期，正值中國西周、春秋之際。因此，從年代上看，至少可以說中國北方II_A型短劍要早於卡拉蘇克文化的「凹格短劍」。至於在更早的時期，中國北方地區的青銅文化則是受到中原地區殷商文化的強烈影響，有些青銅武器，如戈、鉞、矛、刀等，例如夏家店上層文化（中國北方青銅時代晚期文化，因一九六〇年在赤峯夏家店遺址的發掘而得名，年代相

當於公元前一千至前三百年。)(銅器中的簋、簠、鼎、戈、矛等禮器和兵器，顯然是由中原傳入的或仿製的。

青銅器研究的結果，顯示了上古中國文化對南西伯利亞地區的影響。更爲重要的是，多年來對卡拉蘇克人骨的古人類學研究表明：來自東南方的蒙古人種華北類型成份會大量滲入，雖然這時還殘存着過去的阿凡納謝沃—安德羅諾沃類型，但這些舊類型看來已同外來居民融爲一體，卡拉蘇克人的體型發展總趨向乃是一種特殊的蒙古人種化，即形成了一種同華北人、通古斯人和朝鮮人非常接近的特殊類型。歐羅巴人種的長顛人出現於葉尼塞河中游的居民當中，主要是在卡拉蘇克以後的塔加爾文化(Тарар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南西伯利亞早期鐵器時代文化，據米努辛斯克附近塔加爾島發掘的冢墓而得名，年代約爲公元前七至前一世紀。)(時期。

吉謝列夫認爲，中國北方的移民帶着綏遠銅器進入葉尼塞河流域，於是，在米努辛斯克盆地，開始了卡拉蘇克時期。外來者在葉尼塞河中游遇到了少量安德羅諾沃居民，看來他們成了鄰居。這表明，安德羅諾沃文化部落的大部份在中國北方移民運動的壓力

下早就遷走了。南西伯利亞的安德羅諾沃文化主要是一種定居農業文化，傳到中亞地區之後，形成了許多草原青銅文化變體。

一般認為，這次部落遷徙和文化傳播發生在公元前兩千年中期，加喜特人（Kassites）入侵西亞兩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和雅利安人（Arians，即印度——伊朗人）入侵印度，都可能和這些安德羅諾沃文化部落的遷徙運動有關。安德羅諾沃文化部落據推斷是中亞後來的操印歐語的塞人（Sakas）和薩爾馬提人（Sarmatians）的直接祖先。他們進入伊朗高原之後，可能和當地居民融合，形成雅利安人，這是以後的西伊朗部落米底人（Medians）和波斯人的祖先。遷移到中亞中部或南部的一支，也和當地居民融合，成爲以後東伊朗部落粟特人（Sogdians）和大夏人（Bactrians）等的祖先。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兩年，新疆考古人員先後在哈密五堡和羅布泊地區古墓溝出土了一批乾屍，年代都在距今二千年以上。這些乾屍出土時大都頭戴尖頂氈帽，毛髮多爲黃色。古墓溝乾屍還可觀察到眉脊稍高，鼻骨也偏高，臉型稍瘦長等特徵。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古代波斯國王大流士一世（Darius I，約公元前五五八至前四八六）

王宮階梯的浮雕上，可以看到尖帽塞人的形象；在南西伯利亞的安德羅諾沃村等處也出土過編結的帶耳罩的圓錐形帽。因此，推測新疆的那些乾屍可能屬於某支先期南遷的安德羅諾沃文化部落——塞人。

在西方文獻中，有關東西交往的最早記載見於希羅多德的《歷史》。希羅多德徵引了普洛康內薩斯人阿里斯忒阿斯（Aristeas of Proconnesus）的敘事體神話詩《阿里瑪斯庇阿》（Arimaspea），這使人們可以間接推測公元前七或前六世紀歐亞內陸民族活動的某些蹤迹。周宣王（公元前八二七至前七八一年）時大規模討伐獯狁，（中國古代民族。殷周之際，主要分佈在今陝西、甘肅北境及內蒙古西部，從事遊牧。）又引起了「草原之路」上的一系列民族遷徙：伊塞頓人（Issedons）逐走遊牧在中亞北部的斯基泰人，（Scythians，泛指上古時期遊牧於中亞北部的印歐語系伊朗語族部落，很可能就是播遷的安德羅諾沃文化部落的後裔。）斯基泰人西徙企圖奪佔馬薩革泰人（Massagetae，上古時期遊牧在中亞西北部的部落。）居地，又被擊走，最後遷到黑海北岸，迫使西米利人（Cimmerians）南下。這是公元前七〇〇年左右的事。斯基泰

人大部份在黑海北岸定居下來，公元前三世紀末，他們建立了斯基泰王國（公元三世紀滅於哥特人）；另一部份繼續西遷至多瑙河流域，定居於今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還有一部份則跟踪西米利人南下，越過高加索山脈，到達小亞細亞和伊朗高原西北部，他們和伊朗部落瑪納人、米底人聯合起來，先後與亞述和烏拉爾圖發生過戰爭。

伊塞頓極可能是出現於漢代史籍中的烏孫。蘇聯歷年所得人類學材料證明，烏孫屬於安德羅諾沃型的大歐羅巴種。也就是說，烏孫、斯基泰和塞人的種族、文化本來同出一源。如前所述，他們最初同中國商殷文化的接觸應當在南西伯利亞的安德羅諾沃文化晚期，而不是在遷徙流播之後。

第三節 綠洲之路與絲綢之路

在草原之路以南是大片沙漠、戈壁分佈地區。草原遊牧民族和農耕農居民族都因為崇山峻嶺和浩瀚沙漠之間存在着綠洲而獲得了莫大便利。而較大面積或土地肥沃的綠洲

上發展起來的農業或半農半牧經濟，使居民聚集點形成權力中心或城邦國家，創造出富有特色的文化。人們靠聯結各個綠洲的一段段道路，靠着從高山峻嶺中反覆多次篩選出來的可以通行的山口，將歐亞大陸東、西往來的交通幹綫的走向逐漸確定下來。這些路綫的局部走向有時受到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各種紛爭影響，但基本上是一條「綠洲之路」。

長期以來，不少學者都想根據東西方的有關記載，給東西往來的交通路綫起一個適當的總括性的名稱。一八七七年，德國著名地質學家、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首先提出「絲路」一名，當時就得到了衆多學者的贊同。其後，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A. Hermann）對絲路作了進一步的文獻考察，並將這一考察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進一步擴大了人們的視野。就東西方絲綢貿易而言，這個名稱對於綠洲之路和草原之路都是適用的。例如，在內蒙古伊克昭盟杭錦旗桃紅巴拉戰國早期墓葬（碳十四測定年代為距今二五〇〇年左右）中，所出鐵刀、銅器上有絲織品殘迹，研究者認為顯然是來自中原地區的產品。更遠，在草原之路的重要樞紐——阿爾泰山區帕茲里克（Pazyryk）地在今蘇聯戈爾諾阿爾泰省烏拉干河畔（墓地五號冢墓中出土了

中國產的鳳紋絲織品刺繡，六號墓還出土了中國中原式的山字紋殘銅鏡等物，經研究，斷代當不晚於公元前五世紀。帕茲里克墓地還出土了其他一些文物，反映出這裏同其他地區的廣泛聯繫，如旋製木器、拉絨毛毯等來自中亞，器物上的某些紋飾母題和神話形象應係傳自波斯。帕茲里克墓葬的人骨資料說明，墓主屬於帶有蒙古人種成份的歐羅巴人種類型。有人推測，墓主即中國文獻中記載的「月氏」人。

中國古籍中最早涉及東西方交通的著作，當推西晉初年（二八〇年左右）不準從戰國魏襄王墓盜得「汲冢書」中的《穆天子傳》。此傳是戰國時代人所寫的一部小說，說的是周穆王西巡至崑崙會見西王母的故事。書中的地名，近數十年來中外學者聚訟紛紛，沒有取得一致意見。總之，我們可以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周穆王見西王母雖未必真有其事，但《穆天子傳》反映出，戰國時期（公元前四七六至前二二一年）中國人對於中亞乃至更西已經有了一些地理和歷史知識，表明中原與西域之間，已經存在某些形式的經濟、文化交流。不過，《逸周書·王會解》中來朝的各國中夾有渠搜、月氏、大夏等漢代西域國名，先秦舊籍如《管子》中也曾提到大夏，這些大約都是漢朝人後來加上去的。

所以，有關先秦時代中國同西域諸國交通的那些文獻記載，尚需考古材料加以證實。

近幾十年的實地勘察和考古發掘大大加深了人們對東西物質文化交流具體情況的了解。人們看到，東西往來的歷史遠遠早於現存的文獻記錄。例如，《逸周書》和《管子》都提到「禹氏之玉」，禹氏即居於河西走廊的月氏（何秋濤《王會篇箋釋》），可見上古時期從西域經月氏傳到中原的玉石很有名氣。從考古資料來看，中國最早的玉器出現於距今七千年的新石器時代。在大汶口文化（因一九五九年發掘的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而得名，年代約為公元前四三〇〇至前二五〇〇年。）良渚文化、紅山文化、龍山文化遺址中，均出土有精美的玉器。

十九世紀後半葉，法國礦物學家德穆爾將中國的玉分為軟玉（Nephrite）和硬玉（Jadeite）兩類。軟玉並非指硬度小的玉石，而是專指由透閃石——陽起石礦物組成的玉石的總稱，即白玉、青玉、碧玉、黃玉和墨玉等。硬玉則專指翡翠而言。中國早期的玉器多屬軟玉，硬玉製品出現較晚。目前已知，中國除台灣省豐田地區也產軟玉外，軟玉的主要產地在新疆，即新疆和田玉。一九七六年春，中國考古工作者

在河南安陽小屯村發掘殷高宗武丁配偶婦好的墓時，出土玉石雕刻品七百五十餘件，其品類之繁多，雕工之精緻，超過以往的傳世品和發掘品，堪稱中國古代玉雕藝術的精華。這些玉器中已經初步鑒定的約三百件，均係軟玉，絕大部份是新疆玉。有人認為，大量的玉石是由月氏人轉販而來的。同時，武丁時期玉雕藝術的高度發達，又為前述中國商殷文化沿草原之路（玉器之路）向西傳播的說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根據近二十多年的考古發掘成果，人們認為，中國絲織物開始出現於浙江吳興錢山樣的良渚文化遺址一帶，經商代到戰國，中國絲織業已相當發達。也許，公元前三世紀時，中國絲綢已經通過遊牧民族轉輸到大夏（Bactria，地當今阿富汗東部，與都庫什山以北一帶），但要說已輸入歐洲却未必靠得住，絲綢之路作為絲綢貿易的通道而正式開闢，是在西漢張騫通西域以後的事。現在看來，公元前西方文獻中的*Serica*或*Serica*並非指中國，而是指西方當時由之貿絲的某個中介地區（中亞或南西伯利亞）。

第四節 同朝鮮、日本的文化聯繫

朝鮮同中國接壤。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山東半島北部、遼東半島南部和朝鮮半島、日本等地都發現了石棚，這是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早期鐵器時代的墓葬形式之一，主要可分爲兩種：①北方式支石墓，在地面上豎立二至四塊石板，上面蓋一塊大石板構成墓室，如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北部發現的桌式石棚；②南方式支石墓，在巨大的石板下面支以小石塊，很少構成室狀，如在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發現的棋盤式石棚。專家們認爲，中國石棚的絕對年代大約相當於中原的西周時期（約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前七七一年），在形式和結構上，它們和朝鮮北部的石棚，具有一定的關係（劉敦楨《中國古代建築史》第一章）。朝鮮半島的石棚是青銅時代遺存，年代大體在公元前十至前五世紀，稍晚於中國石棚。足見中朝間文化交流，早從文字記載以前就已經開始了。

《史記》中有殷末周初箕子率族人去朝鮮的記載。《管子》曾提到「朝鮮之文皮」。

文皮是帶斑文的虎皮、豹皮，這是朝鮮的名貴特產。可見在先秦時期，中、朝之間已經有了貿易往來。戰國時代的著作如《戰國策》、《山海經》等都提到了朝鮮。朝鮮半島的青銅文化是以素面陶為特徵的，青銅器很少發現，一般為泡飾類小件器物，大型器僅見有曲刃短莖式青銅短劍。可是，這種劍在中國分佈地域最廣，包括遼寧、內蒙古東南部、吉林長春地區以及河北北部，其中以遼西發現最多，遼東次之，所以又被稱為遼寧式銅劍、東北系銅劍、琵琶形劍，年代相當於西周晚期至戰國晚期（約公元前九至前三世紀）。因此，有人認為，在中國移民將金屬器傳到朝鮮之後，才發展起朝鮮的青銅文化。在朝鮮的早期鐵器時代（約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前後），在前一時期素面陶的基礎上，吸收漢式陶器的製作技術，出現了飾繩紋、方格紋的灰陶。在朝鮮北部各地，曾發現中國戰國時代燕國的貨幣明刀錢，並有戰國式的青銅兵器和鐵器等與之共存。這些都表明上古朝鮮與中國間密切的文化聯繫。

日本海因有左旋回流的影響，由朝鮮半島南部渡海極易。大約從公元前一千年後半期開始，就不斷有中國和朝鮮人移居日本。據《紀伊風土記》記載，孝昭天皇時（約當

中國春秋末戰國初），有中國船遇難漂流至熊野浦，四人歸化日本爲新宮氏。王充《論衡》說：「周成王時，倭人獻鬯草」。《山海經》中亦記載了倭人。在日本繩紋時代（日本的新石器時代，因當時使用的繩紋式陶器而得名，年代約爲距今五千年至二千三百年左右。）晚期的遺址中，已發現有碳化稻米及印有稻殼痕迹的陶片，而日本的彌生文化，就是在繩紋文化的基礎上，受到大陸（包括中國和朝鮮半島）文化的影響產生的。應該注意到，日本彌生文化首先出現於九州北部，而後逐漸向東發展。前述石棚在日本正是出現於彌生文化時期，並且分佈範圍只限於九州北部。因此，基本可以肯定日本的石棚是從大陸傳過去的。本章第一節講到過彌生時代的稻穀、干欄式建築和刀、鏃等，除此而外，還可以指出，這一時代前期的鐵器和「細形」銅器（劍、矛、戈等）也是從大陸輸入的。後來又從大陸輸入鐵料、銅料等等。總之，日本從彌生時代開始，與中國、朝鮮半島交往頻繁，深受大陸文化影響。近年，更有考古學家稱：日本備後國三原町附近出土的明刀錢，與中國戰國時代的燕式明刀爲同一種青銅文化。

第五節 同東南亞的文化聯繫

越南和中國從遠古時期起就有密切的關係。越南北部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遺物，和中國西南地區發現的新石器幾乎完全相同。有人認為，這種一致性是由於地理位置接近、生態環境相似產生的。越南紅河流域的青銅文化出現在公元前二千年前後，其製品與中國青銅器相似，其後的東山文化（東南亞青銅時代晚期至早期鐵器時代文化，因最早發現於越南清化省東山村而得名，一般認為年代在公元前三世紀至公元一世紀）時期，則大量製造銅鼓。銅鼓是一種青銅鑄的打擊樂，其形狀「上寬而中狹，下則敞口」。因很像倒置的大口罐，故又名罐鼓。銅鼓約產生於公元前第一千年中期或稍後，主要分佈在中國雲南、貴州、廣西、廣東、四川、湖南等省區以及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至十九世紀，中國的廣州、緬甸的撣邦還有人掌握鑄造銅鼓的技術。世界上最早的銅鼓發現於雲南楚雄萬家壩墓葬和祥雲大波那墓葬中。

斷代均屬前五世紀。雲南晉寧石寨山滇墓中發現的八面銅鼓都屬公元前四至前二世紀。因此，應當肯定銅鼓起源於中國的雲南。東山文化遺址出土的銅鼓雖然也屬於早期形式，但晚於中國大波那墓葬、萬家壩墓葬及昌寧、彌渡等地所出銅鼓。此外，在中國古籍中還有越棠氏在周代和中國通好的記載。如，《韓詩外傳》卷四記載：周成王時，越棠氏來聘，「重譯而至」；《尚書大傳》亦記載有「越棠氏重譯而來」；《太平御覽》卷八三九。就是說那個時候的越南人因為語言不通，經過幾重翻譯介紹才來到中國訪問。現代越南以越族為主，他們的祖先雒越在古代是中國南方百越人的一支，大約是公元前幾個世紀遷到紅河流域去的。

據考古學家莫里斯（T. O. Morris）的研究，一九三〇年在緬甸叻外（今馬圭）縣德馬多河發現的石斧、石楔、石鑿和在東彬發現的小圓石器，同中國周口店出土的石器很相似；在上下親墩縣和在瑞波縣境內出土的環石，也同中國仰韶文化新石器相類似。緬甸的青銅時代大致為公元前二十至前二世紀。青銅器採集地點集中在揮邦，器類有鐮、斧、矛、鑽、環。器形與中南半島其他地區及中國南部所出的同類器物相近。莫里斯則

認為緬甸青銅器主要是受中國青銅文化的影響，其鑄造技術是從中國傳入的。上述緬甸出土的石器和青銅器，都收藏在大英博物館東方部裏。它們是中緬兩國在史前時期和青銅時代就有文化聯繫的歷史見證。學者們還從出土文物、歷史文獻和民族語言等方面進行研究，認為現在定居在緬甸境內的各民族大都是在史前時期從中國青藏、雲貴高原遷入的。現在緬甸人見到中國人還親切地稱爲「胞波」（緬語意爲「一母所生的同胞」）或「瑞苗」（緬語意爲「親戚」）。

現代考古資料表明，東南亞諸島嶼的青銅文化是從大陸傳去的。菲律賓在公元前六〇〇年出現青銅器和鐵器，是從大陸沿海經巴拉望島傳入的，其器類與中國南部和中南半島的相似。

第六節 亞歷山大東征與東西文化交流

公元前三三四年春天，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 A.D. 336 —

323) 率領馬其頓——希臘軍隊東征。前三三一年九月，古代波斯阿契米尼王朝 (Achaemenidae, A.D. 550 — 331) 末代皇帝大流士三世的軍隊被擊潰於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之高伽米拉 (Gaugamela)，於是亞歷山大取代了波斯帝國的統治。前三三〇至三二七年間，亞歷山大越興都庫什山，征服原波斯帝國的大夏和粟特 (Sogdiana，今蘇聯中亞澤拉夫善河流域，因地在阿姆河與錫爾河中游之間，又被稱爲「河中地」) 兩郡。隨後又南下攻掠印度河流域諸地。後因遭遇強烈抵抗和時疫，被迫於前三二五年撤回波斯，在中亞和印度留下督撫和一些屯兵據守的城堡。亞歷山大於前三二三年病死，所建龐大帝國迅即分裂，以敘利亞爲中心的塞琉古王朝 (Seleucids，前三一二—二二二年亞歷山大故將 Seleucus I Nicator 所建，都城在安條克 [Antiochia，今土耳其南部的 Antakia])。中國史籍稱之爲條支。前六四年滅於羅馬) 統治了大夏，那裏成了希臘人重兵戍守的軍事要地。大約在前二五〇年 (一說在前二四六至二四一年間)，安息 (Parthia) 與大夏兩地反叛，Arsaces 創安息帝國，Diodotus 建獨立的大夏王朝。前一七五年 (一說前一八七年) 之後不久，大夏將領上擴展到了塞斯坦 (Seistan，今阿富汗與伊朗毗連地

區)和西北印度。

亞歷山大東征以後，大批希臘人移居東方。希臘經濟、文化也在希臘人聚居的地方產生了很大影響。如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就發現了許多希臘文(多屬孔雀王朝(約前三二四至一八五年)時期)和用希臘字母書寫當地語言的大夏文碑銘以及雙體(希臘文和阿拉米文Aramaic或大夏文和法盧文(Kharosthi)磨崖)貴霜王朝(Kushan, 一至五世紀大月氏人以南亞次大陸西北為中心建立的國家。)貴霜王朝迦膩色迦(Kanishka)大王在位時期(約一至二世紀間)，貴霜錢幣以大夏文代替了希臘文，並停止在錢幣上使用法盧文。有一枚迦膩色迦時期的錢幣，壓印有穿希臘服裝的釋迦牟尼(即如來佛)像，周邊又是用希臘字母拼成的「佛」(Buddha)字。後來歷經嚙噠、突厥諸族統治，大夏文在巴基斯坦北部一直使用到九世紀中葉。

衆所周知，希臘藝術在貴霜時期同印度西北佛教藝術(其中又有伊朗文化因素)相結合，產生了著名的「犍陀羅藝術」(Gandhara Art)。犍陀羅位於南亞次大陸西北

（今巴基斯坦北部），原爲次大陸古代十六列國之一，首府爲咀叉始羅（Taxila，今巴基斯坦的拉瓦爾品第）。一世紀時，貴霜王朝建都富樓沙（Pusapura，一譯布露沙，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犍陀羅成爲貴霜的中心地區。犍陀羅藝術的主要成就在於創造了佛像，從而最終解決了賦予佛陀以人形的問題。在此以前，佛教雖然已經興起了六百年，却只有脚印、法輪、寶座等象徵，並無佛像。犍陀羅佛像的製作大量吸收了希臘式雕像和浮雕的風格，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橢圓形，眉目端莊，鼻樑高而長，頭髮呈波浪形並有頂髻，身披希臘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薩像有時且帶鬚鬚等。犍陀羅藝術產生以後，歷時數百年，對次大陸及周邊地區的佛教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樣，這一藝術後來也影響到了中國的佛教藝術。

就我們這一章所涉及的時代來說，可能正是在亞歷山大東征以後，中國的絲綢才開始從希臘化的大夏轉輸到歐洲去的。

第七節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上古華夏族的服裝是上衣下裳，寬領廣袖，行動不便，尤其不適用於靈活作戰。戰國趙武靈王（前三二五至前二九九年）倡導採用「胡服」，據研究，最主要就是廢去褲子外面所罩的下裳而只着褲子，以便於騎馬打仗。同時，也廢去了長袍式上衣，直接穿上衣外面所罩的褶。褶的形制為短身廣袖的袷衣，也有人說是一種左衽的短袍。左衽是胡人衣式的特點，廣袖大概是為了適應華夏服式，將胡服窄袖改造過了。穿褲而無裳，這在當時是不符合朝會之間的禮服制度的，所以，趙武靈王爲了變易服飾頗費了一番功夫，終於以克敵制勝的需要說服了族中長者，使之在變服中起了模範帶頭作用。這種服飾到戰國末年已漸普遍，以後便成了中國服裝的一部份。

戰國以前中國只有車兵，所謂「騎射」，就是改車兵爲騎兵。前面說過，商殷的先民已經發明了用馬拉車，在殷墟也發掘出了殉葬車馬坑；阿爾泰山區帕茲里克五號墓同

中國產鳳紋絲織品刺繡一起出土的還有一輛四個輪子的高輪車；斷代爲公元前四世紀左右的烏澁水（今阿姆河）窖藏中有一件金製的四馬並駕二人戰車模型；北朝時期，漠北草原還有北狄後裔高車族，以「車輪高大，輻數至多」著稱，可能是遠古中國北方文化的遺產。直到近代，在帕米爾阿賴山區的塔吉克里人那裏，還可以見到這種形式的馬拉雙輪高車。然而，穿褲和騎馬這兩件事，恐怕還得歸功於早年活動於中亞北部草原的斯基泰人的發明。

第二章 秦漢時期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統一中國。從此，中國的文化發展和中外文化交流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有人認為，「秦」的名稱傳到印度，梵文中便有了Cinasthana和Mehāci-nasthana這兩個名詞，從這裏又演變出拉丁文的Sina和Thinae，拜占庭（Byzantium）東羅馬帝國的別稱，因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在古希臘殖民城市拜占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Tzinista，阿拉伯文的al-Sin，以及現在西方通用的China。

爲了防禦匈奴的侵擾，秦始皇把戰國時代北方各國修築的長城連接起來，東起遼東碣石，西到甘肅臨洮，形成了最初的「萬里長城」。此後，好些朝代的統治者都做過修長城的事，留傳至今的主要有漢長城和明長城。漢武帝大舉征伐匈奴取得勝利，將長城

續修到敦煌西邊的玉門關。玉門關以西仍置烽燧，直至羅布泊岸邊。明長城亦稱邊牆，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是現存歷代長城遺迹中最完整、最堅固、最雄偉的實物。現在人們旅遊常去的八達嶺、慕田峪等處都是明長城遺迹。然而，儘管明代上距秦代已經一千六百年，今天的所見之長城多為秦所建，由此可見秦始皇修萬里長城在歷史上影響之大。

有人認為，萬里長城把草原遊牧民與農耕定居居民隔離開來，給雙方經濟、文化交流設置了障礙。實際上問題並不這樣簡單。古代草原遊牧經濟和農耕定居經濟的內部結構本來就有區別：草原遊牧經濟結構單一，牧畜既是生產資料又是生活資料，產品缺乏內部轉化的途徑，其發展有賴於同農耕定居地區的交換；農耕定居地區却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外交換無足輕重，例如，古代中國的對外物資交流，主要都是與奢侈品有關。雙方的立場如此不同，使草原牧民所需的交換不能正常進行，對農耕定居地區的入侵就成了必然要發生的事。然而，入侵雖然經常發生，却也不是正當的交換方式，因為，入侵、殺掠必然要造成經濟、文化的破壞。所以，長城主要是作為軍事防

禦設施，成爲雙方矛盾衝突的產物。長城的作用並不在於阻絕內外的交流接觸，而是在於把這種交流接觸控制在對農耕定居地區不造成破壞損失的範圍之內。長城的走向表明，它所在的地方，大致就是當時農耕和游牧生活的臨界綫。所以，當漢武帝反擊匈奴勝利後，所到之處實行屯田，同時把長城也推進到屯田的地方。我們看到，長城有許多關口，無論如何，這是爲進出長城而設置的。長城沿邊還設置了馬市，這表明長城一綫確實是不同經濟文化的交流、滙聚綫。

秦朝二世而亡（前二二二至前二〇七年），繼而是強大的漢朝（前二〇六至二二〇年）。西漢張騫通西域，越過葱嶺，到了大夏，直接同域外人接觸，使中國人對周邊外部世界的認識開始擺脫傳說與神話的影響。西方也是到這時才把「絲國」與中國同一起來。因此，說絲綢之路到漢代才正式開通，並不過份。同時，中國正式的對外海路交流，尤其是南海路的開闢，也是從秦漢時期才開始的。這是中外文化交流初具規模的時期。

第一節 與朝鮮、日本、東南亞的交往

秦末漢初，燕人衛滿率領移民到朝鮮，於公元前一九四年建立衛氏政權，統治範圍大約不出今平壤一帶。前一〇八年，漢武帝派兵滅衛氏，置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其中樂浪郡在原衛氏統治的中心地帶。前八二年，樂浪郡并有其餘三郡。東漢末，據有遼東的公孫氏於一九六年又分樂浪南部爲帶方郡。此後直到西晉末，三一三年，樂浪、帶方郡爲高句麗（朝鮮三國時代三一三至六六八年建立在朝鮮半島北部的國家，亦作高麗 *Korea*）。另外兩國是半島南部西半的百濟，南部東半的新羅。）所攻陷。現在，兩郡郡治的遺址都在朝鮮半島北部地區找到了。樂浪郡治址位於平壤南郊大同江南岸土城里的台地上。城址內出土的遺物相當豐富，歷年採集所得的有磚瓦、封泥、陶器和銅鐵器等。瓦當上除常見的雲紋外，還發現有「樂浪禮官」、「樂浪富貴」等銘文。特別是在封泥上，除「樂浪太守章」和「樂浪大尹章」之外，朝鮮（縣名）等二十三縣的令、

長、丞、尉的官印都有發現，證明這裏確是當時的樂浪郡治。該郡粘蟬縣治遺址位於平安南道龍岡郡城峴里，城東北遺有東漢元和二年（八五）的粘蟬神祠碑，碑銘內容爲粘蟬長向山川之神平山君祈求百姓安寧、五穀豐登。這是朝鮮半島最早的石刻，帶方郡治遺址在黃海北道鳳山郡石城里，城址內出土有東漢到西晉的紀年磚。城址北面發現的墓磚上有一「使君帶方太守張撫夷磚」的銘文，爲斷定帶方郡治址提供了證據。在上述郡縣遺址附近，發掘了五十餘座墓葬，出土帶銘文漆器達五十七件，多數有紀年，上自西漢始元二年（前八五），下到東漢永元十四年（一〇二）。漆器的銘文中還有廣漢郡或蜀郡等字樣，表明了它們的出產地。

一九五八年，在平壤市貞柏里發現並發掘了年代大體爲公元前二世紀末或稍晚的夫租藏君墓。墓主人的隨葬品中有一顆銀印，印上帶獸紐，印面刻有篆文「夫租藏君」四字，對說明墓主人的身份、時代及藏族所在地區均有重要意義。夫租初爲玄菟郡治，前八二年并入樂浪郡，成爲該郡二十五縣之一，其地在今咸鏡南道咸興一帶。據《漢書·武帝紀》中有關「藏君南閭」的記載，可知藏君即藏族的首領。這枚「夫租藏君」印，

可能是在置四郡初期由西漢王朝授予歲人首領的。看來，由中國傳入的文化在朝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朝鮮原始社會於其時正逐步瓦解。

中日雙方都有秦朝方士徐福（亦名徐市）率上千男女東渡的傳說。中國古籍中最早記載徐福事，當推《史記·秦始皇本紀》。此後，史書、方志轉述記載不絕。宋代歐陽修《日本刀歌》：「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肥沃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卅（*quan*），兒童束髮成兩角）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玩器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七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准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七、八世紀以後，日本記述徐福事迹的文獻很多，如《神皇正統記》、《續風土紀》、《和歌山縣史迹名勝志》等，此外還有不少研究徐福的專著。清末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就記載紀伊國有徐福祠，熊歸山有徐福墓。至今，日本和歌山、佐賀、廣島、愛知、秋田、青森、山梨等縣和八丈島地方，尚保留有許多後人爲紀念徐福而修建的紀念地（包括墓地）。徐福在日本民衆中，有很高的聲譽。有人認爲，徐福率童男女攜五穀（包括稻種）、百工和先進的農業生產工具、技術等東渡日本，對促進日本由繩文文

化過渡到彌生文化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九八二年，有關人員在江蘇省北端的贛榆縣發現了徐福村，經考贛榆在秦代屬瑯琊郡，佐以史書記載等其他資料，認定這裏即秦代著名方士徐福的故鄉。有的學者甚至考證徐福是徐偃王（周穆王時淮夷徐方首領，曾起兵攻周）的第二十九代孫。一九八二年以後調查，還有傳說在今贛榆縣西徐山鄉徐康邑等地，仍散居着徐福的第七十一、七十二代子孫。從當地漢代遺址的分佈和發現的文物來看，徐福村可能是漢代村落遺址。贛榆縣東臨海州灣，很可能就是徐福東渡的起航點。從海洋水文和氣象資料來看，海州灣有利於東漂日本。有關研究人員認為，從海州灣附近東渡日本，有兩條航路可行：

北路：海州灣嵐山頭或連雲港附近——膠東半島成山頭——朝鮮半島西海岸——濟州島——對馬海峽——日本九州、有明海——大隅海峽（主要利用太平洋黑潮主流漂送）——日本本州紀伊半島熊野灘。

南路：連雲港附近古胸山（今錦屏山）沿岸——蘇北外海順黃海沿岸流（由北轉向東）順黃海暖流（由南轉向北）——日本九州、有明海——大隅海峽——日本本州紀伊

半島熊野灘。

日本自彌生時代以降，大量從中國輸入銅鏡，視為寶物或神器。彌生時代中後期，主要是從中國輸入「漢武鏡」（主要是「草葉紋鏡」和「星雲紋鏡」），此外還有本地仿中國鏡而製作的「倭鏡」。裝飾品中的玻璃手鐲和勾形珠等的原料可能自大陸輸入，在日本當地製造。福岡縣須久遺址和三雲遺址甕棺墓中出土的玻璃璧，形制、紋飾與中國的相同，是從中國輸入的。

《漢書·地理志》記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一七八四年，在日本九州福岡縣糟屋郡志賀町出土了一枚「漢委奴國王」金印。印文中的「委」即「倭」字的略寫。據《後漢書·東夷傳》記載，倭人使譯通於漢者約三十餘國，「奴」爲其中一國，地在今九州北部福岡縣境內。《後漢書·東夷傳》記載，建武中元二年（五七），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帝賜以印綬。可見，上述「漢委奴國王」金印很可能就是漢光武帝賜予的。

前二一四年，秦朝征服西甌（今廣東西南部、廣西南部至雲南東南部），在南越

（今廣東）、西甌故地及其相鄰地區建置南海、桂林、象三郡，並徵發百姓前往戍守。於是，幾十萬北方農民留在那裏與越人雜居，開發了珠江流域。秦軍還進入了雒越（今越南）。

秦末變亂，前二〇七年，秦朝南海地方官趙佗割據南海等三郡，以番禺（今廣州）為中心建南越國稱王。前一八〇年，雒越臣服南越，後被分為交趾（今越南北部）、九真（今越南清化、義靜兩省）兩郡。漢武帝於前一二一年發兵消滅趙氏割據勢力，分雒越為交趾、九真、日南（今越南中部）三郡，派遣太守行政，設置都尉統領鎮守的軍隊。郡上有刺史監察，郡下轄若干縣。中國官吏、商人和移民將鐵製農具和牛耕技術傳到越南，對當地生產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當時，越南某些地區還殘存着相當原始的婚姻關係，「不知嫁娶禮法」。東漢九真太守任延又將中國的婚姻家庭制度介紹到那裏，在他的倡導之下，男女「皆以年齡相配」，「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推動了越南社會的變化。兩漢時期，還有許多越南人來中國學習。東漢末，日南人士變會到洛陽遊學，研究《尚書》、《左傳》等經書，後回交趾任太守四十餘年。當時也有一些中國學者流寓

越南，如中國早期的自著佛教典籍《牟子理惑論》的作者牟广，就是在東漢末年全家移居交趾的。這些學者對中越學術思想的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中國和東埔寨交往的最早記載見於《後漢書》。《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八四）春正月，「日南徼外獻生犀、白雉」；同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肅宗（章帝）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邑豪獻生犀、白雉。」研究者認為，「究」（古音讀「甘」）不事」很可能即東埔寨的音譯。

有人認為，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從中國西南經過緬甸通往印度可能已有陸上交通綫；自公元前二世紀以後，中國的絲綢甚至從這條路經印度運到阿富汗。前一二二年，張騫回長安後報告在大夏見到蜀布和邛竹杖，據當地人說是在身毒（印度）從蜀賈（四川商人）那裏買來的。這或許可以為上述交通路綫的存在提供一條佐證。然而，漢武帝想把這條路綫正式開通，但沒有成功。無論如何，緬甸沿岸為當時中外交流的重要通道却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據《後漢書》記載：公元九四年，緬甸「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公元九七年，「揮國（今緬甸境內）重譯奉貢」；公元一〇七年，「僬僯

部族「獻象牙、水牛、封牛」；公元一二〇年，揮國王雍由調「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羅馬帝國）也。揮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彩繒各有差。」據學者們考證，上述敦忍乙、焦僥和揮國等部落、國家都在今緬甸境內。所謂幻人，就是些雜技魔術師。當時的那些雜技魔術，在漢代畫像磚、石和陶俑上還可見到。有人認爲，今天中國雜技魔術中的某些節目，很可能就是古代從緬甸傳入中國的類似節目發展演變而來的。

第二節 月氏西遷與貴霜文化

月氏即先秦文獻中的「禺氏」，其族屬、族源至今尚無定論。有人認爲，「焉耆（今新疆焉耆一帶）讀若烏支，龜茲（今新疆庫車一帶）讀爲屈支，皆與月氏音近，或亦大月氏西遷時所建立之國家」（黃文弼《西北史地論叢》）。據研究，焉耆—龜茲語

（有的學者稱之爲「吐火羅語」）屬印歐語系西支，即與日耳曼語、拉丁語同族。那麼，月氏人有可能是遠古時代從遙遠的西方東遷來的。

漢初，「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史記·大宛傳》），西有烏孫，北有匈奴，南爲諸羌。前二世紀中葉，月氏被匈奴擊潰，向西遷到伊犁地區，原居此地的塞人則被排擠到帕米爾、喀什及和闐（均大致相當於今新疆同名之地），有些則更西到了阿富汗和伊朗毗連地區的塞斯坦。（Sistan，此名即因塞人而來）。前一世紀三〇年代，烏孫西擊月氏而佔據伊犁，於是月氏遠去，「過大宛（今蘇聯中亞費爾干納Farghana盆地）」，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OXUS，今阿姆河）北爲王庭」。約在前一二〇至前一〇〇年間，月氏渡媯水南徙，佔領興都庫什山以北的大夏領土。史書中將月氏遷走部份稱爲大月氏，未遷走而與南山（今崑崙山及其支脈）諸羌雜居者稱爲小月氏。

大月氏分爲五個翕侯。大約在公元初年，貴霜翕侯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擊潰其他翕侯，攻安息（Arsaces，裏海西南一帶），取高附（Kabul，今阿富汗喀布爾一帶），破濮達（Punjab，今巴基斯坦）、印度毗連的勞遮普和罽賓（Kashmir，今克什

米爾），建立了貴霜帝國。《後漢書》所記的貴霜諸王名號，多數可以從出土的貴霜錢幣的銘文得到證實。班超通西域時，貴霜曾援助他討伐車師。公元九〇年，貴霜（大月氏副王謝）出動大軍進攻班超，結果失敗，以後與漢朝通好。貴霜最著名的統治者是迦膩色迦，其在位年代不可確考。傳說他在二世紀初期召開佛教第四次「結集」（合誦、編纂佛教經典），崇奉馬鳴、龍樹諸人所倡的大乘教派，並遣名僧四處傳教。從此，印度佛教以大乘為主，小乘流行於斯里蘭卡、緬甸等地。大小乘都曾傳入中國，但大乘佛教更爲流行。

貴霜文化是古代希臘、印度和伊朗三種文化的混合物。在宗教方面，從錢幣上的鑄像可以看出，印度的濕婆（Siva），婆羅門教和四世紀以後印度教的主神之一）和佛、伊朗的祆神以及希臘的神都受到崇拜。在屬貴霜時期的咀叉始羅遺址中，出土了典型的融匯印度、希臘風格的佛像、菩薩像以及佛本生（佛的善行）浮雕，表明這裏已成爲犍陀羅藝術的中心。犍陀羅藝術流播，不僅中亞、新疆發現的佛像不少是帶有希臘風格的犍陀羅式作品，即使中國內地的許多佛像雕塑也約略可見其犍陀羅風。犍陀羅的佛塔建築

也對印度原有的窣堵婆式圓塔作了較大改動，基座層級加多加高，圓塔本身變為基座的一層，上部傘蓋亦加高增大，從而成為高聳入雲的佛塔。犍陀羅式佛塔經中亞傳入中國，和中國固有的樓閣形式結合，形成常見的多層寶塔。《後漢書·陶謙傳》講到，公元二世紀末，竇融在徐州建浮屠祠，下為重樓，上累金盤，應是中國樓閣式木塔的萌芽。在中國樓閣式塔上，原來的窣堵婆縮小被安置在塔頂，稱之為刹。北魏正光二年（五二二）建造的河南登封縣嵩岳寺塔是中國現存年代最早的磚塔。後期犍陀羅藝術（三至七世紀的「印度—阿富汗流派」，亦稱巴米揚Bamiyan藝術）對中國新疆、敦煌、雲岡等地石窟寺藝術有重大影響。

貴霜帝國位居絲綢之路要衝。迦膩色迦時期，歐、亞貿易中的中國絲綢、漆器、鐵器、印度珠寶、香料，埃及和西亞的玻璃，都要經過貴霜，貴霜商人從中獲取了巨大利潤。本世紀二〇年代開始，法國考古團在阿富汗喀布爾以北八十公里發掘了貝格拉姆遺址，學界認為這裏就是迦膩色迦的夏都迦畢試城。在該城址文化堆積的第二期即貴霜時期，出土了許多來自中亞其他地區以及印度、羅馬、埃及等地的青銅和金質首飾。還有

大量精緻的手工藝珍品，如中國漢代的漆器，印度的象牙雕刻，希臘、羅馬的玻璃器皿及青銅和石膏雕像，腓尼基的玻璃容器等。這說明貴霜王國與東西方各地有廣泛的文化交流和貿易聯繫。當取道伊朗高原的陸上商道被安息人遮斷時，貴霜却能夠提供一條從薄羅（Balkh，一譯巴里黑，故址在今阿富汗北部馬扎里沙里夫附近）經高附、富樓沙至印度西海岸Barygaza（今布羅奇Broach）而與海路接通的一條安全途徑。海上商人可以藉此溝通與埃及亞歷山大港及羅馬帝國的商業往來。

第三節 兩漢通西域

兩漢經營西域，以西漢張騫，東漢班超、班勇父子影響最大。

漢代的西域，有廣義和狹義兩種概念：狹義即指天山南北、葱嶺以東，後來西域都護府所統領的地區；廣義所指除上述地區外，還包括葱嶺以西的整個世界。然而，在張騫「擊空」以前，由於缺乏直接交往，中國對西域僅有傳聞記載，地理概念很不確切，

並且大都蒙上了神話的色彩。這種狀況，加上匈奴阻絕，很不利於東、西經濟文化交流。

張騫在漢武帝時兩度出使西域，他和他的副使們到過大宛（今蘇聯費爾干納Fergana盆地）、康居（今錫爾河中游兩岸及下游右岸）、大月氏、安息（伊朗高原及兩河流域）、身毒（印度）等國，招徠各國人物，開闢了中國與西域各國直接交流的新紀元，在歷史上被譽為「鑿空」。以後，漢朝繼續派使者抵奄蔡、（地在今鹹海與裏海之間，係薩爾馬提人的一支，即後世記載中的阿蘭人。）犂靬（今埃及亞歷山大Alexandria，或作黎軒、犁靬）、條支（今敘利亞一帶）等國。李廣利伐大宛取汗血馬（天馬）之後，使者來往更多了，「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羅布泊）往往起亭，而輪台（今新疆輪台縣東南）、渠犂（更在輪台東南）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漢書·西域傳》）宣帝神爵二年（前六〇），匈奴日逐王來降，於是以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並護北道，這就是「都護」一名的由來。

張騫出使西域本來是為了一「斷匈奴右臂」，即聯合西北各族共同抗擊匈奴，客觀上却起到了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漢代東、西陸路交通幹綫的大致走向是：東起長安，

出隴西高原，經河西走廊到達敦煌。從敦煌西出陽關、玉門關分爲南北兩路：南路沿塔里木盆地南緣，經于闐（今新疆和田）、莎車（今新疆莎車）以達疏勒（今新疆喀什）；北路過白龍堆，經樓蘭故國（羅布泊西北岸），沿天山南麓，歷焉耆、龜茲抵疏勒。從疏勒可向西南越葱嶺至大夏（後爲貴霜所據）；也可向西經大宛再轉南去大夏，大宛向西北可經康居去奄蔡。從大夏可去身毒，向西則可經安息去條支、黎軒。《史記·大宛傳》中有這樣兩段記載：「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西則條支，北有奄蔡、黎軒（軒）」；安息「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這反映，當時的東、西直接交流實際上還限在安息，條支、黎軒必須通過安息的中介才能同漢朝交流。

沿着這條新開闢的大路，漢代絲綢大量地向西方輸出。據《史記·大宛傳》記載，前一一五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黃金幣帛直數千巨萬」，由此可以推知當時絲綢外輸的規模。漢代的絲織物，以新疆發現的爲最多。公元前後，在敘利亞東部沙漠中的綠洲國家帕爾米拉（Palmyra）也出現了與中國新疆樓蘭、尼雅（民豐縣北）出土物同

類的漢代綾錦、彩繪。隨着交流的擴大和漢朝在西域屯田，中國植物桃、杏以及穿鑿井渠、鑄造鐵兵器的技術也傳到中亞乃至更遠的西方。雖然張騫出使只帶回葡萄和苜蓿種子，但漢朝每年派出使節多則十幾次，少也有五、六次，出使遠的據說要八、九年才回來，近的也是幾年回來，可以相信，還有好些帶有「胡」名的植物諸如「胡桃」、「胡椒」、「胡麻」……。是在漢代就傳入中國了。西方的琉璃製品和音樂、幻術也相繼傳來，豐富了中國人的經濟文化生活。

東漢班超父子經營西域，經歷了「三絕三通」，即：

- 一、新莽（公元八至二三年）絕；永平十六年（公元七三）班超通。
- 二、章帝建初元年（公元七六）迎還戊己校尉，罷伊吾屯兵；班超苦心經營二十年，於永元六年（公元九四）再通。

三、安帝永初元年（一〇七）詔罷都護；延光二年（一二三）班勇通。

公元前六四年，羅馬的龐培侵入西亞，將敘利亞夷為羅馬的行省，塞琉古王朝滅亡。羅馬（公元前三〇年以後為帝國）即中國史書中的「大秦」。《後漢書·西域傳》說：

「其（大秦）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闕不得自達。」永元九年（公元九七），西域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甘英抵波斯灣後，爲安息西界船人所阻。安息壟斷絲路貿易的政策至少產生了兩個後果：一是促使羅馬開闢海路直通中國，一是促成蠶種的西傳。據研究，從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來看，中國的蠶絲和蠶種很可能都是經新疆和田向西傳出去的。蠶絲傳到外國比較早，可能在公元前四世紀，「中國的成捆的絲」（cinapatta）已經輸入了印度。至於養蠶繅絲傳到波斯和拜占庭，當是六世紀的事，以後才傳到歐洲。總之，羅馬佔領敘利亞以後，中國絲綢備受珍視。當時及稍後，羅馬城中的多斯克斯區（Vicus Tuscus）有專售中國絲綢的市場。托勒密（Ptolemy）在其《地理志》中轉引他人記載，說公元一〇〇年前後，販運彩繒的馬其頓商人馬埃斯·提提安努斯（Maes Titianus）派出經辦人員到帕米爾之東的塔里木，甚至到絲國的京城從事貿易活動。西方文獻記載東來貿絲人員，當以此人爲先驅。那時候的羅馬貴族不惜高價競相購買中國絲綢。羅馬作家奧利略亞尼（Vita Aureliani）說：「羅馬城內中國絲綢昂貴得和黃金等重同值。以至於近代歷史學家中有人以爲羅馬帝國的

滅亡實由於貪購中國絲綢導致金銀大量外流所致。也有人認為羅馬帝國的興衰都和「絲綢之路」暢通與否息息相關。

古代西域（主要就狹義而言）是一個多種族、多語言不同部族聚居的地方。西漢有三十六國，至東漢更分爲五十五國。由於地處交通要道，又有東西方各種文化在這裏匯聚。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西北探險，在塔里木盆地緣邊、吐魯番和敦煌等地發現了許多古代民族留下的文字材料，結合文獻記載，使人們可以大致推知古代西域各族的文化面貌。例如，在新疆民豐尼雅（漢精絕國故址）和羅布泊故樓蘭國遺址發現的漢代佉盧文簡牘，就是印度西北文字和中原簡牘形式結合的標本；「和闐馬錢」更是塔希臘鑄幣傳統、佉盧銘文、漢文和漢朝衡制於一爐的傑作。

漢朝統治西域，又把大量的漢文化帶到了當地。從制度上看，除了使者、校尉、都護、長史一類的漢官外，西域各國官名也多仿漢制，如監、吏、都尉、將、相、侯之類。西域舊有的官如大祿、百長、千長、且渠、當戶等和漢制官一樣，都由漢朝頒給印綬。從文化發展來看，中國造紙術發明不久，紙張就傳到了西域。本世紀初，在羅布泊漢烽

燧遺址中出土了東漢時的字紙；一九三三年更出土了西漢宣帝時的紙（斷代爲公元前四九年）；一九五九年在民豐也出土了東漢的紙。不過，當時書寫更多還是用的木（或竹）製簡牘。西域簡牘形制受中原內地影響，這已成爲定論。與此同時，漢語言文字也在西域廣泛行用，並被當地人學習使用。出土的漢文本簡除軍政、世俗內容外，還有占卜、藥方、兵法、曆算以及文字小學等文化內容。有一件（一枚竹簡，三枚木簡）是已佚秦朝李斯著《蒼頡篇》中的一節，不意竟在西域保存了下來！從生活習俗來看，如龜茲王絳賓強娶嫁到烏孫的漢公主（解憂公主的妹妹）的女兒，又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莎車王延「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至於高昌（漢車師前部，今吐魯番盆地），大約自漢代已校尉屯駐此地（前四八年）以後，便是漢人居多，漢文化爲主。一直到唐代貞元七年（七九一）陷入吐蕃，一共維持了八百三十九年。

總之，迄今爲止的中亞文明史研究表明，中亞地區除了騎馬、穿褲之類的遊牧文化外，幾乎沒有任何「固有的」文化不是受外來文化影響產生的。沒有特點正是中亞文化

的特點。張騫通西域之後，中國文化迅速加入了這個文化國際市場。西域諸國，對新穎優美的漢文化先是驚嘆，既而欽慕接受。於是，中國、印度、安息三大文化激盪於西域，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第四節 匈奴西遷

匈奴是從秦到東漢初年活動於中國北方草原的主要民族，當時控制着東、西交往的「草原之路」。在外蒙古中央省各地發現的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一世紀的匈奴城址和墓葬內，普遍出土帶有「新神靈廣成壽萬年」等漢字的織錦、「建平五年」等銘文的漆耳杯及銅鏡、五銖錢、板瓦、筒瓦、卷雲紋瓦當和陶器等漢代遺物，表明漢文化對匈奴文化有深刻的影響。在外蒙古發現的這些匈奴墓葬中，最著名的是諾彥烏拉墓地。一九二四年，蘇聯科茲洛夫探險隊在烏蘭巴托北方約一百公里的色楞格河支流哈拉河流域的諾彥烏拉（Noin-Ula）山中發現了三羣共二百二十二座古墓。當時發掘出土的遺物中有

刺繡的絲織品如掛布、衣服等，還有中亞所製的毛織物，漢代漆器、青銅容器，北方系統的青銅器以及木器等。諾彥烏拉墓地發掘過三次，然而，已發掘的還不及總數的十分之一。出土物中，有漢代文物如銅燈、銅壺、花草紋銅鏡，織有「仙境」、「皇」等漢字的織錦及有「建平五年蜀郡西工造」等六十七個漢字銘文的漆耳杯。在諾彥烏拉二十四號墓出土的一件中國絲織物上，繡着鳥形格里芬怪獸；六號墓棺內墊氈上的刺繡花紋，爲斯基泰西伯利亞系統的鬥獸圖像。諾彥烏拉是蒙古語「王侯之山」的意思，推測這裏的大型墓係匈奴單于或貴族之墓。本世紀四〇年代，在蘇聯南西伯利亞哈卡斯州阿巴干（Abakan）市以南八公里的「力量」集體農莊發現中國式建築物「李陵宮」，屋頂用板瓦及筒瓦覆蓋，房檐有圓形瓦當，上有反印的漢隸八分體「天子千秋萬歲常樂未央」，中國式的鋪首却鑄出了高鼻樑的歐羅巴種人的形象。這些都表明，匈奴所據的北方草原在漢代也是一個東西文化交流匯聚的地區。

早在上古時期，就存在着一條安德羅諾沃文化（見本書第一章第二節）部落從中亞北部草原南下的路線。阿爾泰山區帕茲里克墓地還發現有格里芬怪獸等伊朗阿契米尼型

藝術成份。本世紀三〇年代末，在蘇聯中亞塔拉斯地區的多羅諾（Дорно）村，即肯科勒（Кенкол）河與塔拉斯河匯合處的東面一座山坡上，發現了一批古墓葬，其中的九號墓出土有漢代彩緞製作的衣物、刺繡以及漢製漆器等文物。衆所周知，處在北方草原與南部綠洲毗連地帶的塔拉斯正好位於北方草原經中亞向西南同伊朗聯繫的要道路口上。這樣一條路綫同「草原之路」聯接起來，便使草原遊牧民族有可能充當東西文化交流的中介人，同時也給他們以壟斷東西貿易的機會。本來，「綠洲之路」上的西域各國一直是東西交往的中介人。然而，漢初匈奴強大起來，便在西域置僮僕都尉，稅斂各國。甚至張騫出使「傍南山欲從羌中歸」，也被捕送匈奴，東西陸路交流完全被壟斷起來了。因此，從文化史的角度看，漢、匈之爭也可以說是定居農業文化同草原遊牧文化之爭。

漢代，匈奴由於天災、人禍以及漢朝軍隊的打擊，發生過兩次分裂：

第一次是在西漢宣帝時期（公元前七三至前四九）出現的五單于並立局面。結果是呼韓邪單于在甘露元年（前五三）歸漢，引衆南徙陰山附近。竟寧元年（前三三），漢元帝以宮人王嬙（昭君）嫁給呼韓邪單于，恢復了和親。建昭三年（前三六），西域副

校尉陳湯曾發西域各國兵遠征康居，擊殺了與歸漢的呼韓邪單于爲敵的郅支單于，匈奴的勢力才在西域消失了。

王莽篡漢，匈奴的勢力有所發展。但到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四八），匈奴日逐王比被南邊八部擁立爲南單于，他襲用其祖父呼韓邪單于的稱號，請求內附，得到東漢的允許。匈奴又一次分裂，成爲南北二部。

南匈奴自建武二十六年（五〇）內遷，至晉惠帝永興元年（三〇四）劉淵建立政權，中間經歷了二百五十四年。這期間，儘管南匈奴人在逐步轉向定居農耕生活，但除了上層貴族生活習慣和文化教養受漢文化影響較深外，匈奴仍然聚族而居，社會結構變化不大。只是當劉趙政權建立之後，匈奴共同體徹底瓦解，他們才逐漸都漢化了。

永元三年（九一），漢軍出居延塞（今內蒙古西部額濟納旗一帶），圍北匈奴單于於金微山（今阿爾泰山）。匈奴戰敗後離開了蒙古高原，向西踏上了漫漫的遠徙路程。其餘衆後來歸附於興起的鮮卑。

從公元九一年北匈奴開始西遷，到三七四年匈人（Huns）首次出現在東歐頓河之

績，其間經過了二百八十三年。匈奴人遷徙究竟到哪些地方，他們和歐洲史上匈人的關係如何？許多學者曾對此作了大量的研究。現在看來，可以肯定匈人就是匈奴，他們的後裔後來同馬札爾人（Magyars）融合，成爲今天匈牙利人的祖先。

匈奴西遷，先後在悅般（烏孫舊境，今新疆西部）、康居、阿蘭逗留過。阿蘭就是張騫西行時所知道的奄蔡，他們的居地在漢代西域北道的終端，即北海（今裏海）一帶。阿蘭一名亦見於希臘作家斯特拉波（Strabon，約前六四至約二一）的記載。阿蘭的一支於三七一年被西遷匈奴擊潰後，曾與汪達爾人（Vandals，古日耳曼人的一支）一道西遷法蘭西和西班牙，並與後者在北非建國（四一八至五三四）；留在高加索以北的阿蘭人後來南遷入山，因此，高加索山脈中最著名的山口——達列阿爾（Darjal）山口在歷史上曾被稱作「阿蘭之門」。

西遷匈奴在世界歷史上的作用並不在於他們的雄主阿提拉（Attila）曾經於四三〇至四五五年間在東起鹹海、西至萊茵河、南至阿爾卑斯山、北至波羅的海的廣大地域內建立過一個曇花一現的「匈奴帝國」，而在於他們的西遷導致了歐洲大陸上的日耳曼民族

族大遷徙。以三七四年匈奴人驅使被征服的阿蘭人攻打黑海北岸東哥特王國為標誌開始的民族大遷徙，除了上述阿蘭人和汪達爾人的那一支外，還有益格魯人（Angles）和撒克遜人（Saxons）向西取得曾為羅馬帝國殖民地的不列顛島，這就是今天英、美兩國人的祖先。更重要的是，被匈奴人擊潰的西哥特難民逃入羅馬帝國境內，在已經腐朽沒落的帝國境內引起了更多的騷亂。三七八年，皇帝瓦倫斯在鎮壓哥特人時戰死。三九五五年，羅馬帝國遂分東、西。然而，蠻族入侵有增無減，阿提拉率領的匈奴人也曾攻掠意大利本土，西羅馬皇帝只能靠蠻族僱佣軍來苟延殘喘。四七六年，帝國的日耳曼僱佣兵首領奧多亞克推翻了最後一個皇帝羅慕洛，西羅馬帝國遂告滅亡。一般認為，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標誌着世界史上古典奴隸制社會的終結。

第五節 漢代東西海路交流

中國從漢代開始就開闢了通向印度洋的南海交通。《漢書·地理志》中記載有漢武

帝時期的近海海路行程，大致是從中國東南海港（日南、儋塞、徐聞、合浦等地）出發，繞過印度支那半島和馬來半島，到達印度東海岸的黃支國（Kanchi，即《大唐西域記》中的達羅毗荼國 Dravida 大都城建志補羅 Kanchipura，今印度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臘姆）。《漢書·地理志》還說：「從滅趙佗（陀）爲郡，近海多犀、象、毒冒（璆瑁，形狀像龜，產於熱帶海中，甲可做裝飾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這意思是說，中國商人到南海做生意的都發了大財，番禺（今廣州）就是做這類買賣的一個中心。

一九五三至一九七八年間，廣東的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發掘了六百多座漢墓。在西漢中期以後的墓裏有較多的串珠出土，包括瑪瑙、鷄血石、石榴石、煤精、水晶、玉、琥珀和玻璃等不同質料，還有疊嵌眼圈式玻璃珠和藥物蝕花的肉紅石髓珠。化驗的千個玻璃珠樣品，表明與中國古代鉛銀玻璃系統截然不同，應是經南海輸入的。出土物中還有一種托燈的陶俑，深目高鼻、裸體，頭頂上托燈盤，作跪坐或蹲坐的姿態，似是海外「奴隸」的形象。這些器物的發現，說明當時廣州（番禺）海路通商貿易相當發達。

九七五年，廣州市文物管理處在廣州市區中心舊稱「禺山」的地方（南距今珠江北岸一三〇〇米），試掘了一處秦至漢初的造船工場遺址，揭出一部份船台區和木料加工場地。一號船台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為距今二一九〇±九〇年（即公元前二四〇±九〇）。按一、二號船台現存的寬度推算，兩船台可分別建造身寬五至八米，載重二十五至三〇噸的木船。這個規模巨大的造船工場及其先進的船台結構，表明秦漢中國的造船技術已經相當發達，這適為前述文獻記載的漢代南海交通提供實物證據。一九七一年冬季，在廣西合浦縣城東南望牛嶺上發掘了一座西漢後期地方官吏的墓葬，墓中出土的瑪瑙、琉璃、琥珀等裝飾品，可能是從海外運來的。研究者認為，這些文物與當時合浦是對外貿易港口有關。

在印尼雅加達博物館，陳列着中國漢代製造的綠釉陶器和黑釉陶器，說明寫着是從爪哇和蘇門答臘出土的。有人因為古代東、西海路交流主要為沿途所發現的歷代（主要是唐、宋以後）陶瓷所證實，亦將這條南海之路名之為「陶瓷之路」。也有人因為通過南海之路轉輸的主要貨物是各種香料，又將南海之路稱作「香料之路」。不過，這條南

海之路由於技術（包括造船術和航海術）的原因，在開初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限制在印度以東海岸。再往西就得靠外國船輾轉運輸。

希臘人的塞琉古王朝和印度之間除陸路交通外，從海灣（波斯灣）到印度西海岸也有海路頻繁往來。但是，在托勒密朝（Ptolemies，前三〇五至前三〇）的埃及，儘管其都城黎軒（Alexandria）與東方早就有陸路往來，但與印度的海路交流，却一直掌握在阿拉伯人的手中。

阿拉伯人（或許還有印度人等）一向保守着印度洋上信風（由地球自轉導致的行星風系，各風帶有盛行的風向，但風帶位置隨季節而有南北移動。）的秘密。公元四五（一說七九）年，羅馬水手希帕努斯打破了這個秘密，在印度洋上看出了定期改變風向的信風可用於橫渡大海。一世紀六、七〇年代，住在埃及的一位希臘商人寫了一本《紅海周航記》（*Periplus Maris Erythraei*），為西方人提供了在印度洋上航行的指南，東西方海路交通就在印度聯接起來了。安息斷絲路貿易的政策，進一步促使大秦（羅馬）開闢海路直通中國。《後漢書·西域傳》：「至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大秦王

安敦遣使自日南徼（邊境）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所謂安敦，據考證就是羅馬皇帝Marius Antoninus（161—180）。這次遣使，有人認為是住在敘利亞的羅馬商人經商到交趾，在當地弄了一些土產，假借名義來進行貿易的。一九四二年，在越南南方湄公河三角洲的Océ地方發現了一處古代扶南國（一世紀至七世紀中葉）的海港遺址，出土文物十分豐富。最重要的是，出土羅馬文物當中有一枚羅馬皇帝Antoninus Pius的金幣，上面鑄有他即位一五年（一五二）的銘文。同時，又有一件漢製夔鳳鏡殘片，銘有漢文「主至」二字。扶南正在日南徼外。這些文物，證實了《後漢書》關於大秦通使的記載。總之，南海路當時主要還是一條近海航路，交流多半是由沿途口岸中介進行，這些口岸也從轉口貿易中得到好處。

《漢書·地理志》記載：漢代「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賫黃金、雜繒而往，……（外國）賈船，轉送致之」。璧琉璃應當就是玻璃器。據研究，中國經印度輸出的有香料、生絲、練帛、毛皮等，輸入的主要是黃玉、珊瑚、安息香、乳香、玻璃器、銀器、銀幣。埃及在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就製造玻璃。

羅馬統治時期，埃及的亞歷山大城（黎軒），敘利亞的西頓（Sidon）、推羅（Tyre）都是玻璃工業中心。《魏略·西戎傳》說：「大秦出赤、白、黃、綠、紺、縹、紅、紫十種琉璃」。廣州橫枝岡西漢中期墓（M₁₅）出土的三件玻璃碗，有可能是中國出土最早的羅馬玻璃器皿。此外，屬於漢代進口的羅馬玻璃器在江蘇邗江甘泉二號漢墓和廣西貴縣東漢墓也有出土。經檢驗，中國出土羅馬玻璃成份是普通硅酸鹽玻璃，即鈉鈣玻璃，與現代玻璃無太大差異。鈉鈣玻璃和鐵棒技術是西方玻璃的一般工藝特點，隋代以前的國產玻璃器皿沒有發現採用這兩項工藝。這裏所謂「國產玻璃」是指鉛鋇玻璃，即通常所說的琉璃，可能在戰國時期中國就會製造了。

第六節 佛教傳入中國

佛教是釋迦牟尼（Sakyamuni，公元前五六六至前四八六）創立的一種宗教，現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對中國歷史文化影響很大。

釋迦牟尼生於古印度北部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南部提羅拉科特附近。），所以佛教最初僅流行於恆河上流地區。至孔雀王朝（約公元前三二四至前一八五）阿育王時，相當於中國秦代，佛教漸漸西傳。大夏王彌蘭（Menander，約前二世紀上半葉）佔領高附及西印度，問法於名僧龍軍，標誌佛法向西北傳播。佛教盛傳在貴霜（大月氏）時期，尤其是迦膩色迦，相傳為護法名王。貴霜位居交通樞紐，佛法東傳，貴霜之地十分關鍵。中國有「永平（漢明帝年號）求法」傳說，說早期在中國流行的《四十二章經》就是從大月氏寫取來的，可見東漢時認為大月氏是佛教盛地。

《三國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說：「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前二），博士弟子景盧（他書又作景慮、秦景憲、秦景、景匿）受大月支（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曰，復立[豆，Buddha]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浦塞（Upasaka，優婆塞）、桑門（Sramana，沙彌）、伯闍（Svavaka，聲聞弟子）、疏問、白疏闍、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今印度），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一般認爲，這就是佛教最初傳入中國的真實記載。

應該注意到，在這段記載中，提到了所謂「老子化胡爲佛」之說，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當時漢代迷信陰陽、五行、讖緯之說，好鬼神、星相、方術之類及祠祭、咒詛等事。神仙方士從秦始皇以來就極重要，歷西漢武帝等時期，至東漢更盛。所以王充（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年即公元二七年）著《論衡》，有《論死》、《祭意》諸篇。佛教初來，就雜在這多種神仙方式中流行。東漢至桓帝（一四七至一六七）以前，雖然續有佛家傳教者東來，但譯事未興，多由口傳。中國人僅知其戒律禪法之大端，以及釋迦行事教人之概略，因而以爲與本國神仙方術之祠祀、黃老學說之無爲相似。信教者也借此推行其教。雙方既漸漸接近，於是有人偽造化胡故事，以爲中外學術本出一源，殊途同歸，實無根本差別，可以兼奉並祠。因此，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以仁祠，最後，於公元七〇年，竟以鬼神方術獲罪；桓帝則在宮中並立黃老浮屠之祠，臣下亦合二者爲一。至桓、靈（一六八至一八八）之世，安息僧安清（世高）、大月氏僧支（婁迦）讖等相繼來華，在洛陽翻譯佛經，中國佛徒才有所依據。安譯爲小乘，支譯爲大乘，但在當時，

安世高實爲佛學巨擘。支譯大乘《般若》，其實到魏晉時期才風行起來。

文獻記載的最早的漢人出家僧侶是東漢靈帝時的嚴佛調，臨淮（今安徽泗縣東南）人。他曾與安息來華商人安玄共譯《法鏡經》一卷，安玄口譯，佛調筆受。嚴佛調撰寫的《沙彌十慧章句》（一卷）是中國最早的佛教著作。

漢獻帝初平四年（一九三），丹陽人笮融爲徐州牧陶謙督廣陵等郡漕運，他盜用官運錢糧，大起浮屠祠，造銅浮屠像，用免除徭役來招納信徒，「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這是中國佛教造像立寺和大規模接收信徒之始。

漢代，佛教剛傳入不久，在社會上影響並不大。魏晉以降，佛教同中國固有文化因素結合起來，就對中國思想、文化、藝術乃至倫理道德、社會習俗各個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魏晉文學、唐代禪宗、梵唄與四聲、詩律、梵語與字母、音韻，從講經、俗講演化出變文、話本小說，等等。佛學最終成了中國文化體系的組成部份。可以說，中國原來關於天、自然、社會、人生的成套觀點和體系，正是因爲揉雜了從印度佛學中汲取

的成份，方才取得了它後期特有的面貌。否則，宋代不會出現理學，金、元不會盛行全真教。黎錦熙先生曾以吃飯比喻中國文化消化印度佛教的情況，他說：「這餐飯整整吃了千年」（《佛教十宗概要》）。

佛教在傳入中國過程中，無疑是受到了西域所傳佛教的影響。但是，據季羨林先生研究，中國同佛教最初發生關係還是直接的。漢文「浮屠」一詞的出現早於「佛」，是梵語Buddha的音譯。「佛」是西域龜茲語的puṭ或puṭ，或焉耆語的paṭ。如前所述，西域人來華譯經，數安清最早，那已是桓、靈之世。就佛教傳播的長期過程來說，中國內地與西域的交流起到了互相補益的作用。例如，早期和闐語《金光明經》寫本大致符合梵文原本，兩者基本上可以相互對勘；但是，晚期和闐語本Suvarna-prabhasota-sutra則與梵本相去較遠，反而和義淨在公元七〇三年所譯的《金光明最勝王經》極其相似。如果考慮到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中存貯的漢文《金光明最勝王經》之多，就有理由認為，晚期和闐語的同一佛典的譯本Suvarna-prabhasota-sutra應當就是漢、梵、于闐三種文化匯聚的產物。此外，人們還可以從漢地禪宗傳入吐蕃，在敦煌和吐魯番地區出土了用

藏文字母書寫的回鶻語譯自漢文的佛教文獻等方面找到文化匯聚的大量例證。

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

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的基本特點，過去有人概括爲「北方民族大融合，南方經濟大發展」，但這並不排除南方亦有民族融合（如山越、蠻、僚等的漢化），北方經濟也在發展。

匈奴、羯、鮮卑、氐、羌等「五胡」進入中原建立政權，導致其部落組織瓦解，逐漸與漢族融合。在民族融合過程中，許多胡物（如胡餅、胡飯、胡羹、胡麻、胡椒、胡瓜、胡蒜、胡葱等等）、胡俗（如胡牀胡坐、胡舞胡裝等）、胡歌（如《敕勒歌》）、胡樂（如羌笛、胡笳）漸漸成了中原社會文化生活的一部份。還有，大抵是受北方諸族粗獷豪悍性格的影響，北方文學形成了所謂「河朔文風」。河朔，是黃河之北地域。《隋

書·文學傳》序：「江左官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若能掇彼清音，簡茲彙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降至唐代，二者就基本合流了。

然而，文化交流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雖然十六國時期有石勒信張賓、苻堅重王猛這樣的例子，但也有赫連勃勃殺韋祖思這樣的現象。太和十八年（四九四），北魏孝文帝爲爭中原正統，遷都洛陽，厲行漢化，有禁胡語、斷胡服、改姓氏、定門第、婚名族等措施，但後來又有反漢化的六鎮之亂。（六鎮是今河套西北到河北張北縣一綫的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等六個軍鎮，本來是北魏抵禦柔然、屏蔽首都平城即今大同的軍事要地。孝文帝遷都後，鎮民地位下降，處境惡化，遂於北魏末年暴動，導致東、西魏分立。）當然，在中原地區，傳統的漢文化還是主流。例如，隋唐的官制、兵制、刑法、田制、賦役制等等都淵源於漢魏兩晉南北朝，並沒有因爲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而相應發生任何重大改變。然而，我們也看到進入中原諸族和異質文化在中國文化發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以至於胡三省在注《資治通鑑》時慨嘆：「自隋以後，名稱

揚於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卷一〇八）總之，魏晉南北朝對中國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來說都是一個大發展的時期。

第一節 東西陸路交流的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東西陸路交通有很大發展。敦煌以西，除了前期已有的兩道外，《魏略·西戎傳》又記錄了一條「避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而到高昌並轉西與中道（原北道）合的新道。《漢書·西域傳》曾經記載：「元始（公元一至五）中，車師後王國（今新疆吉木薩爾縣一帶）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隔」，當時因車師後王阻撓沒有開通。這條路到隋代已發展成經伊吾（今哈密）西去，大致傍天山北麓而行，渡北流河水（碎葉川），最遠可到拂林（Palm，東羅馬即拜占庭帝國）的北道。

中國北方地區曾先後出土一批不同時期的東羅馬金幣，表明南北朝時期雙方交往比

較頻繁。目前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東羅馬金幣是一九七三年在河北贊皇南邢郭李希宗夫婦墓中出土的一枚，是東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 408—450）時期鑄的。一九五九年夏天，在內蒙古土默特旗畢克齊鎮出土的一枚東羅馬金幣，是列奧一世（Leo I, 457—474）時期鑄的。更有意義的是，李希宗夫婦墓出土的另外兩枚金幣，是查士丁一世（Justinus I, 518—527）和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us I, 527—565）舅甥共治的五二七年鑄的，下距李希宗妻崔氏入葬的五七六年還不到五十年。一九七八年，在河北磁縣東魏高湛之妻柔然鄰和公主墓中，也發現了上述鑄於五二七年的東羅馬金幣，下距墓主入葬的五五〇年就更近。此外，早在一九一五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就發現過查士丁尼一世金幣的仿製品。研究者認為，這些情況顯示北朝時期自西域東來，經由黃河河套地區的路綫相當頻繁，這應與當時活躍於北方草原之路的諸遊牧民族（柔然、突厥等）有關。

除東羅馬金幣外，經由上述河套地區的東西交通路綫上，還發現了羅馬風格的玻璃器。一九六五年，遼寧省博物館在該省北票縣西官營子村發掘北燕貴族馮素弗（死於四

一五年)墓，出土五件玻璃器。樣品分析結果表明，這些玻璃器是鈉鈣玻璃，與羅馬玻璃的基本組成相似。最有趣的是一件淡綠色透明的鴨形器，器形與公元一至二世紀地中海地區流行的一種鳥形玻璃器相似。河北景縣北朝晚期祖氏墓出土的淡綠色波紋玻璃碗，裝飾非常精緻，腹部纏貼三條波浪紋，波峯互相銜接，形成網絡紋。裝飾技法與祖氏墓波紋碗相似的玻璃器在國外發現較多（如黑海北岸、南俄草原），朝鮮半島慶州五至六世紀的古墳中也出土了風格相似的波紋玻璃杯。推測中國和朝鮮出土的這類玻璃器皿，可能都是通過草原之路從黑海北岸運來的羅馬製品。

經北方路線傳入中國的還有金銀器和青金石飾件。到目前為止，中國尚未發現青金石礦產，出土的青金石飾件，玉料均產於阿富汗。一二七一年，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就曾在阿富汗東北巴達克山的考噶羌（Kokcha）山谷中，發現古代在石灰岩中開鑿青金石的遺迹。在江蘇徐州二世紀前期磚室墓中出土的獸形鍍金銅硯盒上，即嵌有小塊青金石。六、七世紀傳入的飾物中，鑲嵌青金石的比較多，如河北贊皇李希宗夫婦墓出土的金指環和西安西郊六〇八年的李靜訓墓出土的金項鏈上，都嵌有陰刻大角鹿紋的圓形

青金石，後者還嵌有另外幾件方形和圓形的青金石。李靜訓墓還出土一對形制特殊的金錫，它和山西壽陽五六二年的庫狄迴洛墓出土的陰刻走獅紋圓形瑪瑙帶飾估計都是中亞或西亞傳入的。

張騫首次出使西域歸國時，爲了躲避當時佔據着河西走廊的匈奴，「傍南山欲從羌中歸」，這反映當時在沿南山（崑崙山及其支脈）東、西分佈的諸羌之間，可能有一條輾轉連接的交通路綫。晉、南北朝時期，吐谷渾排擠諸羌，據有今青海之地。由於南、北對立，東晉南朝便經過吐谷渾同西域及漠北柔然聯繫，從而發展了益州（今四川）至鄯善（今新疆若羌）間與河西走廊平行的「河南道」。（吐谷渾據有今青海省黃河以南地區，南朝封其爲河南王。）大概由於沿途相對安定一些，有的北朝人如宋雲、惠生西行取經也走這條道。一九五六年，在青海西寧舊城內發現大約五世紀末埋藏的盛貯金屬貨幣的陶罐一件，其中銀幣約在百枚以上，後來收集到七十六枚，都是薩珊波斯（Sassanids）繼安息之後在伊朗建立的王朝，二二六至六五一）國王卑路斯（Pirus，457—484）時所鑄，可以看作是二至六世紀時河南道上東西交流繁盛的證據。

薩珊銀幣是迄今發現數量最大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外交流遺物，已發現了四九起，總數一千二百枚，涉及鑄造時間前後近三百五十年。實際上，薩珊銀幣當時是流通於中亞至東歐這片地域上的國際貨幣，六、七世紀間，甚至還通用於中國河西地區。《隋書·食貨志》：北周（五五七至五八一）「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近年刊佈的吐魯番出土文書表明，不僅麴氏高昌（南北朝至初唐時期吐魯番盆地的地方政權，四九九至六四〇）有「官藏銀錢」，而且直到唐高宗（六五〇至六八三）時期，西川（唐滅高昌設）地區錢幣還是多用銀錢。到了武則天如意元年（六九二），文書上才見到「銀錢二文准銅錢六十四文」這種字樣。由此可見，《唐律疏議·雜律》中說金銀等錢不通時用，私鑄不坐，想來是後來屢入的開元（七一三至七四一）律的規定。

傳到中國的薩珊文物還有金銀器和玻璃器。西晉（二六五至三一六）詩人潘尼在《疏璃碗賦》中說：「覽方貢之彼珍，瑋茲碗之獨奇，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其由來阻遠。」明確說玻璃碗經綠洲之路輸入中國。新疆出土的薩珊玻璃殘片及敦煌壁畫上磨花玻璃的畫面，都是薩珊玻璃器由陸路輸入中國的證據。中國發現最早的薩珊玻璃器，

是湖北鄂城三、四世紀之際的墓葬中出土的有圓形磨飾的圓底玻璃碗；其次有六世紀中期寧夏固原李賢夫婦墓所出的有圓形突起裝飾的玻璃碗；較遲的有八世紀（一說爲七世紀初）的西安何家村窖藏中出土的貼飾環形裝飾的平底玻璃杯。日本傳世和出土的薩珊玻璃不少，學界公認，那是從中國傳過去的。

《北史·大月氏傳》記載，北魏太武帝（四二三至四五二）時，有月氏商人到平城（今山西大同）生產了大批玻璃。一九六四年，在河北定縣北魏塔基出土七件國產玻璃器，採用了國外的吹製成型工藝。研究者認爲：五世紀時中亞的工匠將吹製玻璃技術傳到中國，這是中國玻璃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北魏以後的玻璃器皿，絕大多數都採用了吹製技術。

中國在五至八世紀，統治集團上層盛行使用金銀器皿的風氣，應是受到中亞、西亞的影響。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遺址的窖藏中，出有捶鏢（使金屬器表面凸出形成花紋的加工方法）出海獸紋的八曲銀洗、捶雕纏枝葡萄紋高足鍍金銅杯、高雕人物紋高足鍍金銅杯、鑲嵌高足鍍金銅杯和綫雕人物紋高足銀杯（高足佚）各一件，均來自中亞或西亞。

大同西郊五〇一年的封和突墓出土一件鍍金銀盤，盤內中心捶鏢出伊朗人執矛獵獸的圖像，是一件罕見的波斯薩珊朝銀器。固原李賢夫婦墓出土捶鏢出三組人物圖像的鍍金銀壺和贊皇李希宗夫婦墓出土捶雕水波蓮花紋銀碗，器形紋飾都與中國傳統工藝不同，這大約都是中亞、西亞的輸入品。在器物傳來的同時，紋飾藝術及加工工藝也傳來了。如上所述，捶鏢本不是中國技法，但在河北景縣五六五年的封子繪墓却出土了具有仿金屬器捶鏢效果的仰複蓮六系青瓷尊。專家認為，這件瓷器是當時中原青瓷的代表作。仿捶鏢為瓷器造型，應該視為外來工藝在中國的發展。

交流總是雙方甚至多方的，傳播之後往往還有反饋。吐魯番阿斯塔那東晉升平十一年（三六七）墓出土的一雙織成（手工編織）履，履面上現出對獅紋，並織有「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長」的漢文。這是迄今所知有對獸紋飾且年代明確的最早一件絲織品。出土的六世紀中葉的織錦中，漢錦紋飾已趨於消失，聯珠、對禽對獸紋逐漸流行。

聯珠圈飾，（用作畫面分幅，與中國傳統的方格分幅不同。）禽獸相對的意匠和對禽中的孔雀，對獸中的獅、象、單峯駝等形象，以及植物中的蓮花、對列的忍冬和蓮花

化生、迦陵頻迦（雙手合什或持花作供養狀的人面鳥形象）等，原本是中亞、西亞和佛教藝術中所慣見或受其強烈影響而產生的題材和風格。有這類新格調的織錦，大約都是中國爲了外銷而專門設計的。中原絲織技術至少在五世紀就傳入了西域。吐魯番出土（北涼承平八年翟紹遠買婢券）中有「丘慈（龜茲）錦」字樣。（北史·西域傳）記載波斯國出產有綾、錦；吐魯番哈拉和卓九〇號墓（五世紀下半期）出土文書中也寫有「鉢（波）斯錦」；（南史·夷貊傳）：滑國（嚙唃）於「普通元年（五二〇）遣使獻黃獅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經南北朝到隋唐，中國絲綢的織造技術和花紋反而受西方影響起了很大變化，如斜紋組織、緯綾顯花以及蠟染和絞纈。薩珊波斯式的那種聯珠圈紋邊飾，在隋唐時代很是流行。吐魯番阿斯塔那十八號隋墓出土一件對駝紋織錦，織有漢字「胡王」，更說明這是中國織工採用薩珊式圖案織出的外銷產品。今天看來，多種文化滙聚而成的唐代藝術，已是中國傳統藝術的一部份。人們把唐三彩作爲古代藝術品進行仿製、欣賞，很少人會同時體味到駱駝和胡俑造型的異國情調。唐代絲織物有許多傳入日本，對日本的絲織業也產生了影響。這些珍品，有的現在仍藏在奈良大寺正倉院。

不僅是漢地佛教，中原地區信仰的道教及某些民間祀奉習俗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傳入西域。吐魯番出土73TAM524:34(a)號文書《高昌章和五年（五三五）取牛羊供祀帳》中記載的既有漢人，也有胡人，如「康（Samar-kand）祈羊一口，供祀丁谷天」、「康酉兒牛一頭，供俗里祀」等。《北史·西域傳》說高昌「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這些已為新疆考古發現的古抄本《毛詩序》等漢文典籍所證實。一座較晚的高昌墓中還發現了一件粟特文書，它大約可作為高昌文字「兼用胡書」的物證。一九八六年刊佈的一批漢、龜（茲）二體圓形方孔五銖鑄幣（斷代為三、四世紀間至七世紀），更從社會經濟生活的角度反映了漢文化在西域的深入。

在新疆民豐尼雅遺址，出土過七百多件用佉盧文書寫印度俗語的木牘、帛書、羊皮文書和與一部份佉盧文書同出的四十八枚漢文本簡。漢文本簡有晉泰始五年（二六九）紀年，由此可推知這批佉盧文書的大致年代。經研究知道，佉盧文文書都是鄯善的公私文書，有鄯善官吏的公文，有私人往來的函件和契約、簿籍，還有與佛教有關的各種

記錄。漢文本簡有敦煌太守和涼州刺史的文書，有西域長史營轉寫來的晉朝詔書和晉朝給鄯善、焉耆、龜茲、疏勒、于闐五國國王下詔的抄件。有意思的是，木簡中也有少數民族之間來往的漢文書信。有一條簡文爲：「休烏宋耶謹以琅玕一致問」，休烏宋耶顯然是少數族人名。

魏晉前涼時期的西域長史營駐在羅布泊西北故城，這裏出土有漢文、佉盧文、粟特文的寫在木、絹、紙上的各種文書。漢文文書數量最多，其中有外地寄給西域長史的函件和西域長史營掾屬（吏員）承辦的文件。按魏晉官制，長史營隸屬駐在高昌的（戊己）校尉府。前涼置沙州（治在今敦煌），西域長史營改隸沙州，進一步加強了鄯善地區（今若羌、且末）同中原內地的聯繫。唐代沙州繼承了前涼沙州的建制。

更遠，在葱嶺以西，蘇聯塔拉斯地方發現了中原地區鑄造的「位至三公銘」銅鏡。這種銅鏡是從東漢後期的「雙頭龍鳳紋鏡」演變而來的。在潘吉肯特（Panzhikent，今中亞撒馬爾干以東六十公里）古城遺址中發現北周保定元年（五六二）所鑄的「布泉」銅錢。潘吉肯特是粟特人的故國，銅錢可能是粟特商胡們帶回去的。

第二節 「東亞漢文化圈」的開始

有許多學者都注意到，亞洲東部（中國、朝鮮、日本、越南）的歷史文化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有人歸納為四點：（一）漢字文化；（二）儒家思想；（三）律令制度；（四）佛教信仰。這些共同點的基礎是漢字文化，因為儒教、律令制、佛教都是借助中國的漢字在東亞傳播開的。因此，有的學者（主要是一些日本學者）又把東亞世界稱作「漢字文化圈」。

朝鮮的三國時代（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並立，三一三至六六八）相當於中國西晉末到唐初。雖然雙方都遭逢了不少戰亂動盪，文化交流仍持續不斷，並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一九七六年，在朝鮮平安南道大安市德興里發掘了一座年代約當五世紀中葉的高句麗壁畫墓。該墓前後室和甬道均有彩色壁畫，墨書銘記和榜題全為漢文。前室西壁繪十三郡太守來朝圖，其榜題分別標出「燕郡」、「范陽」、「漁陽」、「上谷」、「廣寧」、「代郡」、「北平」、「遼西」、「昌黎」、「遼東」、「玄菟」、「樂浪」和

「帶方」(？)諸郡名，在其前面還有一「此十三郡幽州部影七十五州治廣薊今治燕國去洛陽二千三百里都尉一部并十三郡」的字樣。後室壁畫上有一「中里都督典知七寶」的榜題和圖像，可能與佛事活動有關。位於前室北壁、過道口上方的墨書題記共計十四行一百五十四字，記載下葬的日子是高句麗廣開土王永樂十八年(四〇八)十二月廿五日。題記中也有「釋加文佛弟子」字樣，證實了文獻中關於佛教於三七二年從中國傳入高句麗的記載。題記中所記除「國大小兒」為高句麗官職外，其他基本屬於中國魏晉時期的職官制度。一九七一年在忠清南道公州郡宋山里發掘了年代為六世紀初的百濟武寧王陵，其中出有青瓷四耳壺、六耳壺和青銅壺、鬲斗、匙、箸、鏡等中國南朝的器物。甬道內有墓誌兩方，刻有六朝書體，其一為武寧王墓誌，銘文「寧東大將軍百濟斯麻王」云云；其二為「百濟國王大妃」墓誌，誌石上壓有鐵五銖約九十枚。武寧王在位二十三年(五〇一至五二三)，正值百濟中興時期，與中國南梁通好。墓誌中的寧東大將軍即係南梁的封號，這與《梁書·東夷傳》的記載相吻合。在新羅墓葬例如五世紀末至六世紀初的天馬冢裏，也發現了從中國輸入的青銅鼎、鏃斗和漆器。

魏晉時期，邪馬台國成爲日本許多小國的共主，其女王卑彌呼於景初三年（二三九）遣使到洛陽，魏帝賜「親魏倭王」金印及錦緞、銅鏡等禮物，由帶方郡派官吏回訪。此後，邪馬台國又多次與中國交往。

四至七世紀是日本的古墳時代（因發現當時的大量「古墳」而得名。古墳的特點是堆土成丘，在墳丘中埋石室，置棺以葬死者，隨葬品較多。）。這時，銅鏡仍然被視爲珍貴而神奇的器物，一方面繼續從中國輸入，另一方面就地製造。從中國輸入的各種紋飾的銅鏡，以各式畫文帶神獸鏡爲最多，較早的有孫吳赤烏元年（二三八）的銘文。本地製造的「倭鏡」很多，基本上都是模仿中國銅鏡，但有的銅鏡如奈良縣新山古墳出土的「直弧紋鏡」等，花紋具有較濃的民族風格。古墳後期流行的「鈴鏡」，附有日本特有的響鈴，但花紋仍仿中國鏡。銅鏡中特別值的一提的是三角緣神獸鏡，這種鏡緣部隆起甚高，斷面呈三角形，鏡背花紋是東王父、西王母等神像和龍虎等獸形，故名。迄今爲止，在日本已發現古墳時代前期古墳出土的這類銅鏡三百餘枚。在中國，三角緣銅鏡還在東漢中後期就出現了。從形制、花紋和銘文等來看，日本出土的三角緣神獸鏡具有

中國鏡的基本特徵。如大阪古墳出土的三角緣神獸鏡銘有：「吾作明鏡（鏡）真大好，浮由（游）天下□四海，用青銅，至海東」，表明這種銅鏡很可能就是爲了遠銷海東而製造的。有些鏡銘文中還有「景初三年」、「（正）始元年」等曹魏的紀年，被認爲是魏帝送給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及其繼承者的。也有的學者認爲，三角緣神獸鏡具有中國三國時代吳鏡的因素，應爲東渡日本的孫吳工匠在日本製造的。

據日本古文獻記載，南朝的製陶、縫衣等工匠也到了日本。在日本本州中部各地的古墳中曾發現具有中國南方風格的陶器，如鐘形器、五聯罐、盤口壺和類似虎子（溺器）的陶器等。在這些古墳周圍的埴輪陶俑裏，還發現了和南朝陶俑同樣的服飾：男戴盔帽着袴褶，女梳橫髻服長裙。考古發現還表明，當時本州、九州等地的建築也受到中國木構建築中特有的「斗子蜀柱」的影響。

一般認爲，晉武帝太康六年（二八五），王仁從朝鮮到日本，教皇子稚郎子以《論語》、《千字文》，是日本人學習漢文的開始。古墳時代的日本，與中國的交往進一步加深。據《宋書·蠻夷傳》記載，宋順帝升明二年（四七八），倭王武遣使中國，使臣帶來的

表文純屬漢文。但從和歌山縣隅田八幡神社所藏人物畫像鏡、熊本縣船山古墳所出鐵刀和琦玉縣稻荷山古墳所出鐵劍的銘文來看，除使用漢文外，當時日本人已開始利用某些漢字作爲音標，類似後來的假名（日文字母）。八世紀以後，日本人受梵文影響，用草體漢字造平假名，用楷體漢字偏傍造片假名，這種音節文字和漢字一道沿用至今。

關於漢字的流播，除日本之外，早在公元三七二年，高句麗就設立了太學，講授中國經書。如前引考古材料所見，古代朝鮮沒有其他文字，漢字很早就是朝鮮人表達和記述的工具。儘管七世紀中葉開始有所謂「吏讀」（或作「吏道」、「吏頭」、「吏吐」，即用漢字的音表示朝鮮語裏的助詞、助動詞等，夾在漢文中間，作爲幫助閱讀漢文的工具。）十五世紀中葉，李氏王朝的世宗和鄭麟趾等人，又在中國學者黃瓚的幫助下，參考中國韻書，研究創制了「諺文」（即今天朝鮮拼音文字的雛形），但是，直到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以前，漢文一直作爲朝鮮的正式文字流行。例如，一七〇九卷的《李朝實錄》全都是用漢文寫成的。

越南古代也和朝鮮、日本一樣，曾經長期使用漢文、漢字。直到十三、十四世紀之

交，越南人才創造出「字喃」（意即「越南的字」），仍是以漢字爲素材，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式來表達越南語。然而直到近代，漢語漢文仍爲越南文人所喜尚。十九世紀越南著名詩人白臺子（即阮綿審，字仲淵，號椒園，一八一九至一八七〇）是越南阮氏王朝宗室（明命皇阮福膽第十子），九歲開始寫詩，著有《北行詩集》、《倉山詩鈔》。其詞集名《鼓柁詞》，共一〇四首，論者以爲其寫艷情不傷軟媚。如《疏簾淡月》咏梅花：「板橋直待騎驢去，扶醉誦《南華》爛嚼。本來面目，君應知我，前身鐵腳。」等等，皆堪玩味。用拉丁字母書寫越南文，是晚近才出現的事。

第三節 海路交流的擴大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經過南海之路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比兩漢又有所擴大，見於文獻記載也較多，如《三國志·吳志》、《晉書·扶南傳》、《梁書·海南諸國傳》等。

一九六〇年在廣東英德的南齊墓中，曾發現三枚薩珊波斯卑路斯銀幣。一九七三年

在廣東曲江南華寺的南朝墓中，又出土了九枚被剪過的薩珊銀幣。研究者認為，當時已可以從中國南方的海港廣州起航，經由師子國（Sinhala，今斯里蘭卡）、印度，而到達波斯或拜占庭。這兩批十二枚薩珊銀幣，就是當時這條通向波斯灣的海路通航的實物證據。

經由這條海路輸入中國的還有羅馬玻璃器。一九六五至一九七〇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在江蘇省南京市北郊幕府山西南的象山上，先後發掘了七座大墓。據墓誌可知，這是東晉最著名的門閥瑯琊王氏的墓地。其中七號墓屬東晉早期，可能就是官至平南將軍、荊州刺史的王廙的墓（三三二一）。在這座墓中出土了一件完整的磨花筒形杯，以及另一件同樣玻璃杯的碎片。此外，南京附近的東晉大墓中多次出土過這種質料很好的磨花玻璃，如南京石門坎六朝早期墓出土的多塊玻璃殘片，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出土的玻璃片和南京北郊東晉墓出土的淺黃綠玻璃片。經分析，這批南京出土的磨花玻璃器的器形、工藝和成份均相似，說明來源可能相同。這種玻璃杯的器形、磨花技法都屬羅馬式，其成份則與德國科隆四世紀墓葬出土的羅馬玻璃殘片幾乎完全相同。因此，可以認

爲南京出土的這批玻璃杯是從西方進口的。

另外，南京象山王氏墓地七號墓還出土鑲嵌金剛石的銀指環一件。金剛石當時是西亞、南亞的特產，這件指環應是從海路傳來的。

六世紀時，有一個埃及出生的希臘富商科斯麻士（Cosmas）寫了一本《基督教各國風土記》（*Universal Topographia Christiana*），提到當時的海道交通一般是由波斯灣至錫蘭島（今斯里蘭卡），然後轉舵東北行至東南亞和中國。然而，從波斯灣到錫蘭島之間的貿易，仍然在波斯人的壟斷之下。中國人當時還沒有直接到過大秦（東羅馬）的。即使是錫蘭島以東的海路，也是外國船來得多，中國船去得少。東晉末年求法高僧法顯從師子國歸國，有人認爲乘的就是印度船或南洋船。

第四節 西行求法與東土開窟

東、西交通的發展帶來了文化交流的活躍。除有若干西域高僧如鳩摩羅什（三四三

至四一三）來華譯經外，中國僧人西行求法者也日漸增多。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尋經典（如支法領），或旨在親從天竺高僧受學（如于法蘭、智嚴），或欲睹聖迹，作亡身之誓（如寶雲、智猛），或遠詣異國，尋求名師來華（如支法領）。但有志西行者大多是有學問的僧人，所以都能吸受印度思想，通解佛典奧秘。回國以後，對中國文化多有貢獻。

中國西行求法者，以曹魏時穎川（治在今河南禹縣）僧人朱士行爲最早。甘露五年（二六〇），他從長安西行出塞，渡過沙漠，輾轉到了于闐。西晉太康三年（二八二），朱士行遣弟子弗如檀（漢譯「法鏡」）等十人將取得的《放光般若》梵本送回洛陽。士行本人終生留在西域，八十歲病故。朱士行以後，西行求法以晉末宋初最盛。

晉宋間西行求法僧人知名者幾二十輩，一百幾十人，然而，以法顯（約三三七至約四二二）最爲有名。因爲法顯旅行所至之地，不但漢之張騫、甘英所不到，即魏晉間朱士行，足迹亦僅達于闐。支法領即使到過印度，也沒有從海路歸還。其餘諸人，或只聞其出，未見其返，或未至天竺，或中道逝世。所以，海陸並遵，廣遊西土，留學天竺，

攜經而返者，法顯爲第一人。法顯還詳細記述西行求法的經歷，留下了《歷游天竺記傳》（即《佛國記》）一書。此書成於義熙十二年（四一六），是中國古代以親身經歷介紹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國情況的第一部旅行記。它對於後來去印度求法的人，起了很大的指導作用。在法顯的記述裏，還保存了有關西域諸國的許多可貴的史地資料，因此，該書又是研究古代中外交通和法顯所歷諸國（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等）歷史的重要文獻。法顯歸國後到建康（今南京）與外國禪師佛跋跋陀羅共譯佛經約百餘萬言，對發展中國佛學起了重要作用。

南北朝時西行者罕見，知名者也不多。北魏時有惠生、宋雲西行（五一八至五二二），《洛陽伽藍記》卷五收有其行紀。此後到唐代，由玄奘（六〇〇至六六四）至悟空遊竺（七五一至七九〇），西行者接踵，比晉宋之間尤盛。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對山脈、河流、城鎮方位、風俗人情、語言宗教等方面記述得翔實準確，以至後人在中亞、南亞進行考古發掘和地名比定時，往往依賴它爲指針。

中國有四大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麥積山、大同雲岡、洛陽龍門），都始鑿於公

元五世紀。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開鑿比較早，大約在三世紀。研究石窟寺的窟形、結構佈局、窟內造像、壁畫、題記等等，對於探討東、西文化的傳播和交流有很大意義。

一般認為，鑿窟來自伊朗的影響，如大流士一世（Darius I，古代波斯國王，前五二二至前四八六）及其後的貝希斯敦崖。（Behistun，地在伊朗克爾曼沙赫附近。）最早的佛教石窟是印度比哈爾邦格雅城北的巴拉巴爾石窟羣，開鑿年代約在前三世紀的孔雀王朝時代，最有名的印度佛教石窟要數南印度德干高原文達雅山懸崖上的阿旃陀石窟，始鑿約在公元前一、二世紀，至公元六、七世紀完成。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對此曾有記載。將印度的石窟建築和巨型造像結合起來，創立石窟佛像綜合體的是後期犍陀羅藝術或「印度——阿富汗流派」。這是在三世紀以後，犍陀羅藝術逐漸向貴霜治下的阿富汗東部發展而產生的，並一直繁榮到七世紀。這種藝術以阿富汗中部巴米揚城北面山區中的佛教洞窟羣遺迹為代表，故又稱巴米揚藝術。該石窟始鑿大致在二、三世紀之交，以東、西兩尊巨佛為中心，鑿有二千多個洞窟，分佈在長約三公里的溪谷斷崖上。巴米揚石窟改變了以佛塔為中心的印度式佈局，以雕塑佛像為中心，並有部份早期壁畫。

畫法風格明顯受到薩珊波斯的影響，人物形象與服飾也有中亞特點。巴米揚藝術對中國的克孜爾石窟以及四大石窟等都有影響。

新疆克孜爾石窟某些窟形接近巴米揚石窟，這已為學界所公認。北方地區現存最早的石窟，是甘肅武威天梯山下層塔廟窟（第一窟），該窟下層壁畫多存中亞風貌。天梯山石窟有可能是歷史上有名的涼州石窟遺迹，開鑿於北涼（四〇一至四三九）時期。專家們認為，五世紀六〇年代雲岡最初開鑿的大像窟——曇曜五窟應與新疆克孜爾石窟有一定的關係；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塑繪，也受到了新疆的影響。然而，在新疆吐魯番地區，還在魏氏高昌時期的洞窟裏，壁畫中的千佛就逐漸代替了本生故事，窟頂出現彩繪的抹角疊砌式平基，有人認為這些新因素有可能源於東邊的河西諸窟。降至八世紀的盛唐之世，中原北方地區盛行的阿彌陀和阿彌陀淨土以及其他淨土，還有一些密教形象，都傳播到新疆。新疆洞窟的壁畫佈局和繪畫技法也較顯著地受到中原北方石窟的影響。總之，石窟藝術傳到中國以後進一步得到揚棄、發展，已經成了中國文化藝術寶庫中的一筆寶貴遺產。

第五節 粟特商胡東來與西域樂舞傳入

粟特(Sogd)人立國於中亞綠洲地區，以經商爲主，兼營半農半牧，很早就活動在東西貿易交通綫上。漢代重農抑商，唐代又禁約絹、絲、布等「不得度西邊、北邊諸關及至緣邊諸州與易」(《唐律疏議》卷八)，漢唐間東西陸路經濟文化交流，多半是以粟特人(唐代稱「昭武九姓胡」，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稱「興胡」、「興生胡」。興，意爲興販、貿易。)爲中介來進行的。一九〇六年，斯坦因(M. A. Stein，英國人，本世紀初曾三次到中國西北探險，獲敦煌文書等文物頗多，撰著甚豐，一八六二至一九四三。)在敦煌以西Tuxi號古烽燧下發現九封「粟特語古信札」，斷代爲四世紀初年，其中數封內容是粟特人從姑臧(涼州，今武威)或敦煌向故國的撒馬爾干和布哈拉匯報經商的情況和困難。可想而知，粟特人來中國比這還要早。

粟特人往來經商，在沿途許多地方建立了他們的移居地，同時也把他們的宗教信仰、

音樂舞蹈、文化娛樂及婚喪習俗傳到這些地區。例如敦煌，古稱「華戎所交一都會」，至晚到四世紀初，這裏已有來自康國（Samarland）的粟特貴冑約一百人，加上他們的眷屬和奴僕大概共有千人左右。又如姑臧（粟特語古信札中作Kc'n = Kucan），大概自匈奴人建城以來，就是一個商業轉運重鎮，《後漢書·孔奮傳》說：「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四三九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率大軍進攻北涼，取姑臧（北涼都城），來涼土販貨的粟特商胡悉數被俘。到了文成帝（四五二至四六五）即位，粟特王派使者來請求贖出那些俘虜，文成帝下詔聽許。北魏的都城洛陽，更是當時中外人士匯聚、文化交流的最大中心。據《洛陽伽藍記》記載，洛陽永橋以南，園丘以北，伊水、洛水之間，御道兩旁盡是安置四方來客居住的客舍和住宅小區。道東有四館：金陵館、燕然館、扶桑館、崦嵫（龜茲）館；道西有四里：歸正里、歸德里、慕化里、慕義里。東方來的安置在扶桑館，賜給慕化里的住宅；西方來的安置在崦嵫館，賜給慕義里的住宅。「自葱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這種說法雖然有些誇大，但却反映出當時中外交流的盛況。據說在洛陽，

域外來人因爲喜歡中國風土民情，留下居住的不可勝數。因此而出現的歸化僑民就有一萬多家。他們居住的地方街巷整潔，住宅整齊，人烟稠密，綠樹成蔭。更重要的是，天下難得的貴重貨物，都集中到這裏來了。爲此，在洛水以南專門設置了一個「四通市」，顧名思義，就是溝通天下四方的市場。

東魏將都城從洛陽遷到鄴城，商胡隨遷。至北齊（五五〇至五七七），商胡甚至形成了很大的政治勢力。受到武成帝和後主父子兩代寵幸的和士開，上輩人是西域商胡。他得勢時，富商大賈從早到晚前來拜望不斷，有些朝廷官員、士大夫也來巴結他，有的甚至給他當乾兒子，同商人稱兄道弟。後主深受西域商胡的影響，染上了濃重的商人習氣。當財政虧空時，後主竟想起讓寵幸者賣官。於是這些人各分一片，或兩三個郡，或六、七個縣，把直到鄉官的官職都拿來賣錢，由宮內降旨批准。在這種情況下，州縣官吏職位都被富商大賈買到了，爲了撈回本錢，他們放肆貪贓。從鄴都到各州郡，到處都以各種名目徵稅，搞得民不聊生。當時所謂富商大賈，其實多爲西域商胡。所以，五七四年高思好起兵反後主時就指斥當時「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

（《北齊書·高思好傳》）。然而，後主向商胡賣官，却是隋代變革官吏選舉制度的開端。隋代徹底廢除了漢代以來州郡自行召取任用僚佐的制度，改成全由中央吏部決定授官，這是中國政治史上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强的表現。

從《北史·恩倖傳》來看，在北齊宮廷中受寵得勢的粟特胡人還有好多。北齊末年，宮內有一羣胡小兒，都是康（Samar kand）阿馱、穆（Merv）叔兒等高商子弟，從中挑選聰明伶俐的幾十個人，侍候在皇帝左右。他們所得到皇帝的恩典好處，跟關官幾乎一樣。也有授開府、封儀同的（開府、儀同均為當時高位）。有一個曹（Kaputana/Kebud）僧奴和他的兒子曹妙達，因為善於彈胡琵琶，很是得寵，父子倆都開府封王。還有一個何（Kushanik/Kushaniya）海和他的兒子何洪珍，也開府封王，倍受親信，地位顯赫。何洪珍利用自己的權勢，大幹賣官的勾當。至於何朱弱、史（Kashana/Keshsh或Kishsh）醜多一伙十幾個人，都因為舞跳得好，歌唱得美，或者是懂音律、會樂器，都得到了儀同、開府的官位。《隋書·音樂志》說，北齊後主特別喜歡西北外來樂舞，欣賞不夠，所以奇舞怪調不斷出現，於是曹妙達、安（Biharā）未弱、安馬

駒這樣的人也有封王開府的了。

北周武帝（五六〇至五七八）娶突厥木杆可汗的女兒爲后，西域各國都來祝賀，因而龜茲、疏勒（今新疆喀什）、安國（今蘇聯中亞布哈拉）、康國（今蘇聯中亞撒馬爾干）的樂舞大聚長安。降至隋唐，不僅燕樂多用西域音樂，就連唐朝儀禮所用的雅樂，制作時也斟酌參考了胡戎之伎（《舊唐書·音樂志》）。由此可見，西域音樂對中國古代文化生活的影響是相當深的。

第六節 祆教傳入中國

祆教是公元前六世紀瑣羅亞斯德（Zoroaster）在波斯東部創立的宗教，主張善惡二元論，崇拜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a），以波斯古經《阿維斯塔》（Zend Avesta）爲經典。亦有稱之爲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祆」字的意義是指外國（胡）天神。因其主要儀式是在祭司麻葛（Magus）指導下禮拜「聖火」，所以中

國又稱之爲火祆教或拜火教。該教在古代波斯和薩珊波斯時期均被定爲國教。粟特人大概很早就信了祆教。《魏書·西域傳》：「康國」有胡律，置於祆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這是最早見於典籍的祆字。

從敦煌發現的粟特古信札可知，最晚到四世紀初，粟特人已經有組織地來中國經商，可以認爲，祆教至少在那時就已進入中國。《晉書·石季龍載記》中有「胡天」一詞，《資治通鑑》卷九八亦有此句，胡三省注爲：「胡天蓋石氏禁中署舍之名。」石氏羯胡，本爲中亞粟特胡人（石 Tashkend，今蘇聯中亞塔什干）。石勒是三一二年見了佛圖澄（二二二至三四八）之後，在後者的勸說下才信佛的。所以，石虎宮中的「胡天」，很可能是羯胡過去信祆留下的痕迹。中原有胡天之祀見於北朝。《魏書·靈太后傳》：「靈太后幸嵩高山，」從者數百人，升於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據《隋書·禮儀志》記載，北齊後主事胡天，北周皇帝也曾拜胡天。北魏、北齊在京邑與諸州均置薩甫。薩甫即隋唐薩寶，是朝廷以商胡首領管理祆教祭祀活動的官員，隋代爲視正九品，唐代爲視正五品，頗爲優待。唐初，置祆祠。儀鳳二年（六七七）又爲流寓長安的波斯

王建波斯胡寺，似有別於商胡之祆祠。

唐朝禁民祈祭火祆，祆教經典也沒有漢譯流傳，看來主要是由來華西域胡人奉行。

祆教本無崇拜偶像的做法，但敦煌出土《唐光啓元年（八八五）沙、伊州地志殘卷》上却見有「祆廟中有素書形象」等字樣，或者是來華後受諸象教影響所致。唐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滅佛，祆教一併遭到排斥。然而武宗死後，禁令放鬆。一九五五年冬，在西安西郊土門村發現一方「左神策軍散兵馬使蘇涼（Suren）妻馬氏墓誌」，誌文爲漢、婆羅鉢文（Pahlavi，中古波斯文）二體合璧。據考證，蘇涼夫婦二人均爲波斯後裔祆教徒。墓誌銘有「咸通十五年」（八七四），顯然屬於開禁後祆教復盛的時代。歷五代兩宋，祆教在中國仍有殘存。元曲中有《祆神急》等曲目，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認爲可能已同中國舊俗中的火神相混了。

第七節 邊疆諸族的遷徙代興

北朝時期草原之路的活躍，與當時草原遊牧民族柔然、嚙噠、高車、突厥等的活動有很大關係。

北匈奴西遷以後，東胡鮮卑族（「東胡」即通古斯的音譯。鮮卑是今日操通古斯語的錫伯族的祖先。）移居匈奴舊地，遂漸強盛起來。魏晉時期，中國北方草原上活動的主要是鮮卑各部。有人認為，「西伯利亞」（Siberia）一詞的產生可能就與鮮卑當年的活動有關。鮮卑拓跋部南遷建北魏，東胡柔然（蠕蠕、芮芮、茹茹）的勢力崛起於北方草原。四、五世紀之交，柔然首領社崙北侵高車，兼併諸部，勢力擴張；西面到達焉耆，東邊直抵朝鮮，向北越過沙漠據有蒙古高原，南部則以戈壁為界。他們經常聚會的中心在敦煌、張掖的北面。周圍的小國都害怕他們的攻掠，只好和他們拉上關係，稱臣納貢。有了這樣大的勢力，社崙就宣佈自己為豆代可汗。柔然會長期與北魏為敵，並以

西域經河南道通使南朝，一度形成了對北魏的夾擊局面。柔然用過幾個漢文年號，反映出受到漢文化的影響。

早在四二九年，北魏太武帝就曾親率大軍分兩道遠襲柔然，柔然可汗大檀敗績，帶上族人，燒毀營地，遠遠地向西逃跑，不知道到哪裏去了。後來，據說大檀在窮困中死了。但是，以後北魏又多次遠襲柔然，造成柔然不斷有部落西徙。多數學者認為，西遷的柔然就是六世紀後期出現在歐洲史上的阿哇爾人（Avars）。阿哇爾人的入侵推動斯拉夫人向西向南遷徙分佈到日耳曼民族大遷徙所遺留的土地上。於是，斯拉夫人的小國遍佈東歐，一時頗有合成一大帝國的趨勢。然而，九世紀末葉，馬札爾人入據多瑙河流域中部與匈奴後裔合流，遂將斯拉夫人隔為南、北兩半。此後，兩部份斯拉夫人的文化發展便分道揚鑣了。

由於柔然的擴張，迫使匈奴餘種嚙噠（Ephthalites），因曾與白種的月氏混血，故又稱「白匈奴」。自金山（阿爾泰山）而南，遷至和闐以西葱嶺（帕米爾）地區。後稍強大，於五世紀中葉攻滅後期貴霜，在大夏故地建國，以拔底延（Balkh）為都城。

四八四年，嚙噠擊敗薩珊波斯，迫其納貢。六世紀初年，嚙噠的勢力臻於極盛，控制的地區東起葱嶺及和闐一帶，西達裏海東南呼羅珊，北抵天山北麓，南到阿富汗中部的伽色尼（Gazni）以及印度西北的犍陀羅地方，成爲貴霜帝國的繼承者。嚙噠與柔然曾有聯姻關係。從北魏文成帝太安（四五五至四五九）年間起向北魏遣使朝獻；梁武帝天監十五年又開始遣使南朝，《南史》稱之爲「滑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河北省定縣城東北隅華塔廢址底下石製舍利函中，發現了大批北魏時代的遺物，包括金銀器、銅器、琉璃器、珠玉、五銖錢和薩珊波斯銀幣。石函上有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四八一）的銘文，記載這批遺物埋入的年代。在出土的薩珊波斯銀幣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標本七·三。這枚是耶斯提澤德二世（Yezdigird II, 438—457）的銀幣，但是正面聯珠紋圓框以外的邊緣上，右邊有一個S形符號，下邊有一行壓印的銘文。這一行銘文是後來打印的，文字也不是波斯婆羅鉢文，而是嚙噠文。據研究，嚙噠有兩種錢幣，一種是自鑄；另一種就是在波斯錢幣上打上嚙噠文戳記，表示可以在他們國內流通。這種文字，到阿拉伯入侵時期，在嚙噠舊境內仍有使用，後來便失傳了。所以，錢幣上的字義無法通曉。總

之。這枚錢幣是中國境內第一次發現的和嚙嚙國有關的實物史料。終北魏之世，嚙嚙與中國的關係都比較密切，來往頻繁。僅延昌（五一二至五一五）中到孝昌初（五二五）的十餘年間，北魏就兩次派高徽出使嚙嚙，加深了雙方相互之間的了解。

高車即鐵勒（敕勒），先秦叫狄歷（赤狄），漢代叫丁零，語言大致與匈奴相同而稍微有些差別。高車本來在大漠南北（今內、外蒙古）與柔然雜處，雙方經常發生戰爭。四八六年，高車分裂，副伏羅部阿伏至羅率十餘萬落至高昌西北自立為王，高昌亦脫離柔然控制而依附高車。高昌西北本是悅般人分佈的地區，悅般自四四八年遣使北魏後不再見於史籍，可能是併入高車了。

六世紀中葉，原服屬柔然的突厥（Turk）部落興起於金山之陽。據《周書·異域傳》記載，土門為突厥酋長時，部落人衆稍微多了一些，開始到塞上交換繒絮，表示願意同中國交往。大統十一年（五四五），宇文泰（西魏權臣，北周的奠基人）派家住酒泉的商胡安（Bukhara）諾槃陀出使突厥。突厥族人都互相道賀說：「現在大國的使者來了，我們國家要發展起來了。」五四六年，土門派使者來貢獻土特產品。突厥剛剛興起，就

與絲綢貿易和商胡發生關係，這表明由於草原社會的發展，游牧文化同農耕文化的聯繫進一步加深了。

五四六年，突厥滅高車，盡降其部衆，因此，這次沒有導致鐵勒諸部的整體大規模遷徙，而是廣泛地散佈在從東到西直至黑海岸邊的整個草原上（《隋書·鐵勒傳》）。可以認為，一直由斯基泰人佔據的中亞北部草原，到此時才徹底突厥化了。五五二年，突厥破柔然。五六七年，突厥與薩珊波斯共滅嚙噠。從此，東起遼河上游，西至鹹海，南達帕米爾山區，北包貝加爾湖的廣大地區，都在突厥的控制之下。北周、北齊爭相與突厥結好，「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爲寇，爭厚賂之。佗鉢（可汗）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資治通鑑》卷一七一）蒙古土拉河右岸嫩都蘇木（Neintesum）發現的六世紀突厥貴族墓葬中，出土了中原生產專供外銷的連珠雙龍紋飾絲織品，說明突厥人攫取大量的絲綢，恐怕相當一部份是爲了滿足交換的需要。

第四章 隋唐五代時期

經由陸路的中外文化交流，至隋唐時代空前繁盛。隋唐制度淵源於漢魏，同時，隋唐（主要是唐朝）又是中國文化史上少有的既善於繼承，又能夠兼收並蓄的時代。尤其是在宗教、藝術、器用乃至習俗等方面，通過西域傳來的印度、中亞、西亞文明以及通過南海傳來的南亞文明，對隋唐文化的影響既深且遠。其實，唐代文化本身就是一種中外、胡漢混合的文化，其中既有蕃胡華化，亦有華人胡化。儘管唐朝統治者努力在差異中求一統，而不是鼓勵在一統中發展差異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外來文化的啓示作用及其為唐代文化帶來的活力，但仍可以看到，正是多種文化的交流匯聚，才形成了絢麗多彩的唐代文明。當然，隋唐時代也發生了許多民族衝突和戰爭，但從文化交流

的角度看，這些衝突和戰爭恰恰提供了各民族接觸的機會。在唐代，中國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也深受漢文化薰染。九大文明激盪於西域，對世界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南北朝後期，嚙唃破滅之後，突厥與波斯成爲緊鄰。波斯仍奉行傳統的貿易壟斷政策，經突厥販運絲綢的粟特人只好轉而尋求同東羅馬的直接貿易。六世紀東羅馬史家米南德（Menander）所述東方絲綢轉販到羅馬的路綫，與隋代裴矩《西域圖記》序所記通拂菻的北道基本一致。看來，在西突厥（五八三年分立）強盛時期，粟特人經營的絲綢貿易是通過突厥治下的中亞，經裏海北岸、高加索北部山區而進入小亞的，這條路綫避開了薩珊波斯的控制。在粟特人的促使下，突厥人和東羅馬結盟，連年進擊波斯，使波斯大大衰落，從而爲大食（阿拉伯）的興起和擴張創造了條件。

六五一年，薩珊爲大食所滅，同年，大食遣使唐朝。六五七年，唐朝平阿史那賀魯，西突厥劃入唐朝版圖。唐朝在西域設治，最遠的波斯都督府設在疾陵城（Zaradyj，地在伊朗與阿富汗毗鄰地區的塞斯坦。）；西到鹹海北岸，是唐朝濛池都護府（先後隸安西大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的範圍。八世紀初，大食入侵中亞，唐、大食、吐蕃和突厥人

（東突厥和突騎施）在中亞展開了角逐。安史之亂（七五五至七六三）以後，唐朝退出中亞，中亞逐漸走上了伊斯蘭化的進程。

第一節 唐代中國文化西傳

歷史事件的作用，往往要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顯示出來。隋代雖有裴矩招引西域，長孫晟離間突厥，但畢竟享祚太短。唐朝李氏本身雜有胡族血統，染習胡化。所以唐朝重用蕃兵蕃將，並以之破突厥、伐高麗、平西域，甚至擔任宮門宿衛，太宗還以此誇耀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胡漢合流、華夷無礙，可以說是唐代文化的主要特點之一。中國文學史上唐代以詩稱，而李白、元稹、白居易等著名詩人却都是漢化胡人。

唐朝在遼闊的地域內實現了政治統一，客觀上為擴大中外文化交流創造了條件。今天，人們參照《新唐書·地理志》中所收貞元（七八五至八〇四）宰相賈耽《皇華四達

《記》佚文和九世紀成書的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忽爾達茲比赫《道里與諸國記》(al-Masalik wa'l-Mamalik)所記呼羅珊大道，甚至可以將從唐朝的安西(龜茲)直到阿拔斯朝(黑衣大食，七五〇至一二五八)首都巴格達的道路一站一站地數出來。文獻之外，某些敦煌漢語寫卷與和闐語寫卷，吐魯番出土的蒲昌府文書和阿斯塔那墓葬文書等不僅指明了敦煌與伊州、西州以及更遠地區的具體道路，而且提供了沿途館驛、烽鋪等詳細情況。

盛唐時期，能從中原直接輸送到西域的主要是數量巨大的軍資練(絹帛，在當時和銅錢一樣作為貨幣流通。軍資練則主要用於和羅軍糧和賞賜軍功。)；經草原地區轉輸的則是遊牧民通過賜賚和互市等途徑得到的絹帛。一九六七年，在高加索北部山區庫班河上游莫謝瓦亞·巴勒米(Mosheevskaya Balka)墓葬出土大量產於粟特、中國和拜占庭的絲織品，斷代為八、九世紀，表明該地一直保持着在草原之路上的重要性。

與唐朝密切的政治經濟聯繫，促進了中亞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潘吉肯特出土的大量錢幣中，以漢製的圓形方孔錢為最多，這種錢中又是仿唐式(有的就是「開元通寶」)

佔了絕大多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唐代文獻比較清楚地記載了粟特諸王的世系，而這些國王的名稱多數都在其鑄幣上找到了。唐式鑄幣也傳到了草原地區。一九八三年，在蘇聯吉爾吉斯共和國北部唐代新城（Novakent）遺址又發現了一批突騎施錢幣，報導說：錢幣的正面是菱形半月印記，反面上有銘文「突厥人上帝」。關於這類銘文的讀法和意義，學者們還有不同意見，但所謂「半月印記」，無疑就是「開元通寶」錢所常見的背月紋（多為弓背朝穿孔），傳說是蠟製錢型造好後送到宮裏被楊貴妃掐了一下留下的痕迹。還有的學者甚至認為，七世紀花刺子模錢幣上的開口菱形印紋，也是漢製錢方孔穿留下的痕迹。

從考古發現來看，古代和闐地區受到了突厥、羌藏、印度等各種文化的影響，但在唐、五代以至宋初，却以漢文化在這裏影響最大。這裏採用唐朝制度，有許多官名都被借用到和闐語裏，甚至和闐文的公式書儀也都仿照唐制，如平關、押署、用印等。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中提到，開元十五年（七二七），龜茲、于闐均有漢人主持的佛寺。唐朝曾將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嫁給吐蕃贊普（國王），同時也傳去了一些技藝和

書籍，這都是婦孺皆知的事。一九五九年，中國的西藏文物調查團會勘查了位於今西藏自治區窮結縣七至九世紀吐蕃贊普墓羣。據研究，贊普墓選擇背山面水的地勢，主墓之前作左右兩翼式的佈局以及墓碑的形制和紋飾等，都一如唐制。這種情況給文獻中關於吐蕃當時大量輸入漢族文化的記載，增添了實物證據。

八世紀下半葉，漢地佛教禪宗也傳入過西藏。就中原佛教西傳來說，本世紀五〇年代在蘇聯吉爾吉斯共和國發掘了唐朝碎葉城的遺址，同時發現了武則天時期（六九〇至七〇五）在那裏修建的大雲寺，正殿奉祀着釋迦和垂脚彌勒。據杜環（唐人，七五一年在怛邏斯被俘，遊歷今伊拉克地，七六二年歸國。）《經行記》說，七五一年他經過碎葉，見那裏的大雲寺還在。至於漢文文書則流傳得比這還遠。一九三三年，潘吉肯特以東的穆格山城堡遺址出土一批屬於八世紀初期的粟特文書，其中就雜有三份漢文文書殘件。前述北高加索莫謝瓦亞·巴勒卡墓葬中也出土了幾件漢文文書，從字迹判斷，與唐代敦煌、吐魯番文書相近。這大概是目前所知西傳最遠的古代漢文文書了。由於材料太少，目前還很難斷言這些漢文文書爲什麼出現在這樣遙遠的西方。

除了絲綢之外，唐代中國向國外輸出的商品還有瓷器、銅鏡等。在今天蘇聯的撒馬爾干以及伊朗、伊拉克、約旦、敘利亞境內都發現了中國唐代的瓷器和銅鏡。蘇聯、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境內還發現了唐三彩陶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巴基斯坦、埃及等國不止一處發現了唐至五代的中國瓷器。印尼、蘇丹、埃及也有唐三彩出土。

第二節 造紙術西傳

紙是中國古代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之一。紙作為書寫材料早就傳出去了。但是，造紙術的傳出却要晚些。就日本「和紙」的製作而言，當在六世紀末，由高句麗僧人縣徵從中國傳去。一九七二年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區出土一份斷代為六二〇年的文書，上面除高昌官員的名字外，還有「紙師隗頭六奴」的字樣；另一份文書上有「當上典獄配紙坊駝（驅）使」。紙師、紙坊的存在是當地造紙的最明確證據。穆格山出土八世紀初年的粟特文書，幾乎全都是用羊皮紙和木簡寫的，可見當時當地還不會造紙。目前公

認的說法，造紙術傳入中亞及以西是在七五一年怛邏斯戰役以後。

七五一年七月，唐軍和阿拉伯軍分別應中亞地方王公之請出兵怛邏斯（今蘇聯中亞江布爾），雙方對峙五日，唐軍因參戰的葛邏祿部前途倒戈而潰敗。被俘往阿拉伯地區的唐朝士兵中有不少工匠，從而促成了中阿之間第一次技術轉移。據薩阿立比（al-Tha'alibi）《珍聞諸趣之書》等阿拉伯文獻記載，怛邏斯戰役中被俘的中國士兵裏有造紙工匠，他們在撒馬爾干建立了穆斯林世界第一座紙坊。在中國紙和造紙術傳入阿拉伯之前，西亞和埃及是用皮革（Madadim）、紙草（papyrus）以及羊皮紙作為書寫材料。七九四年，哈里發哈崙·拉施德派駐呼羅珊的總督法德勒·本·葉哈雅（al-Fadl b. Yahya）在巴格達按撒馬爾干的模式開辦了伊拉克境內第一家紙廠。以後，帖哈麥（Tihama）、也門、大馬士革、提貝利亞（Tiberias）、特里波利、哈馬（Hama）等地相繼建立起用植物纖維造紙的紙廠，其中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在數百年中都是向歐洲供應紙張的主要產地，歐洲人把這裏生產的紙稱為charta damascena。

在紙坊廣泛建立的前提下，七九五年以後，阿拉伯地區開始出現了以抄書為業的書

坊。在這一點上可以說，阿拉伯發展了燦爛的中世紀文化，並為歐洲「文藝復興」保存了古典文明，這是與造紙術這一中國人的偉大發明分不開的。

造紙術在九世紀傳入埃及，而後有長足的發展。在埃及法龍姆發現的八〇〇至一三八八年的大量阿拉伯古紙中，最早的紙質文書屬於七九六至八一五年。對這批文書不同時期書寫資料的抽樣統計，反映了紙張取代埃及特產紙草的過程：

七一九至八一五年的三十六件，全是紙草；

八一六至九一二九的九十六件為紙草，二十四件為紙張；

九一三至一〇〇九年的九件為紙草，七十七件為紙張。十世紀以後，摩洛哥的首府非斯成了造紙業中心，造紙術由此傳入歐洲的西班牙、意大利等國。

西班牙境內的造紙業最初還是掌握在阿拉伯人手裏。基督教國家裏第一個見之於記載的紙廠，是一一八九年在比利牛斯山北麓法國境內的埃羅（Herault）城附近興建的。到一二七六年，在蒙地法諾（Montefano）建立了意大利第一家紙廠。一三九一年，德國紐倫堡和科隆開設了紙廠。波蘭境內克拉科夫的紙廠建立於一四九一年。英國到一四

九四年才有第一家紙廠的興建。一四九八年，奧地利維也納開始設廠造紙。其他歐洲國家則是在十六至十七世紀時才開始造紙。上述歐洲各國造紙都是採用中國式的手工業生產方式和技術設備，但直到十七世紀，歐洲造紙工藝、質量還不及中國宋代的水平。

墨西哥一五七五年有了造紙生產。美國直到一六九〇年才在費城興建了第一家紙廠。加拿大開始自行造紙已是一八〇三年的事了。總之，到十九世紀，中國的造紙術已經傳遍了世界五大洲。

第三節 絢麗多彩的唐代文明

西域音樂自南北朝時傳入中國，乃至影響到唐朝雅樂、燕樂。本書的第三章第五節中已有所提及。唐代樂府伶工也多隸籍外國世家，如隋唐之際的白（龜茲百姓）明達，唐朝的米（Maymurgah）嘉榮和其子和郎，曹保、曹善才、曹綱祖孫三代，康崑崙、康迺、安叱奴、安萬善、安魯新等。唐代最流行的西域音樂是龜茲樂。坐部伎之安樂、太

平樂、破陣樂、大定樂、上元樂、聖壽樂、光聖樂皆播大鼓，雜以龜茲樂；長壽樂、天授樂、鳥歌萬歲樂、小破陣樂皆用龜茲樂。開元、天寶之際，長安、洛陽時髦胡化，以至「女爲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城頭山鷄鳴角角，洛陽家家學（一作教）胡樂」。據研究，唐代舞曲（大曲）發展出諸宮調，諸宮調後來就演變成元曲。唐代舞曲雖久已失傳，但從日本所傳唐樂來探究，其中不少是西域舞樂。還有，隋代借龜茲樂人蘇祇婆的琵琶七調來正七聲，其調源出於印度而受西域影響。唐宋以後音樂，隨處可見這七調的痕迹，如元曲中屢見的《般涉》。

西域舞蹈傳來也始自北朝。《隋書·音樂志》說：「（北齊）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這一「繁手」顯然就是一種舞蹈姿勢。據考證，唐代健舞曲中出於西域的有胡騰、胡旋、柘枝三種，開元、天寶以後盛行於長安，後更遍及全國各地。軟舞曲中可能也有傳自西域的。還有從康國等地輾轉傳來的潑寒胡戲，遊戲時舞「蘇莫遮」（一種假面舞）。潑寒胡戲在中國流傳很早，到唐代已成了風俗習慣，開元元年（七一三）唐玄宗敕令「無問蕃漢，即宜禁斷」。然而，直到今天雲南西雙版

納傣族和鄰邦緬甸還有潑水節，有的學者認爲那是從波斯經印度傳過來的。唐代還流行打馬毬，也是從波斯傳來的。

西域流寓唐代長安的畫家以于闐人尉遲跋質那和尉遲乙僧父子最爲著名，人稱大、小尉遲。乙僧善畫外國及佛像，論者以爲「氣正迹高，可與顧（愷之）、陸（探微）爲友」。乙僧所傳爲凹凸畫派（即運用暈染技法）。與乙僧同時，曾蜚聲於長安畫壇之吳道子，其人物畫亦受到凹凸畫派影響。新疆石窟的壁畫，大都有凹凸畫的風味。可以相信，唐代中原出現的凹凸畫法，是經西域從印度傳來的。

唐代金銀器皿製造是在外國進口金銀器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新興手工業。在初期階段，曾受到波斯薩珊朝金銀器工藝的影響。直到安史之亂以前，中國自製的金銀器皿中還有較多的薩珊波斯式金銀器器形；主題紋飾是忍冬、寶相花和多瓣小團花，但也存在着較濃重的外來紋樣因素。安史之亂以後，薩珊式金銀器的器形已不用或很少用，習見器物爲碗盤、盒之類；主題紋飾一變而成了牡丹花和花鳥圖案，外來紋樣的因素已融化於中國民族傳統的裝飾花紋之中，使中國金銀器裝飾達到成熟完美的地步。

隋唐盛世，銅鏡鑄造業又興盛起來，然而，其形制、花紋和銘文等都與漢式鏡大不相同。世界古代銅鏡，大體上可分爲兩大系統：西亞、埃及、希臘、羅馬的銅鏡，往往爲圓形，附有較長的柄；中國的銅鏡多爲圓形，鏡背中央設鈕，以穿條帶，沒有柄。唐代中期以後，開始出現有銅鏡柄，這是中國銅鏡在形狀方面的一次大變化。隋及初唐時，銅鏡上的花紋仍稍有類似漢鏡之處。盛唐以降，銅鏡的花紋題材和風格，除反映當時新的工藝美術外，有的還吸取了中亞和西亞的因素。

中國境內發現的波斯釉陶器有兩批，揚州出土過一件綠釉陶壺，在當地唐城遺址中、晚唐地層中，還屢次發現波斯釉陶器的碎片。另一批出土於福州蓮花峯的劉華墓中，劉華是南漢南平王的次女，閩國第三主王延鈞的夫人，葬於後唐長興元年（九三〇）。墓中隨葬了三件孔雀藍釉的陶罐，其器形、釉色和腹部貼飾的紋飾，都與伊朗發現的九至十世紀的所謂伊斯蘭式樣的釉陶罐相同。這些釉陶器，無疑都是從伊朗輸入的，而且還可能都是從海路輸入的。

在陝西西安郊區隋代李靜訓墓等處出土的隋代玻璃器表明，當時中國已經能夠生產

搜鈣玻璃。研究者認為，中國出現鈉鈣玻璃和鐵棒技術，基本上掌握西亞的玻璃製造工藝，這是與東西文化交流的頻繁分不開的。《北史·何稠傳》記載：隋時，「中國久絕琉璃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何稠是中亞何國（Koshanian，昭武九姓之一）人。出土文物證實，「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的琉璃就是玻璃。從考古資料來看，在新疆輪台、和闐、喀什、伊犁、葉城以及若羌縣瓦石峽等地廣泛採集或出土了一種當地生產玻璃的殘片（有的似爲生產廢料）。經中國上海的硅酸鹽研究所將瓦石峽出土的玻璃片年代定爲唐代。經分析，新疆發現的這種以土硝作助熔劑的鈉鈣玻璃與中亞撒馬爾干發現的八、九世紀的鈉鈣玻璃成份有某些相似，因此推測新疆玻璃可能與葱嶺以西的玻璃生產有某種聯繫。誠如是，則表明不僅玻璃作爲商品從西向東輸入中國，而且玻璃技術也是由西向東沿絲綢之路傳來中國的。

用甘蔗熬糖的方法是唐太宗時從印度傳來中國的。中國人提高加工工藝，製成了白砂糖，又將此法傳回印度。現代印地語裏稱白砂糖爲sugar，其基本含義就是「中國的」。據《馬可波羅遊記》說，元世祖（忽必烈，一二六〇至一二九四）時，還有埃及開羅人

到中國福建教淨糖術。

從唐高宗末年到唐玄宗的七、八十年間，唐朝天文、曆法深受天竺僧人瞿曇（Gautama）、矩摩羅（Kumara）、迦葉（Kasyapa）三家影響。唐代幾度修曆（麟德曆、大衍曆等），基本不脫印度天文曆法的影響。特別是玄宗開元六年（七一八）前後瞿曇悉達（Gautama Siddhartha）譯出九執（曜）曆，對唐代及後世影響深遠。不僅如此，九執（九曜）之名還可能因與占星術有關而深入民間。占星術不僅流行於印度，也廣泛流行於中亞、西亞諸國。粟特語的七曜日名稱即以胡名、波斯名、梵名同時顯示於唐代及以後的具注曆上。

《隋書·經籍志》已經著錄了印度天文、數學、醫方等書。《開元占經》介紹了印度數目字。唐代孫思邈被後人稱爲「藥王」，他的醫書裏就載有印度藥方。大抵是來華印度佛徒往往兼精醫術，以此取信於中國人，印度醫學也因而傳入中國。

有唐一代，許多胡俗在中國浸染成習。貞觀年間，太子承乾會「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剪綵爲舞衣」，「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

五人建一落，張旣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爲陣。繫旛旗，設穹廡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衆號哭勞面，奔馬環臨之。」（《新唐書·承乾傳》）

椎髻即堆髻，白居易《時世妝》有「元和（八〇六至八二〇）妝梳君記取，髻堆面赭非華風」一句。堆髻在敦煌壁畫及吐魯番出土陶俑中常見，赭面則是吐蕃風習。貞觀中，男子就有「胡着漢帽，漢着胡帽」的情況；開元以降，「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竟衣胡服」（《舊唐書·輿服志》）。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七：「胡食即饌饌、饒餅、胡餅、搭納等是。」饌饌即今新疆所謂抓飯，印度稱爲 *pilau/pilow*。

八四一年，日本圓仁大師入唐在長安還見到胡餅，並說：「時行胡餅，俗家皆然。」唐代長安、洛陽爲當時漢文化中心，尚且胡化成這樣，其他地方有的恐怕更嚴重。尤其是河朔地區（今河北、山西）由於隋末喪亂及東突厥的活動等原因，胡人多播遷此地。長期以來，河朔之地就尚攻戰而不崇文教，遂致安史亂後，「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新唐書·史孝章傳》）。顯然，那裏胡化一時成了主流。然而，還不過是長期文化交流過程中局部的、暫時的現象，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各種文化最終還是融合成了統一

的中國文化。同時，也應該肯定地說，抽去外來文化的因素，就無所謂絢麗多彩的唐代文明。

第四節 景教、摩尼教及印度教入中國

在隋唐時期，次於佛、道二教流行於中國的還有祆教、景教和摩尼教，總稱「三夷教」。祆教我們已在上一章裏講過了。

景教即基督教聶斯脫利派（Nestorianism），約在貞觀九年（六三五）經中亞傳入中國。在東來過程中，免不了受伊朗化及中亞化的影響。例如，該教經典本來用敘利亞語，但在高昌故地（吐魯番）發現既有敘利亞語，也有婆羅鉢語（Pahlavi）、粟特語和突厥語的福音書和教論，還有景教內容的壁畫。當然，也有漢文景教經典。伯希和（P. Pelliot, 1878—1945）法國著名的漢學家，本世紀初曾到中國西北探險考察。）攜走的敦煌文書中有漢文《景教三威蒙度讚》及《尊經》，前者讚美聖「三位一體」，

後者列舉了著名的景教僧景淨譯出的三十種經書的名稱。當然，就該教入華而言，最著名的還是建中二年（七八一）立於長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其文爲景淨所述，碑底左、右側共有七十位景教僧名，其中六十二位都有敘利亞文和漢文對照。顯然，景教在漢人中有一定流傳。從長安、洛陽到今寧夏、四川等地都有大秦寺的修建。會昌五年（八四五）武宗滅佛，景教亦受波及，一時在中原絕迹，但仍於北方草原一些部族中流行。蒙元時期，景教與當時傳來的天主教方濟各會被統稱爲也里可溫教。但是，元代的景教與唐代流行於中原的景教並無直接繼承關係。

在元代西北陸路交通綫上，從新疆霍城縣的阿力麻里古城，到內蒙古烏蘭察布盟達爾罕茂明安旗（百靈廟）的阿倫蘇木古城，以及北京附近，都會發現刻有十字架標誌的石刻或刻有敘利亞文的景教徒墓石，在內蒙古的河套一帶還發現過許多銅十字架印記。阿倫蘇木古城爲汪古部高唐王、趙王所居，城西北部有景教教堂遺址，景教徒墓石即發現在教堂附近。墓石用古敘利亞文字母拼寫突厥語言，與在中亞七河地區（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區）發現的景教徒墓石相同。泉州也有景教徒的墓碑，如刻於皇慶二年（一

三一三)的一管領江南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溫馬里失里門阿必思古八馬里哈昔牙」的墓碑，一半用古敘利亞文字母拼寫突厥語，一半爲漢文。估計這位教長可能是突厥族汪古部人。這塊墓碑的發現，說明景教在江南諸路的傳播情況，同時也說明用古敘利亞文拼寫突厥語這種文字，不僅流行於中亞七河地區和內蒙汪古部所屬之地，並且逐被任職泉州的汪古部人帶到江南一些地方。

摩尼教創於三世紀，是教主摩尼(Mani)以瑣羅亞斯德教(祆教)爲基礎，揉雜基督教、巴比倫古代宗教、希臘不可知論(Gnostic)學說以及佛教教義等而成的混合、折衷性的一種宗教。祆教雖提倡善惡二元論，但確信善神之最後勝利，有一元論趨勢。摩尼教則是主張善惡(光明與黑暗)互鬥的徹底的二元論。然而，祆教的排他性使之不易於在伊朗語民族之外流傳。摩尼教的折衷性却在其傳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使其一度流行於亞洲、非洲及歐洲部份地區。在薩珊波斯，摩尼教會一度受到庇護(Shapur I在位時，二四一至二七二)，但旋即被當作異端(Bahram I在位時，二七三至二九三)而被禁止，摩尼被磔死，門徒被逐出國外。這大約是摩尼教離開波斯本土向外傳播的主

要原因。

摩尼教於武周延載元年（六九四）傳入中國，東來途徑顯然經過中亞，看來粟特胡人是主要中介。本世紀初在中國西北敦煌、吐魯番發現其經典多為摩尼粟特文（草體），亦有回鶻文、漢文等譯本以及婆羅鉢文原抄本。八世紀中葉，摩尼教傳到漠北，成為回紇（回鶻）人熱心提倡的國教，以至於後來摩尼師在回鶻竟能左右國政。回紇人的信仰又促進了摩尼教在中原的傳播。雖然唐玄宗會將摩尼教作為邪教禁斷，但回紇曾兩次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亂，所以，安史亂後，代宗於大曆三年（七六八）應回紇之請下令建摩尼教大雲光明寺，該教在長安、洛陽、太原以及長江流域益發流行起來。八四〇年回鶻失國及武宗會昌滅佛，影響了摩尼教的公開存在，但它在中國民間比祆教要深入得多。從五代歷宋、元、明稱摩尼教為「明教」。北宋末年，該教（因提倡不吃肉、不飲酒，又被稱教「吃菜事魔」摩教」）還成為方臘領導的東南農民運動的動員力量。福建、兩浙當時是摩尼教最盛的地方。元末，順帝至元五年（一三三九）還有人在福建泉州華表山（俗名石刀山）上以花崗石砌成草庵一座，規模不大，有樓閣僧舍。庵中正廳奉祀

摩尼光佛一尊，高一五四厘米。佛跌坐，髮披肩上，下巴有兩道長鬚，背後有佛光，然而與一般釋迦塑像後的佛焰明顯不同。在草庵前，有一壁立大岩石，石上勒銘四行十六個大字，字徑盈尺，正書：「勸念清淨光明、大力智慧、無上至真摩尼光佛。正統己丑年九月。」總之，到元、明之際，摩尼教便逐漸與其他宗教合流，到清代便不復獨立存在了。

印度教亦稱「新婆羅門教」，是四世紀前後由婆羅門教吸收佛教、耆那教等教義和民間信仰演化而成。八、九世紀間經商羯羅改革，逐漸形成現代的雛形。印度教的基本教義仍與婆羅門教相似，即以《吠陀》為最古經典；信仰多神；奉梵天（Brahma、毗濕奴（Visnu）和濕婆（Siva）為三大主神，分別代表宇宙的「創造」、「護持」和「毀滅」。

印度教徒來中國也比較早。成書於七七九年的日本真人元開著《唐大和上東征傳》就曾記載：天寶九載（七五〇），廣州「有婆羅門寺三所，並梵僧居住。池有青蓮花，花、葉、莖、根並芬馥奇異。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

珍寶，積載如山。」在泉州還發現過不少印度教遺迹遺物，共有三處：一是西南臨漳門外的「石筍」，二是西北幼師學校內的「祭壇」遺址，三是南門汽車運輸總站的「番佛寺」遺址。這三處遺址業已無存，但都留下了一些石刻。這些石刻帶有濃厚的印度藝術風格，可以證實它們確是印度教史迹。「石筍」是印度教中濕婆的形象之一，本為男性生殖器崇拜的象徵，屬於早期印度教石雕藝術，見於漢文文獻記載也較早。南宋乾道元年（一一七〇）泉州太守王十朋迎客出郊，過石筍橋（因石筍而得名），吟詩道：「刺桐（油橄欖，阿拉伯語zaytun的音譯。古泉州因多種刺桐而得此別名。）為城石為筍，萬壑西來流不盡。」清乾隆本《泉州府志·古迹》：「石筍，在臨漳門外，山川壇西。石卓立二丈許，江在其下，故名筍江。北宋大中祥符四年（一一〇一一），郡守高惠連擊斷石筍。明朝成化（一四六五至一四八七）郡守張岩補之，今存石筍有斷裂痕。」據此，有的學者推測，八世紀唐朝的泉州府港為廣州的輔助港口，印度教很有可能從廣州傳來泉州。泉州「石筍」很可能是唐代印度教的遺迹，而直到宋代才有記載。也有人認為，泉州出土的印度教石刻是建於元代，毀於元末的印度教寺殘存的構件。

第五節 唐代文化東傳

朝鮮半島從六六八年新羅滅高句麗起（此前已於六六〇年滅百濟），到九三五年新羅敬順王歸降高麗王建止，稱爲新羅統一時代。

新羅自建國起，一直以今的慶州爲都城。都城的規劃以宮城月城爲中心，採取縱橫交錯如棋盤狀的條坊制。慶州有的地方至今還殘存着里坊的圍牆。這種整齊的規劃制度，同中國隋大興唐長安城和日本平城京極爲相似。

新羅國學裏以儒家經典作爲考試科目。「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所以唐玄宗會特別派經學家邢璣前往充使。唐代的文學、醫學、天文曆法都曾傳入新羅。唐代繪畫、雕塑、音樂對新羅也產生了影響。現存慶州石窟庵的石佛和菩薩像，與唐代的造像風格十分接近。

佛法演至隋唐，宗派大興。當時外國人求法，往往來華，不一定去印度。隋初有新

羅僧人智明、圓光、曇育、惠文等來華研習佛法。七世紀初，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兩次來華，都帶有留學生和學問僧來學習中國文化。新羅、日本僧人很多在華得到各宗大師的傳承，歸國開宗。日本奈良朝（七一〇至七九四）有所謂古京六宗，即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華嚴宗、律宗，全是從中國傳入的。如日僧道光先入唐學南山律，後鑒真（六八八至七六三）經多次努力，於天寶十三載（七五四）到達日本傳法，日本成立了律宗。鑒真還把佛寺建築、佛像雕塑的技藝介紹到日本。日本現存的唐招提寺及盧舍那佛，就是鑒真及其弟子在七五九年修建的。

日本平安朝（七九四至一一九二）初期（七九四至八九四），入唐求法之風極盛，歸國攜去經典極多，為一大特色。有人對所謂入唐八大家請去經典做過一個統計：

最澄 二三〇部， 四六〇卷，多係天台章疏。
空海 二一六部， 四六一卷，多係真言宗典籍。
常曉 三一部， 六三卷，同上。
圓行 六九部， 一二三卷，同上。

圓仁 五八四部， 七九四卷， 密教經典雜以他宗章疏。

惠遠 一八〇卷， 多係密教。

圓珍 四四一部， 一〇〇〇卷， 同上。

宗叡 一三四部， 一四三卷， 同上。

最澄和空海是日本最早的兩位名僧。古京佛教深受皇室寵遇，勢力極盛，遂至紊亂。

及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七九四），適有最澄反對古京之佛教，風氣遂變。最澄於八〇四年入唐，先在天台從道邃（天台第十祖）傳教，後在越州就龍興寺順曉學密教。次年攜經論歸國，創天台宗，被稱為傳教大師。空海與最澄同來中國，在長安青龍寺遇慧果，受金剛界、胎藏界兩部秘法。留學二年，八〇六年歸國，創真言宗，世人稱空海為弘法大師。顯然，兩位大師在日本所弘揚的都是自成體系的中國佛教。空海還編寫了《文鏡秘府論》和《篆隸萬象名義》，是關於中國文學批評和文字學的重要著作。

在唐代，日本先後共派遣十九次遣唐使（有三次未成行），都是選博通經史、嫻習文藝和熟悉唐朝情況的人擔任。六四五年六月，中大兄皇子等擁立孝德天皇，仿中國建

年號爲「大化」，遷都難波（今大阪）。次年設教官，以留唐回國的學問僧僧旻、留學生高向玄理爲博士，參與革新。行班田制，造戶籍，修京師官署、郡國驛站，都是模仿唐朝的做法。元朝天皇和銅元年（七〇八），決定自藤原京遷都，命「造平城京司」負責在奈良營建新都。和銅三年，平城京營建未畢，天皇及百官先行遷入。從考古發掘可以看出，日本建於七世紀後半至八世紀後半的難波京、藤原京、平城京、長岡京、平安京，其平面均作長方形，以南北中軸綫縱貫城市正中，於軸綫北端置宮城，軸綫左右兩側對稱地佈置里坊，顯然是模仿了隋唐長安、洛陽兩城的設計特點。不僅如此，平城京和平安京許多宮殿、門和街道的名稱也是襲用長安城的，如太極殿、朱雀門、朱雀街等。文武天皇大寶元年（七〇一）頒佈《大寶律令》，養老二年（七一九）修成《養老律令》，幾乎全是抄襲唐朝的律令制度。京都設大學，各國設國學，學校教授經書並兼習《孝經》、《論語》。考試任官，一準唐制。名儒吉備眞備兩次遊唐，留學十七年，在日本首倡行釋奠禮，用唐朝大衍曆。《大寶令》的官制一直沿用到明治維新。明治初年有二官八省，現在日本各部還稱省，都是承襲《大寶令》而來。隋唐以後，宋明理學也都傳入了日本。

儘管明治以後，日本風靡歐美學術，但直到現在，日本研究中國文化的人仍爲數不少。

奈良朝元明天皇和銅元年（七〇八），仿中國「開元通寶」鑄和同開珍銀錢和銅錢。和同開珍銀錢曾在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過五枚；和同開珍銅錢曾出於渤海東京龍泉府。西安出土的和同開珍銀錢，可能是日本遣唐使帶到中國來的。中國隋唐時代優秀的手工藝品也大量輸到日本，至今奈良東大寺正倉院還珍藏着數千件隋唐文物。據日本學者研究，日本生產的奈良三彩，也是模仿唐三彩的工藝技術燒成的。

隨着曆法的傳入，中國的許多節令風俗及有關的飲食、服飾、器用也傳到日本並被採納。日本書法繪畫皆源於中國，多爲隋唐時傳入。由於行用漢文，中國文學史上的形式、風格乃至思想內容隨時影響到日本，並給日本文學以啟示。日本現有最早的史書是《古事記》（七一二年成書）和《日本書紀》（七二〇年成書），其中的一些神話傳說就有不少中國成份。日本最古的漢文詩集《懷風藻》、《凌雲集》等都成於唐中葉，深受六朝唐初駢體文的影響。最古的和歌《萬葉集》，日本人擬之爲中國《詩經》，五七調的確立，係仿中國五七言詩；長歌係仿樂府古詩；題材或仿劉伶《酒德頌》，或仿李白《月

下獨酌》等。此外如游宴、贈答、題咏、送別等，大抵上都是襲取唐人意境。日本最有名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桐壺卷，就受到白居易《長恨歌》的啟發。

論者以為，吸收外來文化，最重要的在於選擇消化。日本模仿盛唐教育制度而不與道教；抄襲中國典章而不用宦官；效法宋明社會禮俗而不學纏足，殊不失為明智。敘述中國文化向外發展的歷史，可以堅定我們對傳統文化的信心；看日本運用、消化中國文化的成就，也可以給我們創造新的現代文化以啟示。

第六節 唐與阿拉伯的交往及伊斯蘭教傳入中國

七世紀初，穆罕默德（Muhammad約70—632）創伊斯蘭教。六二二至六三二年的十年間，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所創教義的指引下，完成了阿拉伯半島的統一。現在看來，阿拉伯人與中國官方正式通好，當以《舊唐書·西戎傳》所記永徽元年（六五二）大食王噶密莫末膩（Amiral-mu'minin，指第三位正統哈里發奧斯曼'Uthman' 644—

656年在位。)遣使爲最確。

唐代稱阿拉伯爲大食，來自波斯人對鄰近的阿拉伯部落塔伊部(Tayyi)的稱呼 Tacik。烏瑪亞王朝(Umayyads 661—750，唐代稱爲白衣大食。)及其派駐呼羅珊(Khurasan，今伊朗東北部)的總督不斷通好中國，使節、商隊絡繹於途。一九六四年在西安市阿房區西窖頭村一座中晚唐墓葬裏出土烏瑪亞朝金幣三枚，這是迄今所知中阿陸路往來的最早的實物證據。阿拉伯人入侵中亞，導致當地大小王公貴族紛紛尋求唐朝的支援和庇護，從而不時引起唐與大食關係緊張。七五〇年阿拔斯王朝(Abbasids 750—1258，唐代稱爲黑衣大食。)取代烏瑪亞朝。七五一年年的怛邏斯戰役是中阿之間唯一的一次直接軍事衝突。從阿拔斯朝的首都(曾三遷，但主要在巴格達。)到外省的驛路四通八達，從而爲物資運輸和商旅往來提供了便利。據賈希茲(al-Jahiz, 776—868)編的《商務觀察》(Kitabal-Tabassur bi'l-tijara)和前引伊本·忽爾達茲比赫書，從中國輸到巴格達的貨物主要有絲綢、瓷器和香料等。現代考古不僅在埃及等地發現了唐三彩，而且發現了仿唐三彩的埃及三彩(多彩彩陶)和波斯三彩(多彩彩紋陶器和多彩綫

刻花紋陶器)。

唐代中國已能造大海船，其結構據說多達五層。唐朝人能直接橫渡印度洋。高宗上元(六七四至六七六)中，達奚弘通泛海西行，從赤土(今馬來半島西部吉打Kedah以南)經三十六國而抵虔那，有的學者把虔那比定為阿拉伯半島南部Bandar Hisn Ghorah。弘通著有《海南諸蕃行記》一卷，原書已佚，《玉海》卷一六引《中興書目》保存了弘通西航的事實。賈耽《皇華四達記》廣州入南海路程則記載了通阿拉伯半島的近海航行路線。

八世紀以後，阿拉伯人取代猶太人、波斯人、印度人而取得了印度洋上的優勢，並將這一優勢一直保持到十五世紀末葡萄牙人東來為止。因此，八世紀中葉以後，中阿交往中海路的重要性漸漸超過陸路。來華的大食人多僑居在廣州、泉州以及江浙沿海港埠，並且往往和波斯人匯聚一處。他們自立蕃坊，自有蕃長管勾公事。唐朝在廣州先後設置市舶使、市舶中使(宦官)、監舶使、押蕃落使、結好使等職處理與僑民、外商的交往事宜。唐廷重視對蕃商的貿易，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負有招徠蕃商、鼓勵貿易的責任。

八三四年，唐文宗還頒佈詔令，命嶺南、福建、揚州等處節度使、觀察使等對蕃客常加存問，除船脚、收市、進奉外，任其自由往來貿易，不得重加稅率。這種種便利條件，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蕃客。其中有的還與漢族通婚，久居不歸，被稱爲「住唐」。住唐的蕃客開辦蕃學，漢化深者或取科第，如大中二年（八四八）進士及第的大食人李彥升便是。八七九年（一說八七八），黃巢軍陷廣州，大食人、波斯人、拜火徒、基督徒、猶太教徒遇害者達十二萬。數字或有誇大，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州大食人數量的多。

在蘇赫拉瓦爾底（Abdullah al-Mamun al-Suhrawardy）編的《穆罕默德聖訓》（*Hadith*）中有這樣一條：「學問即使遠在中國亦當求之。」由此看來，伊斯蘭教傳入中國，應當與大食人尤其是大食商人東來有關。中國有關伊斯蘭教的記載要數杜環《經行記》最早。杜環在怛邏斯戰役（七五二）中被俘，親履西亞兩河流域，七六二年附商舶來歸。《經行記》佚文收在《通典》卷一九一中。杜環仔細觀察了亞俱羅（庫法）的風土民情，還提到當時那裏有京兆畫工樊淑、劉泚，河東織匠樂隕、呂禮。有人研究《經行記》的記載，認爲基本上已將伊斯蘭的信仰、禮拜、封齋、宰牲、飲食等重要功

課都涉及到了，生動具體而正確。不過，伊斯蘭教在中原地區的傳播，主要還是與元代回族在中國的形成有關。明朝末年，開始出現了伊斯蘭教經典的漢譯本。

第七節 唐末五代西北民族遷徙及其歷史影響

八四〇年，漠北繼東突厥第二汗國（六八二至七四四）而興的回鶻汗國（七四四至八四〇）被黠戛斯（今柯爾克孜，蘇聯稱吉爾吉斯）。擊潰，餘部遷到河西和西域。本世紀五十年代，在蒙古烏蘭浩木地方發現了八行回鶻銘文，表明他們在漠北蒙古高原時已經採用粟特字母創造了自己的文字。在吐魯番則發現了用回鶻文書寫的各種文書，包括佛教、摩尼教、景教經典。回鶻文對契丹小字、蒙古文的產生都有影響，蒙古文又演出了滿文。金帳汗國、察合台汗國和帖木耳帝國都會用回鶻文作官方文字。直到清初，還有用回鶻文刻《金光明經》的。

回鶻人在漠北信摩尼，西遷後一度造成摩尼教勢力在西域的發展。然而不久，回鶻

便漸染佛教。在這種轉變中，他們把摩尼教的思想也帶入佛教之中，如回鶻佛教中就用摩尼教諸神之名來稱諸天和惡魔。回鶻文佛典中有譯自原典的，有譯自藏文的，也有許多是譯自漢文的。著名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也有了回鶻文譯本。西域回鶻的混合文化並不限於佛教方面，例如還有《伊索寓言》節譯，用於占卜的《聖經》摘錄以及中原地區的易卜知識。唐朝統治西域期間產生的融合中原與西域兩種畫風的藝術，在回鶻西遷之後表現得更明顯。甚至在後來回鶻人與葛邏祿人共同建立的黑汗王朝（Qarakhanids，約十世紀中至十三世紀初，好些可汗還自稱「桃花石」（Taghach），有人認為即「唐家子」的音譯，巴托爾德（B. B. Baistroch, 1869—1930，俄國著名的東方學家。）肯定這表明突厥人對中國國家觀念的一種愛好。不過，回鶻西遷更重要的意義還在於突厥語民族大規模轉向定居，從而開始了中亞突厥化與突厥語諸族伊斯蘭化的歷史進程。

據研究，還在漠北回鶻西遷之前，就有一些九姓烏古斯（Toghuz Oghuz九姓烏護，即九姓回紇）部落在回鶻汗國初期的擴張活動中向西發展。這些部落逐漸遷到了錫爾河

下游，在那裏同當地的其他部族（主要是一些操伊朗語的部族）接觸交流，從而獲得了明顯不同的新特徵，形成了被當時的西方作者不再歸於九姓而稱作「虎思Ghuzz／烏古斯Oghuz」的部族。十世紀中葉，烏古斯人和黑汗人都改宗了伊斯蘭教。十、十一世紀間，可能由於北方草原上欽察人（Qipchaq）的壓力，烏古斯人大規模向西、向南遷徙。留在中亞的烏古斯人成了今日土庫曼人的祖先。南遷烏古斯人的歷史作用並不僅僅限於他們的著名首領塞爾柱（Seljuk）的後裔曾從哈里發手裏奪取世俗統治權而以巴格達為中心建立過一個龐大的塞爾柱帝國（一〇五五至一一五七）。雖然中世紀的歐洲向東方進行了長達近二百年（一〇九六至一二九一）的十字軍戰爭，但遷徙的烏古斯人滙合起來對歐洲歷史造成重大影響却是在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結束之後。烏古斯人的一個部落在小亞半島發展起來，一二九九年，其首領奧斯曼（Osman）宣佈獨立，奧斯曼帝國（一二九九至一九二二）的名稱便由此人而來。奧斯曼帝國在近五百年中成了所有伊斯蘭國家的領袖。更重要的是，一四五三年，奧斯曼帝國攻佔君士坦丁堡，消滅了「千年王國」東羅馬（三九五至一四五三），由此引起了一系列世界性變化：奧斯曼人佔據着

東部地中海，控制了通往黑海和東方的商路，過境的亞歐商人必須繳納巨額捐稅。無休止的戰爭和海盜活動，也妨礙着地中海上貿易的正常發展。意大利諸城與東方的貿易受到嚴重影響。因而，西歐國家開始積極尋求直接通向東方的航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四九二），達·伽馬繞航印度洋（一四九七至一四九八）等等構成了歐洲歷史上所謂「地理大發現」活動。這一活動擴大了世界市場，增加了流通商品，開始了殖民掠奪，使西歐發生「價格革命」，歐洲的商業中心也逐漸由地中海區轉移到大西洋沿岸。這些，就為歐洲近代科學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第五章 宋元時期

宋、元直到明初，是中國古代海上交通的發達時期。

宋代，中外交流主要是通過海路進行的，但也有陸路交流，如繼業等人西行赴印度（九六四至九七六，行紀見范成大《吳船錄》卷上）、王延德出使高昌（九八一至九八五，行紀見《宋史》卷四九〇）等。遼朝對外交流則主要是通過陸路。一九七五年在內蒙古敖漢旗李家營子早期遼墓中發現了兩件銀器，一件爲鍍金銀盤，盤心捶鏤出一狹狹狀獸；另一件爲銀執壺，口部有流，壺柄和口沿相接處飾一鍍金胡人頭像，底部外緣飾一圈聯珠，具有明顯的薩珊波斯銀執壺的特徵。一九七四年冬在河北張家口市宣化區發掘的一一二六年張世卿墓，屬於遼代晚期，其後室墓頂彩繪星象圖，以中國古代二十八

宿爲主，同時吸取兩河流域巴比倫黃道十二宮的內容。這種綜合中外的星象圖，在中國是首次發現。這些文物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北方經由草原之路同西亞的文化交流仍在積極進行。金滅遼，遼宗室耶律大石遷到中亞建西遼（哈喇契丹），仍遵中國傳統建年號。據研究，西遼也把中國傳統的行政制度帶到了中亞，徵收戶稅，甚至以漢語爲商業往來中的官方語言。契丹（遼朝的統治民族）一名傳到西方，產生了俄文中的 *Китай*（中國）和歐洲人很熟悉的 *Cathay*。契丹大字和西夏（一〇三八至一二二七，黨項羌在中國西北建立的政權。）文都是仿漢字結構創制的。

元代，海路交通繼續發展。前四汗（成吉思汗、窩闊台汗、貴由汗、蒙哥汗）時期（一二〇六至一二五九）建立起橫跨歐亞的大蒙古國，擴大了統一，客觀上有利於東、西陸路往來和交流。例如，曾預修《經世大典》的瞻思（一二七八至一三五二），本爲大食人，祖父在窩闊台汗時（一二二九至一二四二）東來，曾創辦並管領大都藥物院（後改廣惠司），後任秘書監卿（掌歷代圖籍和陰陽禁書）兼崇福司使（掌也里可溫教即基督教禮拜）的愛薛（*'Isa*, 1227 — 1308），本爲居敘利亞西部操阿拉伯語

的拂林人，當貴由汗期間（一二四六至一二五〇）應召東來；一二五四至一二五五年間，小亞美尼亞（今土耳其東北亞美尼亞地區，中心在科贊Kozan）國王海屯，到蒙古國都城哈喇和林（Qara-Qorum）覲見了蒙哥汗（一二五一至一二五九），留有《海屯行紀》，是研究當時東西交通的重要史料。忽必烈居藩時，徵召回回星曆學者，波斯人札馬魯丁應召東來，後主西域星曆司，至元四年（一二六七）撰進《萬年曆》，並製造了一套七種西域儀象，包括渾儀、天球儀、地球儀等。元立回回司天台（元官署名。一二七一年設，掌領回回人觀測天象、編制回回曆。一三二二年改爲回回司天監。）即以札馬魯丁爲提點（主管官員）。蘇聯普爾科沃天文臺藏有兩份手稿，一份是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一份是漢文，內容爲從一二〇四年算起的日子、月及五大行星運行表，很有可能，這是札馬魯丁與郭守敬（一二三一至一二三六，元代天文學家和水利專家。）合作完成的。

一二六九年，喇嘛教薩迦派法王八思巴據藏、梵字母制成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仿漢字按音節拼寫成方體，仿漢文自上而下直寫，自右向左成行。忽必烈曾下詔規定以八思巴字譯寫一切文字，包括漢字。傳寫本《蒙古字韻》就是當時漢族人學習

八思巴字的識字課本。這或許可以說是制訂漢語拼音文字的第一次嘗試。八思巴字頒行以後，回鶻字蒙文雖有禁令，但仍在民間行用。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有元代刊刻的漢蒙合璧《孝經》，或可略窺蒙元時代文化滙聚之若干端倪。

第一節 宋元中外海路交流

宋元時期，中國的造船術和航海術都居當時世界上的領先地位。一九七三年在泉州發現，次年六至八月發掘出的南宋海船，出土時殘長二四·二米，殘寬九·一五米。海船平面近似橢圓形，頭尖尾方，船身扁闊，尖底。船的艙室為水密艙，用十二道隔板隔成十三個船艙，艙深一·五至一·九八米。經復原研究，與宋徐兢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所記的「下側如刃」的尖底型海船相同，估計排水量為三百七十噸左右。這艘宋代海船結構堅固，穩定性好，適宜遠洋航行，它的發現對於研究當時的航海事業是很重要的實物資料。實際上，在南海上航行的中國船甚至使當時睥睨海上的大食船也相形見绌。

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說：「大食國之來也，以小舟運而南行，至故臨國（Kilam，〈元史·外國列傳〉作「俱蘭」，地在今印度西南沿岸奎隆Quilon一帶。），易大舟而東行」。有人認為，這就是改乘大型中國船。元代訪問中國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巴圖塔（Ibn-Batutah, 1304—1377）也乘過中國船，他在其遊記中說，當時印度和中國間的一切海上交通都操於中國人之手。

在中國，指南浮針用於航海當始自九、十世紀。北宋末年，有關記載已見於朱彥《萍洲可談》及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標誌二十四向的羅盤針位最早見於元代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到十四世紀元代後期，中國已編成了《海道針經》、《針位篇》、《粵洋針路記》等標出羅盤導航方位的圖冊，明確記錄了前往忽魯謨斯（霍爾木茲）、阿丹（亞丁）、祖法爾（佐法爾）的航綫。

宋代一開始就很重視海外貿易。九八七年，太宗曾派遣內侍八人，帶着敕書和金帛禮物，分四批前往海外各國邀請外商來華通商。每批使者還帶着空着名字的詔書兩道，讓他們在所到的地方根據情況填寫授予。一〇二八年，由於廣州連着幾年外國船來得不

多，仁宗又一令本州與轉運使詔誘安存之」。廣州、泉州、明州（今寧波）、杭州、揚州在北宋都是對外貿易的主要口岸。北宋政府在這些城市都設立了市舶司，專門負責迎送海船和對進出口船舶進行檢查、抽稅。在泉州南安九日山的東峯、西峯之間，保存有宋代官員祈風的石刻達十四處，所載紀年最早的是北宋崇寧三年（一一〇四），最晚的是南宋寶祐元年（一二五三），均是求神庇祐航海順利。市舶司徵收的稅款和實物成了北宋政府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徽宗崇寧（一一〇二至一一〇六）年間，市舶歲入約一百二十萬緡，約佔國庫收入的六十分之一。

南宋疆土縮小，財政困難，然而僅閩、廣兩處，每年市舶收入即達二百萬緡，於是朝廷更加重視市舶之利和招徠遠人。一一三七年，高宗在上諭中說：市舶獲利最多，如果辦理得好，收入最起碼以百萬計。這不是比取之於民更好嗎！我所以特別重視這件事，就是希望借此減輕人民的負擔。一一四六年，高宗在另一次上諭中又說：市舶收入特別有利於解決國家費用問題。應當依照從前的辦法，招引邀請遠方外國商人來中國，擴大經商，發展貿易。宋代招邀和鼓勵商人的辦法有補官、外商侈靡逾禁（超過消費標準）

不追究等。《宋史·食貨志》記載：一二三六年，泉州知州連南夫上奏請示，市舶司各負責人員要是能招誘外國商船來，貨物抽稅價值達五萬貫、十萬貫，按具體情況予以不同的補官（提高待遇級別）。大食蕃官羅辛敗乳香值三十萬緡，綱首蔡景芳招誘外國貨船來收商稅九十八萬緡，各補承信郎。閩、廣舶務監官抽稅時收買乳香，夠百萬兩就升一級官。岳柯《程史》中說：番禺有外國人和中國人雜居，其中最有勢力的是姓蒲的。他們本來是占城（今越南南方）的貴族，在航海時遇到風濤，害怕再航海，便向本國國王請求，願意留在中國，以便溝通商業往來。該國國王同意了，商船貨運事務就全交給他們家辦理。過了好些年，蒲家在番禺城裏定居下來，住的房屋過於豪華，超過了國家規定的標準。但是，有關官員正在致力於招徠外商以增加國家收入，認為蒲家又不是中國人，就不追究。於是，蒲家的住宅高大宏偉，富麗堂皇，越來越發展，成爲當時最富有隆盛之家。

實際上，番禺的蒲姓並不是占城人，而是長期在占城等地經商的大食人（桑原陟藏《蒲壽庚考》）。宋代，大食商人的勢力在蕃商中躍居首位。他們聚居於廣州、泉州等

地，依然自立蕃坊。蕃長除管勾蕃坊公事外，還要「專切招邀」外商。據《宋史·外國傳》記載，大食船主蒲希密就是在本國得到廣州蕃長寄信招引勸說而來華進行貿易的。據統計，在九六八至一一六八年的二百年間，以訶黎佛（即哈里發）等名義來華貢獻的大食人有四十九次之多。同時，以興販獲利、希圖僥倖而入蕃的華商也為數甚眾。

來華大食人既多，便需要有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十二世紀以來，廣州、泉州、揚州等地所建清真寺不下六、七座，其中最著名的當數現存的泉州清淨寺。清淨寺位於泉州老城通淮門大街，始建於北宋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據寺內阿拉伯文古石碑，該寺正名為「聖友之寺」。自宋代建造以後，歷經元、明、清重新翻修，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元朝至大三年（一三一〇）由耶路撒冷人阿哈瑪特出資修葺。該寺對研究中國早期伊斯蘭教建築及中國與阿拉伯各國的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價值。一一六二至一一六三年，穆斯林商人試那（那）圖（Sirafi）在泉州建立了蕃商公墓。此外，許多大食人因久居中國或通曉中國事務而獲得了一「中國的、中國人」（*Chinese*）這一附名。

元代色目人在政治上受到蒙古統治者的信任和重用，這種情況吸引大量西域人、大

食人流入中國。一二七七年，元朝在攻取浙閩等地後，立即在泉州、慶元（今浙江寧波）、上海、澈浦（今屬浙江海鹽）四處港口設立市舶司。後來又陸續添設廣州、溫州、杭州三處。經過裁并，最後在十三世紀末確定為慶元、泉州、廣州三地。泉州在宋末和元代達到極盛，所謂「泉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至元二年（一三三六）在泉州灣入口處的石湖村建造的六勝塔（俗稱「石湖塔」），遠航船舶在幾十里外即可望見，起着航標的作用。寓居泉州的大食人也特別受到元朝的倚重。大食人蒲壽庚（受咄），數代寓居中國，壽庚父蒲開宗自廣州移居泉州。壽庚在南宋末年任泉州提舉市舶，降元後一二七八年升任福建行省中書左丞，是實際上的行省長官，負責招徠外商。壽庚諸子仕元，長子蒲師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帥，仍兼福建道市舶提舉，海外諸蕃宣慰使；孫蒲居仁為福建等處轉運使；婿佛蓮有海舶八十艘，死後無子，官收其貨，僅珍珠就有二百三十擔。

元代來往於中國和阿拉伯世界的旅行家主要有伊本·巴圖塔、楊樞和汪大淵。伊本·巴圖塔於元順帝（一三三三至一三六八）時來中國，遊歷了泉州、廣州、杭州等地，其遊記對所歷地區的風貌，中國海舶構造，中國與印度以及橫越阿拉伯海的海運貿易，中

國燒盜、燒炭、排灌、發行紙幣等都做了詳細的描述。他還特別注意了中國各地穆斯林的情況。楊樞在元成宗（一二九五至一三〇七）時兩度出使西亞，一三〇七年由海路到達忽魯模思（Hormuz）。汪大淵（約生於一三一一年）青年時期兩次浮海西行，撰有《島夷志略》。該書是上繼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括《諸蕃志》，下接明代鄭和隨員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等撰述的海道交通要籍。以上諸書提到了麥加（天方）及愷阿白（Kabah）禮拜寺，有關記載反映了當時中國對阿拉伯世界了解的程度。

宋代從南海輸入的外國貨中，最重要的是香料。香料不僅可以調味，而且可以作防腐劑。在泉州發現的那艘南宋海船中，出上的貨物主要是香料木，包括降真香、沉香、檀香等，濕重達二千三百五十公斤。其次是大量的胡椒。此外，還有香料、藥物，如龍涎香、乳香、檳榔、朱砂、水銀等，也有少數珊瑚珠和玻璃珠等。東非索馬里是生產香料的重要區域，索馬里的瓜達富伊角曾有「香料角」之稱。「香料之路」在古代就把中國與索馬里連接起來了。除此之外，從文獻記載可知，中國從南海輸入的還有象牙、犀

角、玳瑁、珊瑚等許許多多的商品。在安徽無爲景祐三年（一〇三六）舍利塔基中和浙江瑞安慶曆三年（一〇四三）仙岩寺塔基中各出土過一件伊斯蘭刻花玻璃瓶，看來也是通過海路輸入中國的。

宋元時代，瓷器是最受歡迎的外銷商品。亞洲、非洲許多地方都會發現過中國宋元時代的瓷器。朝鮮和日本是大量發現中國古代陶瓷的國家。一九七六年在朝鮮新安海底發現的沉船中，已獲中國宋元瓷器一萬六千七百九十二件（一九八二年統計），其中主要是龍泉窰青瓷器和景德鎮青白釉瓷器、「樞府」釉瓷器，還有建窰黑釉瓷器和吉州窰仿磁州窰的瓷器，也有少數鈞釉瓷器。日本的本州、九州和四國等四十多個縣市，都會發現過宋元瓷器。日本稱之爲「珠光青瓷」，是福建沿海泉州、同安的產品。菲律賓出土的中國古瓷器已逾數萬件，屬於宋元時代的有龍泉窰和泉州附近諸窰的瓷器，有一種青白釉帶褐斑的小罐、小盒之類，都是專銷菲律賓的產品。在文萊和馬來西亞也有宋代瓷器出土，特別是馬來西亞的沙撈越河三角洲地區，發掘出來的中國瓷片約一百多萬片，其中有宋代青白瓷、青瓷、黑瓷和磁州窰系的瓷片。在巴基斯坦的婆羅米納巴德、彭巴

雷和巴克，都曾發現宋代青瓷和青白瓷。伊朗的尸羅夫、尼沙布爾、米納卜和賴伊等處，都發現宋代瓷片。伊拉克的薩馬臘也以出土中國陶瓷而聞名。在埃及開羅的福斯塔特古城遺址中，曾發現許多宋代越窯和龍泉窯的青瓷器、白瓷器。此外，在非洲的坦桑尼亞、肯尼亞、索馬里都發現過宋元瓷器。有意思的是，在許多地方，還把光潔美麗的中國瓷器和瓷片鑲嵌到建築物上，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

由於瓷器外銷數量很大，刺激了國內一些瓷窯的生產，開始專門製造一些供外銷的產品。廣東著名的北宋潮州窰遺址分佈範圍很大，俗稱「百川窰」。這裏出土的日用瓷、美術瓷中有高鼻卷髮的西洋人頭像和短臉、垂耳、身矮的西洋狗，無疑都是專為外銷而製作的。

除了瓷器和絲綢之外，宋代另一件大宗外流的物品就是銅錢。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的說法就是：「中國同外國的貿易越擴大，中國錢幣流出海外的也愈多。所以，自唐代就有銅錢外流，宋代更甚，歷代雖有禁令却是禁而不止。除了通過貿易途徑，還有人向海外盜運走私銅錢。廣東好些地方都發現窖藏銅錢，最多的是順德縣荔村出土的

一批，達六千多斤。靠近沿海的地方出土窖藏銅錢，很可能是爲了盜運出口而埋藏的。宋代錢幣在日本、爪哇、印度、波斯灣沿岸及東非海岸均有發現。一二二九年，南宋曾下令以絹帛、錦綺、瓷器、漆等物交換外國貨物，避免使用金、銀等，以防止錢幣外流。但結果仍無濟於事，在非洲摩加迪沙、布臘伐、基爾瓦和桑給巴爾都發現過禁令之後鑄造的中國錢幣。例如，一九四五年在桑給巴爾的卡蔣瓦發現一百七十六枚中國錢幣，其中有南宋理宗朝（一二二五至一二六五）的十九枚，度宗朝（一二六五至一二七五）的八枚。不過，宋代命令以瓷器與外國商人交換貨物，促使宋代瓷器更多地向外輸出，後來在北非、東非及南非都發現了宋代瓷器。

第二節 猶太教傳入中國

猶太教是世界各地猶太人信奉的宗教。在中國，至遲到十五世紀後半葉已經正式出現了一賜樂業（Israel，今譯「以色列」）教的名稱，民間稱該教還有「挑筋教」等名。

迄今爲止的研究表明，雖然不能完全排除漢代已有少許猶太人來華的可能性，但比較大量的猶太人進入中國不會早於唐代。黃巢陷廣州，衆多遇難者中就有猶太教徒。至於後來長期定居在開封的猶太人，其主體應該是北宋時進入開封的。開封猶太人很可能有波斯、印度等多種來源。他們的先祖可能在公元前已經離開本土東來，因爲猶太教《聖經》的完本在公元一世紀才確定下來，可開封猶太會堂的《聖經》却並非完本。

明清時代傳下來的幾件碑文是研究中國猶太教歷史的珍貴史料。據此可知，宋代開封猶太人於一二六三年興建了一座猶太會堂（一二五二二年重建時定名爲「尊崇道經寺」），形成了猶太社團。開封猶太人有十三部《聖經》（他們自稱「道經」，即《摩西五經》），雖遭水患，又得修復，一直保存到一八五一年。長期以來，開封猶太人在表面上採取了一些變通形式，以保持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實質。例如，開封猶太人雖然有改用漢姓、祭孔祀祖以及稱耶和華爲「天」等情況，但仍維持了許多猶太教的禮儀習俗，如每日三次禮拜，安息日在會堂誦經，屠宰牛羊時挑除筋絡等等。甚至割禮，直到十八世紀初年還在實行。

十三世紀中葉蒙古西征，導致猶太人再次大量流入中國。元代文獻中稱猶太人爲「朮忽」（新波斯語Djihad，希伯來語Yehudi），異譯有「主吾」、「主鵠」、「珠赫」。清代文獻中作「祝虎」、「祝乎德」、「諸乎得」或「朱乎得」。元代來華的猶太人散居各地，有些城市如杭州比較集中。他們是色目人的一部份，人數雖多，却沒有形成鞏固的社團，到明清時代，便逐漸融合到回族中去了。

研究者認爲，開封猶太社團衰落和消失的原因主要有三：（一）長期處於孤立無援的困境；（二）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長期薰染；（三）中國的宗教寬容環境。在這些因素的長期作用下，開封猶太社團到十九世紀中葉便已奄奄一息，絕大多數人不得不逐漸歸化，與漢族或回族融合了。

第三節 蒙古西征

在中國史上，蒙古族是第一個統一了全中國的少數民族。在歐亞史上，蒙古族又是

第一個不具逃亡性質而主動向西進行征服的草原民族。

一三六八年明朝軍隊攻入大都（今北京），蒙古統治者並沒有消滅，而是退回漠北去了。然而，西征的蒙古人却基本上都同當地民族融合了。如果說民族史表明，「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征服地區的較高文化所征服」是一條規律，那麼，文化史亦表明：即使民族特徵消失了，他們所創造的優秀文化成果却保留了下來。這應該有兩層意義，一層當然是先進文化是人類共有的財富；另一層是各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可取之處。甚至，我們還可以找到所謂「文明民族」被「野蠻民族」同化的例子，例如中亞的突厥化。歷史似乎顯示出這樣一條規律：在文化交流中居主動地位的民族總是處於優勢，無論他們起點的高低如何。總之，民族問題與文化問題不能完全等同起來。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探討。

蒙古人的西征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一二一八至一二二三）：一二一八年，蒙古大將哲別率軍攻滅被乃蠻部屈出律所篡奪的西遼政權。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以花刺子模（Khwarezm）殺害蒙古商

隊和使臣爲由，親統大軍西征，攻滅了花刺子模。又遣哲別、速不台率偏師抄掠波斯，越太和嶺（高加索山脈）擊敗欽察與幹羅斯（Ors-Ros，即俄羅斯）聯軍，掠幹羅斯南境。這次西征，把蒙古國的領土擴展到了中亞。

第二次（一二三五至一二四二）：高闊台汗在滅金（一二三四）之後，一二三五年，派拔都（成吉思汗長子朮赤的次子，繼承父位。）統帥各支宗王長子出征欽察、幹羅斯諸地，萬戶以下各級那顏（官人）亦以長子從征，故又稱「長子西征」。一二三七年，蒙古軍滅也的里河（伏爾加河）上的不里阿耳（Bulghar）和欽察，攻入幹羅斯。一二四一年，拔都分兵兩路侵入李烈兒（波蘭）、馬札兒（匈牙利）。蒙古軍在里格尼茨（今波蘭西部）大敗李烈兒和捏迷思（德意志）聯軍，震驚了歐洲。一二四二年，拔都聞窩闊台死訊，率軍東返，留駐也的里河下游地方，統治被征服的欽察、幹羅斯地。

第三次（一二五二至一二六〇）：一二五二年，蒙可汗遣弟旭烈兀總領波斯之地，統兵西征未服諸國。一二五六年，旭烈兀軍消滅盤據波斯北部諸山寨的木刺夷國（mulahidah，指伊斯蘭教亦思馬因派。）；一二五八年攻陷報達（巴格達），滅阿拔斯

哈里發朝。一二六〇年九月，蒙古軍先鋒在阿音扎魯特（‘Ayn Jalut’，今大馬士革以南）被密昔兒（埃及）軍擊潰。蒙古西征至此結束。

在西征的基礎上，形成了由成吉思汗後裔統治的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和大汗領地。忽必烈即大汗位（一二六〇）以後，承認旭烈兀對阿母河以西的統治權，原來由大汗直接領有的波斯諸地遂變為宗藩伊利汗國。一三〇九年，窩闊台汗國被察合台汗國吞併。

成吉思汗西征，帶去大批漢族技術人員，沿途闢山開路，修築橋樑，在通往西域的大路上建造驛道，設置驛騎、鋪牛和郵人，把中原原有的驛站系統延伸到西域。爲了維護路途的安全，他還特別在交通大道上設置護路衛士，頒佈保護來往商人的札撒（法令）。成吉思汗後裔所建各汗國，也都注意保護商道。元朝建立時（一二七二），蒙古各汗國已經獨立，但元朝皇帝仍是名義上的大汗，與各汗國間還有一定聯繫。尤其是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利汗國，與元朝遣使往來不絕。伊利汗國內的波斯、阿拉伯人入元做官、經商、行醫和從事手工業者甚多，漢族官員、文人、工匠留居伊利汗國者

爲數亦不少。該國制度、文化也受到元朝影響。也有不少中國工匠被遷往欽察汗國從事銅鑄鑄造等行業，遷入元朝的欽察、阿速、斡羅斯等將卒、工匠爲數更多。經由中亞、阿斯特拉罕、薩萊城（欽察汗國都城，今伏爾加格勒舊名察里津附近。）、塔那而達西歐的草原之路格外活躍。《突厥世系》的作者花刺子模人阿不勒·噶齊（一六〇五至一六四六）曾就此讚美道：「在伊朗和突朗（Turk），指中亞）之間的一切地方享有這樣一種安寧，頭頂金盤，自東徂西，不會遭受任何人的侵犯。」

第四節 指南針、火藥、印刷術西傳

早在東漢初年，王充在《論衡·是應篇》裏就提到「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可見當時中國人已經知道了磁針的指極性。北宋學者沈括（一〇三一至一〇九五）在《夢溪筆談》裏記載了看風水的「方家」（術士）用以指南的磁針，或浮於水，或懸於絲。中國指南針用於航海的記載，最早見於十二世紀初年朱或所著《萍洲可談》：中

國舟師航行海上，「晝則觀日，夜則觀星，陰晦則觀指南針」。朱彥的記載反映了他父親朱服在宋徽宗崇寧年前爲帥廣州（一〇九八至一一〇二）時的見聞，所以他對廣州的蕃坊市舶、航海船舶均有所記述。由此可見，中國航海之使用指南針，當可確定在一〇九〇年代之前。當時的指南浮針也叫針盤。

據法國學者雷諾（J. T. Reinand）和茅里（A. Maury）研究，阿拉伯海員使用羅盤的確切時間是在十三世紀初年。在阿拉伯和紅海地區，海員使用的羅盤被稱爲針圖（*da'ira al-ibrah*）或針房（*Bayt al-ibrah*）；海灣地區的伊朗人則稱之爲「吉布賴·腦麥」（*qibla-nama*）。阿拉伯礦物學家貝伊拉克·卡巴扎吉（*Bal'ak al-Qabajaqi*）在一二八二年寫成的《商人辨識珍寶手鑑》一書中說，當他乘船航行於敘利亞海上從特里波利前往亞歷山大里亞城的時候，海員使用藉助木片或葦箔托浮在水面上的磁針辨別方向。海員們說，航行在印度洋上的船長們不用這種木片托浮的指南針，而用中空的磁鐵做一種磁魚，磁魚投入水中之後浮在水面，頭尾分別指示北方和南方。

考慮到宋代中阿海路交流頻繁的背景，可以肯定，是阿拉伯人從中國學到了用指南

針導航的方法，以後又傳到歐洲去的。歐洲人關於航海指南針的使用，首先見於十三世紀末年斯堪的那維亞（在北歐）人的記載。當然，那時候指南針在歐洲已經不是新鮮事物了。

從朱彥關於指南針的記載中，人們不難看出指南針給遠洋航行帶來的巨大便利。就指南針西傳的歷史意義而言，很顯然，在奧斯曼人的征服活動迫使歐洲人開闢新航綫、進行「地理大發現」之前，歐洲人早已掌握了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從而具備了進行遠洋航行的條件。

順便提一下，在中國和阿拉伯共同推進的中世紀航海事業中，牽星術（*Kamal*，即按星辰高低的指、角來航海過洋的技術）是一項值得矚目的技術。這項技術及牽星板的應用，中國和阿拉伯海員都有貢獻。據阿卜勒·菲達（*Abu'l-Fida*，1273—1332）的記載，指（*isba*）就是手指，一指等於八扎木（*zab*）。這和中國《鄭和航海圖》等文獻中過洋牽星所用一指的距離很相近。

關於硝的知識和黑色火藥的混成，無疑是中國人掌握得最早，並且已應用於喜慶烟

火與攻防戰事之中。在阿拉伯語中，火藥主要有三個名稱：納夫忒（*nafth*，此即英語 *naphtha* 一詞所本），達瓦（*dawa*），巴魯德（*barud*）。三個名稱本來各有原義，後來都演變成火藥的專名。人們現在就是根據這些詞義的演變來探索中國火硝與火藥傳入阿拉伯世界的某些踪跡。納夫忒原指兩河流域所產可以點着的石腦油，它在和油脂、硫磺等混合以後火焰更旺。中國的火硝及其提純方法傳入伊朗，硝被稱為「舒拉」（*shura*）或「中國鹽」（*namak-jeni*）。一二三〇年左右，阿拉伯人又從伊朗引進了火硝或硝石，相應地被稱為「紹拉只」（*shawraj*）、「中國雪」（*thajj sin* 或 *thajj al-sin*）或「阿索絲」（古城名）「石之花」（*zahr al-hajar assiyus*）。硝被用於烟火之中。由於發火特性相似，這種烟火藥也被阿拉伯人稱為納夫忒。稍後，納夫忒即被用來稱呼火藥。達瓦本意為「藥、藥物、草藥」，在阿拉伯兵家哈散·拉瑪赫（*Hasan al-Kammah*，c. 1295）的《騎術和戰術》中被用於稱呼填充管形火器的混合發射藥。他指出，這種發射藥的混合配方是巴魯德十份、木炭二份、硫一·五份。巴魯德似乎是首次出現在阿拉伯大草藥學家伊本·貝塔爾（*Ibn Baytar*，c. 1248）的著作中，他

在介紹藥用巴魯德時指出，巴魯德就是「中國雪」或硝石、「阿索絲石之花」。有人引述巴格達人一三一〇年寫成的一部醫書證實：當時，巴魯德已成為用其中一種成份來統稱硝、木炭、硫磺三者混合物的名稱。到十五世紀下半期，即使是在穆斯林治下的西班牙，巴魯德已確指火藥。由此可見，阿拉伯語中本意不同的三個詞，都是在中國火藥，特別是製硝技術傳入之後取得共同詞義「火藥」的。十三世紀後期，歐洲人從阿拉伯書籍的拉丁文譯本中獲得了有關火藥的知識。

十三世紀中期，旭烈兀西征時會運用火炮等火器。阿音扎魯特一役，阿拉伯人從投降的蒙古軍中獲得了火器及製造火器的工匠。然後，阿拉伯人對火器進行了改進。改進後的火器製造法又傳回了南宋和蒙古，這就是所謂「回回炮」。據《宋史·兵志》記載，南宋於一二七三年曾頒佈製造「回回炮」的法式給沿邊州郡，有人觸類巧思，所製炮能超出一回回炮」之上。到了十四世紀，歐洲人也從同阿拉伯人的戰爭中學到了製造火器的方法。

中國雕版印刷至唐代已很盛行。宋仁宗慶曆年間，又有畢昇發明活字印刷。印刷術

發明以後，很快就傳到了朝鮮、日本、越南等鄰近國家。印刷術西傳的軌迹不如造紙術那樣明晰，一般認為可以有兩條途徑：

一條是元朝的寶鈔傳到伊利汗國。拉施特在《史集》第三卷中記載了一二九四年伊利汗國仿中國紙鈔（「蓋有皇印的紙」）印造紙鈔的事。這些紙幣完全模仿元朝寶鈔，連漢字都照樣抄下來作為圖案。「鈔」字也因此借用為波斯語的 *cah*（或作 *cah*）。

另一條是，十三世紀有不少歐洲遊歷家到中國，有的人可能親眼看到了中國的印刷技術。當時中國製造的紙牌還向意大利等國出口。在此啓發下，一四二三年歐洲出現了雕版印刷：一四五〇年左右，德國的古登堡開始用活字印書。

在吐魯番地區發現了屬於十三世紀的各種文字的印刷品。有人因此認為在蒙古時代初期，吐魯番地區已經有了非常發達、分佈廣泛的印刷業。伯希和在敦煌還發現了一桶回鶻文木活字，斷代一三〇〇年左右。大概，中國印刷術的西傳，還經歷過一個流播西域的時期。

第五節 蒙元時歐人東來

蒙古國時期東來並到達哈喇和林的主要有教士，意大利人柏朗嘉賓（Jean de Plan Carpin，約1182—1252）和法國教士魯布魯克（William of Rubruk，約1215—1270）。兩人均屬奉命出使，都留有行紀。一九二〇年，在梵諦岡檔案館發現了柏朗嘉賓攜回的貴由汗致教皇詔書原件，係用波斯文寫成，上鈐回鶻字蒙古文大汗璽。

隨着東西交通的通暢和了解的增進，歐洲人東來者日益增多。一二八九年，教皇遣孟特·戈維諾（John of Monte Corvino, 1247—1328）東來傳教，一二九四年到大都留居，後被教皇任命為大都大主教（孟特·戈維諾死在任上）。以後續有教士來華，如一二三二三年的安德烈（Andreas de Perusio）等人，一二三六年的鄂多立克（Friar Odoric，約1286—1331）和一二三三六年的馬黎諾里（Marignoli，生卒年不詳）使團。安德烈被派到泉州當主教，死後葬泉州，一九四五年發現其墓碑。鄂多立克是所謂「中

世紀四大遊歷家」之一（其他三人是伊本·巴圖塔、馬可·波羅、尼哥羅康梯）。他留居中國三年，歷廣州、泉州、福州、杭州、建康、揚州等地到達大都，復往中國西部旅行，然後回國，其旅行記流傳甚廣。據這些來華教士的說法，當時在大都、揚州、杭州、泉州等地都住有歐洲商人和教士，並興建了教堂，這也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證實。一九五二年在揚州發現兩塊拉丁文墓碑，一塊是死於至元二年（一三四二）的多密尼·伊利翁尼的女兒喀德鄰的，墓碑上部刻着「聖喀德鄰殉教」的圖像；另一塊是死於至正四年的多密尼·伊利翁尼的兒子安東尼的，墓碑上部刻着「末日審判圖」。伊利翁尼家族是意大利熱那亞城的商人。多米尼是來中國經商的，全家都定居在揚州。當時揚州有聖方濟各會的教堂，多密尼是這個教派的信徒，他的兒女死後便葬在教堂的墓地中。

蒙元時期來華歐洲人中最著名的當然要數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一二六〇年，威尼斯商人尼考拉·波羅攜弟馬菲·波羅啓程東來。一二七五年，尼考拉攜弟與子馬可·波羅再來中國。馬可·波羅年青有爲，仕元十七年，幾度往返中國與歐洲，執行忽必烈溝通中西的使命，對歐亞內陸交通和元初社會情況有比較全面的

了解。他返國（一二九五）後留下回憶性遊記《世界珍聞錄》，俗稱《馬可波羅遊記》，介紹了東來途中的見聞，中國的形勢，大都及其宮城的雄偉壯麗，中國的施政措施及其效率，揚州、杭州等歷史名城的富庶繁榮，經濟和工藝技術的高度發展。他介紹的情況一時被歐洲視爲海外奇談，甚至被某些人認爲是欺世盜名的謊言。馬可·波羅直到臨終之前，仍重申自己見聞的真實性，聲明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記述下來的還不到一半」。今天看來，情況確是如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馬可·波羅遊記和蒙元時期東來諸歐洲人的行紀一樣，對中國傳統的文化和學術思想略無一語道及。看來，馬可·波羅即使有機會完成他還沒有記述下來的另一半見聞，他是否會介紹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學術思想，從他主要掌握波斯語而不懂漢語的情況來推斷，也至可懷疑。從這些遊記、行紀來看，不介紹中國的傳統文化並非偶然，這實際上反映着在蒙古人一統天下的時期，東來的歐洲人還沒有感到有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必要。

第六章 明清時期

雖然明初有鄭和下西洋這樣的壯舉，陸路上也有一些往來，如陳誠等人兩次（一四一四、一四一六）出使哈烈（Herat，今阿富汗赫拉特）和哈烈國王沙哈魯（Shahrukh Bahadur，跛子帖木耳之子，一四〇四至一四四七）遣使中國（一四一九），但由於明朝有「海禁」，清朝又採取閉關政策，加上帖木耳帝國（一三七〇至一五〇七）後期開始的中亞局勢動盪，明清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總的來說不如前朝活躍了。

明清兩代，即使在平時，對中外貿易和人員往來都控制極嚴，這顯然不利於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開展。但是可以看到，明清之際，中外文化交流開始出現向深層發展的趨勢，西方力求瞭解中國社會及其思想文化，中國人接觸到了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這

畢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第一節 鄭和下西洋與明代對外海路交往

明初承宋、元對外開放之後，中國與亞洲各國之間，特別是與鄰近的朝鮮、日本、越南、緬甸、柬埔寨、暹羅（今泰國）、印度及南洋各國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繫與政治接觸很頻繁。從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到宣德八年（一四三三），「三保太監」鄭和（歷仕永樂、洪熙、宣德三朝）奉旨率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婆羅洲以西）前後歷亞、非三十多個國家，最遠到了麻林地（Malindi，今非洲東海岸肯尼亞之馬林迪）。鄭和下西洋提高了明王朝在海外的地位和威望，增進了中外使節友好往來，開展了官方貿易。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手工業的發展。鄭和下西洋無疑是中國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就是比歐洲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四九二），也要早好幾十年。

鄭和下西洋擴大了中國人的地理知識。在此影響下，中國人到南洋謀生的日益增多。

馬六甲一帶有不少中國人的墳墓，墓碑多有「皇明」字樣。可以想見，繼唐宋中國人「住蕃」之後，明代又有更多的中國人留居南洋。留居南洋的中國人帶去了鐵鋤、鐵犁及製糖和採礦的工具，帶去了菜種和培植胡椒的方法。他們同當地人共同開闢了大量的農田和礦坑，對南洋的開發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朝鮮、日本、東南亞及南洋各國都與明朝保持着政治和外交關係，並派人來華貿易。永樂二十一年（一四二三）各國使臣和商人一次到南京的就有一千二百多人。滿刺加（今馬來亞）、浣泥（Borneo，婆羅洲，今加里曼丹島）兩國的國王和王后也都來到南京，受到明成祖的盛筵款待，並由明成祖派人護送回國。

明朝政府在廣州、泉州、寧波三地設立了市舶司，專門管理對外貿易事務，其中廣州最爲重要。一九六四年在廣州東山發現的弘治八年（一四九五）太監韋眷墓中出土金版、紅珊瑚和三枚外國銀幣，其中有鑄於一四五七至一四六二年的威尼斯銀幣一枚，鑄於一四五九年的孟加拉銀幣二枚。這反映了當時廣州與西洋諸國的貿易關係。泉州在宋元以後仍是一個貿易港口。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間先後在泉州附近的晉江縣安海、南

安縣官橋、南安縣詩山、惠安縣北門街和泉州市孚橋街發現西班牙銀幣，這些銀幣大部份是西班牙在美洲墨西哥鑄造的，可能是十六世紀後半期至十七世紀初期，經菲律賓的華僑商人之手流入泉州地區的。

然而，明朝政府却嚴格限制海外諸國來華的日期、航道、人數和船數，並且還要呈驗「勘合」和「金葉表文」才能入境。明朝政府還屢次頒佈禁止私自下海的命令，把出國的人看成是「無父無君之輩」和「化外之民」，這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中外交流的正常發展。

一五〇〇年，葡萄牙派出長布拉爾（Pedro Alvares Cabral，約1467—1520）統率的艦隊，從此開始了十六至十八世紀葡萄牙人經略東方的時代。葡萄牙人在東方活動的深遠後果之一就是阻斷了中國同西洋各國傳統的海路聯繫。接着，一五二三年，明朝在廣東新會海面擊敗了葡萄牙船艦，並繳獲其佛郎機炮。從這年起，明朝政府即嚴禁與葡人貿易，並封鎖了全部通商口岸。這種局面到明朝後期才略有改變。

明代同宋元時期一樣，最大宗的出口貨物仍然是瓷器。明代瓷器的輸出主要通過下

列四種途徑：(一)明朝政府對外國的贈予；(二)各「入貢」國家使節回程的貿物；(三)鄭和下西洋時的大規模遠航貿易；(四)民間的海外貿易。明代中國瓷器不僅暢銷亞非各國，而且在明晚期也開始大量銷售到歐洲。

在歐洲，現藏西德克賽爾(Kassel)朗德博物館的青瓷碗，附加的金屬飾具有克宋·治令伯克伯爵(一四三五至一四五五)的紋章圖案，可以確認這是現存歐洲最早的具有可靠年代的明代瓷器。現存里斯本的屬於葡萄牙Manuel一世(一四六九至一五二一)的紋章瓷青花執壺，可視為迄今已發現的中國為西歐特殊定貨所製的最早外銷瓷。正德、嘉靖年間接受海外諸國特殊定貨的外銷瓷，在美國紐約藝術博物館、土耳其伊斯坦堡、意大利那不勒斯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博物館中還能見到。

第二節 耶穌會士東來與東學西被

自絲路開通，歷千餘年，歐洲與中國時有往來，中國的養蠶、繅絲、造紙等技術也

相繼西傳。但是，嚴格說來，東西雙方都談不上對對方的文化有多麼深入的瞭解和認識。這種情況直到十三世紀下半期馬可·波羅遊歷中國之後，依然沒有多大變化。中國傳統文化和學術開始傳入歐洲，主要應當歸功於在中國明清之際，歐洲近代社會發展初期來華的耶穌會士。

耶穌會成立於十六世紀四〇年代，是天主教中最保守的一派，該會教士以佈道海外、重整天主教的聲望為職志。耶穌會士初到中國是一五五二年。從一五五二年到一七九五年清高宗乾隆皇帝去世，來華的耶穌會士一般說有四百五十人，但實際超過此數。有姓名可考到過中國的耶穌會士大概達到八百人左右。在這些耶穌會士中，英籍的只有一人（安德魯·傑克遜），其餘均來自歐洲大陸上的天主教勢力比較牢固的國家和地區，以葡、西、法、意、比籍者為多，弗蘭德爾、德、奧、波、捷等國籍者次之。與耶穌會同來東方傳教的還有天主教的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奧古斯丁會。在這些教團中，耶穌會因有嚴密的組織，並依靠教士們的堅韌不拔和多才多藝而較早地打開了局面。

一五五二年，循海路從印度果阿（臥亞）而來的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Francisco

Xavier, 1506 — 1552, 西班牙籍) 抵達珠江口上川島。稍晚, 另有個別的耶穌會士取陸路來華, 例如一六〇二年末至一六〇五年間鄂本篤 (Bento de Góes, 1563 — 1607, 葡萄牙籍) 即從拉合爾經新疆葉爾羌、吐魯番、哈密抵達肅州 (酒泉)。鄂本篤及其隨從取陸路來華的目的在於證實契丹 (Cathay) 就是中國, 元代大都 (汗八里) 就是北京。

在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士中, 利瑪竇 (字泰西, Matteo Ricci, 1552 — 1610, 意大利籍) 利用機遇在一九八三年八月進入廣東。這位年富力強的教士甫抵中國, 即奉當時在日本傳教的范理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 — 1606, 意大利籍) 神父之命學習漢語, 並認真研究中國傳統文化, 以期盡快找到接近中國士大夫階層乃至中國君主的途徑和方式, 為順利佈道創造條件。為時不久, 利氏一方面將歐洲科學著作中既不違背天主教教義, 又適應於中國的某些篇章譯為漢語, 另一方面, 利用他的西方科學知識和他已具備的漢文化修養, 積極結交一批明代朝臣和士大夫。他的努力果然奏效, 一六〇一年, 他到北京朝見明神宗, 得到神宗允許在北京建立教堂。利瑪竇的成功深深打動了當

時以及後來來華的耶穌會士，他們競相仿效，致力於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他們在向中國介紹西方數學、天文、輿地等科技知識的同時，以書簡、札記、日記、行紀等形式源源不斷向教廷和本國發回有關中國狀況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報告。當時歐洲的印刷日趨發達，教士們的著作得到刊佈，並被人們廣泛閱讀。就是這樣，耶穌會士出於傳教目的對中國傳統文化所作的介紹和探討，客觀上促進了歐洲形成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風尚。首先翻譯中國儒家經典四書、五經的也是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士，他們還撰寫了關於中國儒家學說、孔子傳略等大批著作。這些著作的木刻本刊於中國，活字排印本多刊於果阿和巴黎。考狄（Henri Cordier, 1849 — 1925）編纂的《中國文獻學總覽》（*Bibliotheca Sinica*），即可了然當時介紹和研究中國事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著述之宏富。

從十七世紀中葉起，法國成立的海外佈道會開始了積極活動。一六八五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向中國派出了六位精選的卓越數學家兼耶穌會士前往北京的康熙宮廷，其中五位於一六八八年二月到達北京，他們是白晉（明遠，*Joachim Bouvet, 1656 — 1730*）、李明（復初，*Louis-Daniel Le Comte, 1666 — 1727*）、張誠（實齋，*Jean-Francois*

Gerbillon, 1654 — 1707)。劉應（聲聞）Claude de Visdelou, 1656 — 1737）、洪若翰（登，一作洪若時，Jean de Fontaney, 1643 — 1710）。這批法國耶穌會士在中國展開了多方面的活動，張誠參加了一六八九中俄尼布楚條約的談判和簽約，並為康熙繪製了《皇輿新圖》。洪若翰、劉應介紹西方醫學，因用奎寧為康熙皇帝治癒瘧疾，獲准在北京建立北堂。白晉以研究《易經》著稱，康熙鑒於他對《易》理頗有研究而對他十分器重。他作為德國偉大學者萊布尼茨的文字交，利用通信把《易經》介紹給了後者。李明兼通天文、地理、博物之學，他作為傑出的觀察家和當時法國的卓越寫作家，對中國的文化和事物有細緻深刻的描述。他們寫回歐洲的報告，起到了向歐洲人介紹中國時局和中國歷史、文化的作用。

通過耶穌會士的努力，一批批漢文典籍運到凡爾賽宮。一六九七年，白晉返回向路易十四呈遞了康熙贈送的四十一部中國書籍。一七〇〇年，洪若翰、李明送來了更多的中國圖書，其中有張誠繪製的《皇輿新圖》，清內廷繪製的草木圖冊。一七二二年運到法國的中國書籍達四千種，這批書籍構成了今天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手稿部的最早特藏，

爲十九世紀法國的漢學興旺打下了物質基礎，歐洲學者也得到了無須長途跋涉即可利用漢籍資料的便利。爲了利用這批漢文資料，當時法國皇家科學院院長做了認真的規劃，他計劃編纂出版漢語語法、漢法詞典。爲此任命了一位由耶穌會士培養的、當時在巴黎的福州人黃阿卡德（Arcade Houang）爲路易十四的第一任官方翻譯。他成了向西方介紹中國的第一個中國人。他的譯述包括《中國訓言選》、《中國字書》、《儒林外史》（選譯）、《漢語關鍵詞匯》、《中國曆書》、《日用大全》等。他還在法國本土培養出第一批法國漢語人材，其中有著名的傅爾蒙（Arcade Fournont）、弗勒雷（Nicolas Fréret）以及後起之秀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 — 1832）。

此後，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和在歐洲的耶穌會士開始配合研究中國。例如，生活在法國的耶穌會士杜赫德（Du Halde）利用在華耶穌會士書簡和他們有關中國地理、歷史、年代、政治、制度、文物、民族的報導編集成《中華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四卷，巴黎，一九三五；海牙，袖珍版，一九三六；倫敦，一九四一）。在中國的耶穌會士馮秉正（瑞友，Joseph de Mailla, 1669 — 1748）法籍）翻譯《通鑿綱目》，並補

寫宋至清初史實，成《中國通史》十二卷。此外，耶穌會士還重譯了許多儒家經典和中國史書，錢德明（Jean J. M. Amiot, 1718—1793）等人翻譯經書的質量與明末譯本相比有較大的進步。新編中國史書也遠比一五八五年刊行的門多薩（Mendoza）用西班牙語編寫的《中華帝國史》為優。由耶穌會士開端，歐洲湧現出一大批署名或不署名的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的著作，如《孔子道德論》、《中國哲人孔子的道德》、《中國人的政府和道德觀念》、《大禹與孔子的道德》、《中國道德哲學與政治立法》、《自然法典——孔子之詩》、《孔子的道德觀》、《中國的哲學》等等。

從這些書的題目也可以看得出來，當時歐洲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並沒有擺脫歐洲自身政治生活和社會思潮的影響。在此情況下，傳入歐洲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學術對歐洲人的影響也是各不相同的。耶穌會士譯述中國儒家經典，介紹中國傳統文化，本意在於證明中國人之事天和敬奉上帝實際類似於猶太教和基督教之信仰天主（Deus）。可是，歐洲的自然神論者却因中國傳統文化的引進而深受鼓舞，從而堅定了他們的信念和鬥志。在他們的著作中，「天」的概念取代了基督教的「真主」。在十八世紀多數啓

蒙學者筆下，中國被描述為由一羣有理性的哲人治理的「模範國家」、「模範社會」，中國傳統文化是理性的完美體現。而在以黑格爾（G.W.F. Hegel, 1770—1831）為代表的歐洲思辨歷史哲學體系中，中國道德、法律所反映的東方精神實際上已喪失了存在的價值，中國傳統文化因喪失性靈而僵化，它只是作為西方精神的參照系而存在。

第三節 中外科學技術交流

這一節的內容主要是講明代中外製瓷技術的交流和明清之際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的傳入。

明代中外製瓷技術交流，就中國對外的影響來說，主要是明代青花瓷器製造技術的外傳。

十五世紀起，朝鮮的青花瓷器在中國的影響下燒製成功。越南也在這一時期直接聘請中國的製瓷師傅燒造青花瓷器。日本人大量自製青花瓷器相當於中國的明代後期，大

批天啓（一六二一至一六二七）時期青花瓷的訂貨和所謂「祥瑞」青花瓷器對於日本大規模的自製青花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國的製瓷技師，於十六世紀初已在波斯的伊斯法罕燒造瓷器了。此後，這種技術又影響了敘利亞的製瓷業。埃及在十四、十五世紀也仿製中國青花瓷器，其造型和紋飾基本上模仿中國的青花器，但瓷胎是埃及本國的瓷土，而且往往有阿拉伯的瓷工姓名，這種碎片在福斯塔特遺址中曾發現不少。

阿拉伯人學到的中國製瓷法，於一四七〇年傳到了意大利。威尼斯煉金術士安東尼奧學會了中國造瓷技術，製成了輕薄半透明的瓷器。一六二七年，皮薩城工人製成了軟質青花碗，最先是阿拉伯藍色，隨後又模仿中國青花。荷蘭領土的德爾夫特，於一六三四年又從意大利學到中國製瓷法，能製出軟質瓷器。

明代中國的製瓷業也從國外獲得物質、技術和藝術上的借鑒和幫助。明初永樂、宣德時期的青花瓷器，相傳用的就是進口青料，即蘇麻離（索馬里）青。而且，這一時期在瓷器造型和裝飾圖案上，也都反映出接受了外來的影響。正德、嘉靖時期的「回青」，

也是進口青料。

從明末到清世宗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放逐耶穌會士之前，中國文化又一次表現了吸收外來文化的能力。這主要就是在耶穌會士竭力適應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要求的情況下，中國的一些士大夫乃至個別皇帝從耶穌會士那裏吸收了一些自然科學知識。

明末利瑪竇等人傳教，承認中國的天主教徒可以祭祖祀孔等。他的得力弟子有徐光啓、楊廷筠、李之藻（稱教中三傑）等，皆一時名士，首先奉教，故從者如雲。利瑪竇等人帶來一些有關曆算、測量、水利等技術和原理的書，曾在徐光啓、李之藻等人的幫助下翻譯過來。如《幾何原本》（歐幾里德撰）和《測量法義》，都是利瑪竇口譯，徐光啓筆錄的；利瑪竇自己還撰寫了《經天該》一卷、《乾坤體義》二卷；利瑪竇口授，李之藻演文的有《同文算指》（前編二卷，通編八卷）、《圓容較義》一卷。其他教士如熊三拔（字有綱，Sabbathin de Ursis, 1575—1620，意大利籍）、鄧玉函（字涵璞，Jean Terrenz, 1576—1630，德國籍）、艾儒略（字思及，Jules Aleni, 1582—1649，意大利籍）、羅雅谷（號味韶，Jacques Rho, 1590—1638，意大利籍）等均有天文、

曆算等方面的譯作或撰述。這些都對當時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清朝入關，留居北京的一些西方傳教士如湯若望（字道末，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德籍）等人，仍然得到清政府的信任，被授以官職，掌管欽天監，負責編修曆法。湯若望等人仍然採用利瑪竇的傳教方法，因而天主教得以繼續在各地傳播。康熙初年，中國有二十八個城市都設有天主教堂，共有教徒達十萬餘人。康熙還利用傳教士南懷仁（字敦白，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比利時籍）、白晉等人編修曆書、製造火炮、繪製地圖，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一七一五年，在康熙親筆刪改的傳教士德理格、馬國賢上教化王（教皇）書中，還希望能派更多精通天文、律呂、算法、畫工、內外科醫術的傳教士來華效力。這些都說明康熙對西方科學技術還是比較重視的。

從一七〇〇年起，耶穌會士與明多我會關於中國天主教徒是否可遵守郊天、祭祖、祀孔的中國禮儀之爭，發展成教皇與康熙皇帝之爭。教皇克雷基十一世（Clement XI, 1700—1721年在位）於一七〇四、一七〇七、一七一五年三次發佈通諭，將中國禮教

斥為異端。康熙則將教皇的這種做法視為干預中國內政，因而禁止對方的傳教活動。雍正時（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清朝政府規定除留京效力的傳教士外，其餘各省傳教士俱安置澳門，令其附船回國。一七四二年，教皇本篤十四世（Benedictus XIV, 1742—1758）下「自上主聖憲」諭（*Ex quo Singulari*），堅持羅馬教廷一七一五年的禁令，嚴格禁止中國教徒遵行中國禮儀。清乾隆皇帝則以斷然驅逐教士的行動相回敬。從這時直到鴉片戰爭後締結南京條約（一八四二）的百年間，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幾乎停止了活動。

顯而易見，由於社會條件的限制，明末清初的中國並沒有像前代大力吸收佛教等外來文化那樣去吸收西方基督教文明，更談不上由此而使中國文化發生變異了。西學東漸，對中國社會文化產生重大衝擊，那是在西方殖民主義者用炮艦轟開中國大門之後的事。

對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敘述就截止到這裏。親愛的讀者，看完這本小冊子，您認為今後的中外文化交流會怎樣發展呢？或者，您認為中外文化交流今後應該怎樣進行呢？觀迎您和我們一道來思考這些問題。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於北大健齋